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

# 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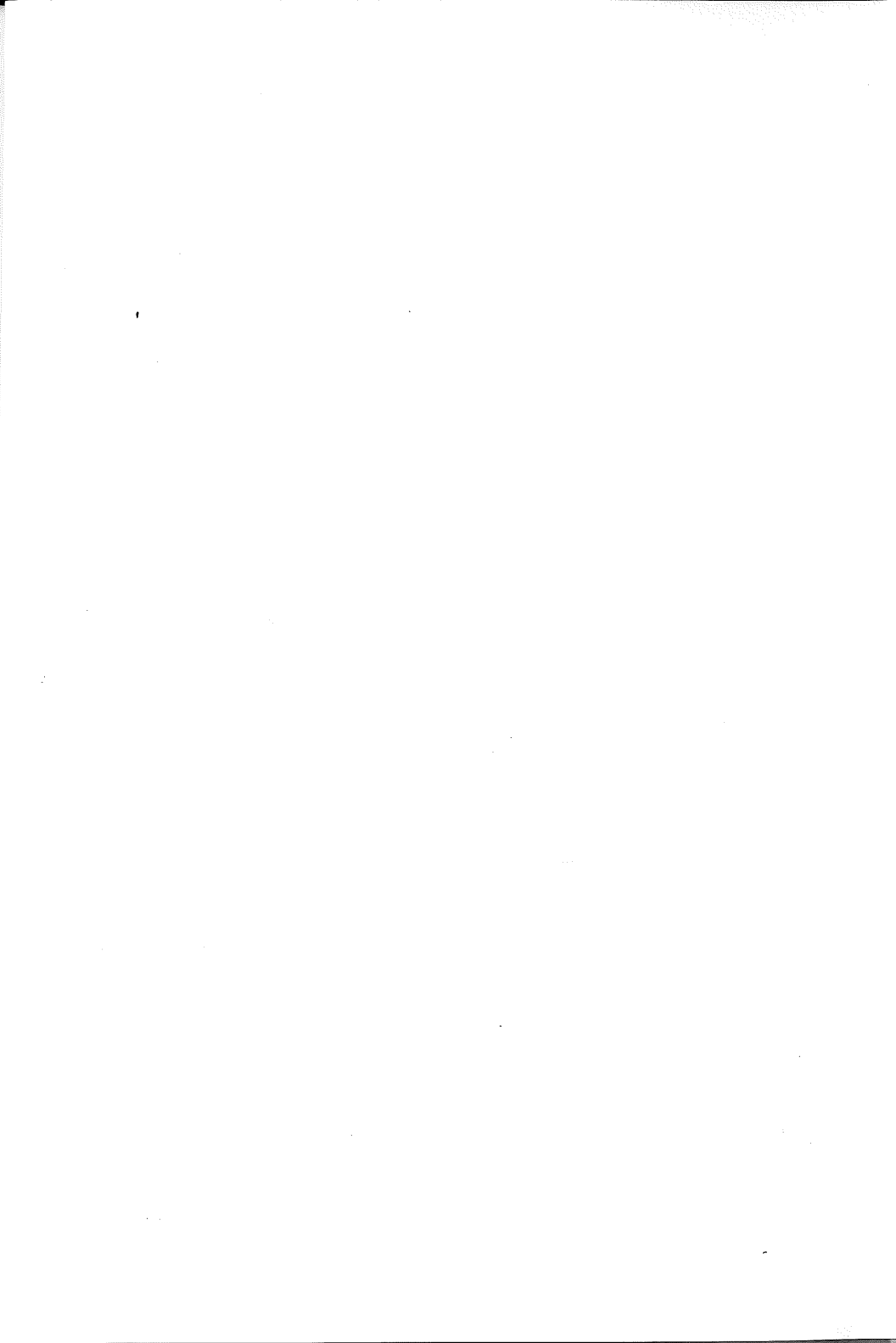
蕭開平  
藍博洲

編

祖國破了，  
要把它粘回去

——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





## 懷念我們的父親／代序

蕭開平

六月間您的孫子自美國回來，您硬拗著要騎摩托車去買烤鴨，您患病體弱的身子已無法用手握住油門，我從樓上穿著內衣衝下來趕緊說「我去買」，顧不著衣冠不整，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一向壯碩硬朗的父親真正病了！您還是在二〇〇二年九月廿五日離開我們了，我們懷念您的身影、您的脾氣，更不能忘懷您的言行及一切！感謝這麼多父親的摯友、戰友、難友、同志朋友的陪伴，與我們的父親共同走過肅清運動後內心煎熬的歲月。

記得小時候我們住在外公家，外公經營一家茶葉舖，我最喜歡跟著跟媽媽去外送訂購的茶葉，坐在腳踏車橫桿上的竹椅，隨腳踏車沿著彎彎曲曲環繞著北投公園的山路，挨家挨戶送茶葉到旅館或住家。晚上有時姐姐帶著我，或我帶著妹妹，或有時妹妹太討厭了，我就單獨走到舊北投火車站，爬到檜木圍欄上，等候下班的父親，父親總是將我放在他的肩上，背著我沿著舊北投的街道，漫步回到家裡享受母親準備好的晚飯。那時一家九口擠在小小的斗室裏，其樂融融，幼小心靈裡覺得世界好大，美好。我想那一段日子是父親出獄後漸趨淡泊寧靜的生活吧！

我們常搭火車往返台北及屏東佳冬老家之間，一趟八至十小時的路程若沒有座位是極辛苦的事情。在我記憶裡，父親從沒有跟我們坐在一起，一上車剛坐定，遇

有老幼婦孺上車，父親他馬上會讓位，然後在整個旅途中他就失蹤了；等到火車快到終點站時，他又出現了。在我印象中他坐火車時，我從沒見過他好好的與家人全程坐著過。曾祖母就說：「道應就是對別人好，對自己家人不好」，這就是他的個性。在佳冬老家的「步月樓」有著斑斑血跡的抗日史，更是後來我的祖父在晚年得知自己到了絕症（肺結核）後，把自己隔離的地方。曾祖母送菜時，亦只能放在門口，禁止家人與他接觸，無非就是怕家人再受到肺病的感染；這種處處為人著想的個性，絕對表現在父親的日常生活中。

自小學開始就會翻翻父母親的書櫃，尋找一些書籍閱覽。二年級的某一日，我竟然翻閱到一本《台共叛亂史》，裡面赫然看到父親、母親的姓名明列在上面，並且明白記載著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坐過牢的敘述及事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教育下，對一個九歲小孩的心靈的確造成了相當大的惶恐及驚嚇，使得我數日不言不語。母親發覺我的異狀，追問之下，我嚎啕大哭的對她說：「我的父母竟然坐過牢！我覺得是一種恥辱！以後如何面對同學、朋友？」我的母親驚訝的說道：「你的父母親坐牢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父母親爲了國家參加抗日戰爭，爲人民、國家服務的理念及理想奮鬥，如何是恥辱？」

之後，母親開始向我們幾個兄弟姊妹訴說那段抗戰及往後經歷的種種苦難，是學校歷史課本上找不到的！佳冬老家步月樓的抗日事跡，父母親赴日參加挑戰等經過的言教及身教，他們一生爲理想奮鬥的心路歷程，體會到在這個中國苦難的日子裡，他們真正完成了做爲一位堂堂正正中國的台灣人的歷史任務及使命，我們的父

母親實在是一對患難夫妻！

父親曾提及他在高等學校時，就由台南的親家介紹一位顏姓望族閨女，當初印象還不錯且幾已論及婚嫁，一日共同出遊，就在搭火車由台北經圓山往北投的路上，當時火車在經過在圓山半山腰上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社時，大部分的日本人或假的日本乘客會在經過時起立鞠躬致敬。就因搭火車時，這位本來非常可能成爲我母親的女士，非常恭敬起立朝向神社行了一個大禮，父親馬上因此改變主意，解除婚約。父親就是如此堅持立場的一個人，而且幾無妥協的餘地，如此才有我們敬愛的母親作爲他一生的革命伴侶。



#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

——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

## 目錄

懷念我們的父親／代序

蕭開平／一

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

革命伴侶／蕭黃素貞／1

永恆的憂傷與苦痛

陳映真／81

台灣法醫界的先驅——蕭道應

摘自《福爾摩沙的聽診器——廿二位台灣醫界人物的故事》／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85

我所認識的道應叔

姪女／蕭吉紫／93



台灣人抗日的典型——蕭道應在日據時代的抗日歷程

成大歷史系副教授／林德政／97

一個元氣十足的真人

電影導演／侯孝賢／105

蕭道應先生傳奇而悲苦的道路（一九一六—二〇〇二）

作家／藍博洲／107

花地的史懷哲——敬悼蕭道應先生

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石聰金／183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敬悼台灣愛國主義前輩蕭道應先生

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189

蕭阿伯，您慢走

世姪／石正人／199

紀念道應伯父——冬天的追懷

姪兒／羅允宏／203

附 錄 蕭道應先生大事年表

作家／藍博洲／207

# 我和老蕭的革命歲月

黃素貞

## 從福州回台灣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七七事變爆發。旅居福州的台灣籍民在蒼前山居留民公會會議之後，決分三批回台；第一批為婦孺，一大部已於七月廿一日乘盛京丸啓程。

八月十九日，第二批以商家為主的台灣籍民同樣搭乘免費的日本商船盛京丸，由福州滬尾啓程，開往台灣。

這些原籍台灣的乘客大體都已經久居福州各地，在各行各業經商；當然，裡頭也有一些為非作歹的無業遊民。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所到之處都設有領事館，並且通過學校、文化機關、商店行號等，繼續奴化管理這些離開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人；他們爲了鞏固勢力而唆使那些無業遊民到中國各佔領區爲非作歹。那些所謂的「台灣浪人」不但在中國的土地上賺中國人的錢，而且還把各種遺毒留在中國本地呢！

這天，正是舊曆七月十四日，一輪圓月掛在海面的天空中，月明如鏡。船開航了一天，白天的暑熱稍爲降溫了，甲板上這裡一堆那裡一堆成出來透氣的人；他們

正對這次的返台之旅議論紛紛。

這次，日本領事館的「撤僑」行動，雖然讓大家免費乘船，卻規定每人只能帶一個皮箱的行李回台灣；因此，人們都只能空手回家，在福州辛苦了幾十年所積存的財產，都不能帶回家。因為這樣，大人們議論著：這次的戰事是否能像「九·一八」及「一·二八」等侵略戰役，幾十天後又讓他們再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呢？大人們擔心這次鬧大了的戰事會延續下去及往後的生活問題。

可小孩子們的心情卻不一樣。因為過去日本不管是打東三省或上海，它製造的戰事都是短暫的，只有幾天、個把月就結束了。因此，他們以為這次的蘆溝橋七七事變，中國也不會抗日，戰事也不會擴大；結果又是日本佔領一些地方，得到賠償，然後戰事就平息了。因為這樣，他們不但沒有對未來感到任何不安，反而抱著利用暑假回故鄉遊山玩水的興奮心情，準備在回鄉探親後，買些日本貨、文具等生活用品，再快快乐樂地重回福州，繼續學業。

我原是孤兒出身，養父原籍台北汐止山上，當我四、五歲時，全家便遷居福州。當時，因為養父中了「天財券」，獎金兩萬五千元，於是就在福州開了家台灣餅店，從台灣請了些師傅過去，日子算是過得蠻好的。在這期間，養母又從北投領養了一個妹妹回來，於是我們兩姐妹就一起這樣生活。之後，我依照規定，在福州台灣人辦的東瀛公學校讀書，接受了六年的日本教育。公學校畢業後，養父並不希望我回台灣，要我留在福州讀書，於是我就直接報名長老教會聖公會的陶淑女中；

因為漢文底子太差的緣故，由小學五年級讀起。在福州蒼前山的教會女中接受了初中及高中教育。然而，當我唸完高二，正在為高三要學的幾何三角發愁時，養父母突然命令我束裝回台，暫避戰事；那時候，我真如突遭青天霹靂般呆住了。

我父親在香港做生意時，曾聽過孫中山先生改革政治對興建興中會的演講得有民族概念愛中國的思想，所以平常也不愛理日本領事館的人。父親沒受過多少日本教育，也不學日本話；領事館除有位老鄭先生二、三個月來查看外，從不去找領事館或台灣公會的人；平常見到日本人時總是躲閃，很少跟日本人來往。養父對日本人的態度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也使得我從小就十分討厭日本人，覺得他們很壞，對人都兇巴巴地。我曾經想過，自己看到日本領事館的人就害怕的心理，回去台灣怎麼受得了呢？因此想到不回台灣，就留在學校參加抗日運動吧！

但這次父親也感覺到這次蘆溝橋的侵略戰爭鬧大了，中國人的抗日言行熱潮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洶湧而來，使人躲避不及。媽說的不錯：「台灣人，好壞相拖累！」我們家雖然只是個老實的餅店商人，卻也非躲避不可了；於是就按規定每個人只帶了一件行李，將所有的床鋪雜檔都鎖在屋內，由福州南台僱船先到滬尾，趕上盛京丸。當時，爸爸已是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媽是小腳婦道人家，妹妹只有十一歲，最年輕力壯的就是我了。因為不能僱苦力，這是我此生最累的一次旅行。

我和同樣假稱是「廈門人」的林基澄姐妹在甲板上聊天；她們原籍新竹，她們的父親和日本人較有聯絡，知道的消息也較多；她們告訴我：「這次的戰爭確定不

像「九·一八」和「一·二八」那樣，我們恐怕很難再回福州繼續讀書了……。」我們一直待到感到涼意才互道珍重，各回統艙；然後懷著對命運未知的憂心，聽著引擎震動聲奏響的和鳴曲，逐漸入睡。盛京丸載著這批各懷心思的老少男女，在月夜裡繼續向台灣駛去。

## 教北京話

蘆溝橋事變是中國全民團結抗日的開始。

與此同時，台灣正在高喊「大東亞光榮戰爭」。台灣的報紙和電台每天只報導他們「皇軍」出動多少架飛機丟炸彈，以及勢如破竹所向無敵的顯赫戰果；相對地中國的抗戰消息卻靜悄悄的。「啊！」我焦慮地想著；「中國真的這樣不堪一擊嗎？抗戰真的失敗了嗎？」我安慰自己：「不！不！不！戰爭正在延續著，戰火正熾熱燃燒著，只是戰區範圍擴大了，全民抗戰真的開始了！」我看到許多台灣人在「皇民化」中生活，為「大東亞戰爭」爭光榮的嘴臉，於是怨恨自己不能在大陸參加抗戰，卻跑回這鬼地方，天天聽著那些鬼話鬼叫。我問自己：「既然回福州讀書的希望已經落空了，那，那，我要怎麼辦呢？……」

然而，對我們一家來講，眼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怎麼解決基本生活的問題。起先，父親以為只是一時的逃難，回台灣後就暫時住在淡水的外婆家；但是，戰爭一拖延下去，日子久了，我們由福州帶來的一些積蓄也快用完了，往後的生活費就

成了問題。父親離開台灣已經二十幾年，故鄉汐止、深坑一帶的茶園已被叔侄佔有耕作著；父親自己也不是個耕作者，於是決定另謀出路。但是，此時，父親的老東家——茶行老板，由於戰爭的不景氣也不能僱用他了。我是家裡的老大。我想，素娥妹還是小學六年級，應該繼續求學；家裡的生計自己一定要挑起來；於是就想出去找個工作。

這時，住在台北的舅母和表姑告訴我，台北青年有股學「北京語」的熱潮；她們勸我到台北教北京語。我想，我的國語發音還算標準，在學校時還經常代表班上去參加國語演講比賽，而且也帶回一本國語注音符號的字典；只要教課後勤查字典，教國語，對我應該不是難事！這樣的話，我不必用討厭的日語就能心安理得地賺錢養家，於是就到台北。

父親在太平町二丁目法祖公附近租了一棟一房一廳的房子，解決了一家人落腳的地方。我那就職鐵道部的表姨丈隨即介紹了三四位同事，每晚晚餐後，利用他家客廳的圓桌上課；我自己編教材，每晚教二個小時，每人每月三元；二個月後，學生增加到八位，就改在我們租的房子，分批上課。這時，因為保正說，我沒申請許可，警察要來調查，我就分別到這些學員家上課。他們有的學會話，有的讀小說報紙等等；因為大家都受日本教育，離開漢文太久了，學習態度很認真，我也教得很有興趣；這樣，生活也因為有些積蓄而逐漸安定了。但是，因為未經許可，我心理上很矛盾——既對日本當局充滿恨意，也總是怕怕地；我想，總不能一直和日本人捉迷藏吧！



## 人生轉捩點

就在此時，和我同船回台的林基澄小姐來找我；她的父親林冬桂先生回台以後也在大龍峒教國語會話。她告訴我，林冬桂先生的國語班不但有申請許可，而且日本當局還要徵用他的學員，甚至連廣播公司都要請她們倆姐妹去當廣播員。她因此要介紹我到宮前町（現在圓山附近）的宿舍去教幾位高等學校的學生；她說他們都是客家人，是高級知識分子。我因為學識不高，猶豫了一下，可我想，既然我已經不能升學了，往後的前途只能靠自己努力了，何況我在此之前已走出人生的第一步了，爲什麼不敢去呢？

豈知，這一步再跨出去，卻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他們這幾位客家青年！鍾九河、蕭秀河、鍾和鳴、蕭和應及蕭道應，都是富有民族意識、愛中國、仰慕祖國的愛國分子者的後裔；自從台灣割讓日本後都在明裡暗裡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是切切實實的抗日分子；他們不但跟我學國語，也愛聽我講大陸的情況，更愛跟我學唱歌。我們唱「三民主義，……」，讀三民主義；我們唱流亡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平常，他們愛吃中國料理，愛講家鄉話；他們經常談論中國的抗日戰爭，他們知道蘆溝橋事變是民族的戰爭，所謂「大東亞戰爭」是大和民族和中國人的戰爭，是抗日的戰爭，所以，鍾和鳴和蕭道應非常想去參加這次的爭鬥，準備有機會就找同志，奔向祖國參加這民族戰爭，挽救台灣脫離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因爲這樣，我感到自己學生時代的抗日思想終於找到了歸宿；我也很樂意地和他們一起籌劃著離開台灣，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夢想。

一九三九年，台灣廣播電台要招考北京語的廣播員。我雖機密教授國語，但管區警察是知道的，所以一定要去報名。但這批客家學生中向來沉默寡言的蕭道應知道以後卻認真地和我討論；在我的印象中，他喜歡穿唐裝，是一位熱愛中國的青年；他先詢問我的意見，然後表示說，這是在幫助日本政府做事，我應該極力避免；並勸我以結婚爲由，拒絕任職。我和父母商量以後，他們也認爲蕭道應的建議可行。這樣，蕭道應和鍾九河就在大龍峒租了一間二層樓房；我也「假結婚」地搬過去和他們同居。

後來，聰穎、愛國的鍾九河，在台北高校畢業考試後，因腎病逝世。我們因爲喪失一位積極的愛國同志而感到痛心。幸好，鍾和鳴由東京回台，要我們收拾悲傷的心，一起準備回祖國參加抗戰！在台大醫院當護士的台灣抗日英雄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及另一位楊姓護士，也決定和我們組團回去；可惜，後來楊小姐因肺病發作，不能成行。和鳴在日本認識的一位周姓同志，原本約好回台後跟我們一起回祖國的，可惜也因爲在船上患了肺炎，祕密在台大治療中也喪生了。我們未出師先折兵，情緒受到很大的打擊。

鍾九河病逝後，我父母就搬來大龍峒，跟我和老蕭同住。一九四〇年春，我和老蕭就此順理成章地結了婚，結束了單身生活。結婚時，屏東佳冬故鄉老祖母、伯

父母給了我們一些錢；可我們不舉行封建儀式，只做一些喜餅，告知親友；然後把贖下的錢，一部分給我父親當做往上海謀生的盤纏，一部分向親戚朋友購買黃金，以備將來往祖國的費用。

二月間，鍾和鳴及其表弟李南峰在美濃故鄉已辦好護照。蔣碧玉的護照也陸續出來了。這時，老蕭七十三高齡的祖母突患高血壓病，臥病在床，需人服侍，我得先回老家去盡孫媳婦的職責。他們三人便一起乘船，先到上海，接洽回內陸參加抗戰的路線。

這時，我的父親也已赴上海謀生，家裡只有母親和素娥妹和我們同住。老蕭和我早就以前往上海遊歷的名義申請護照，但遇到阻撓，遲遲出不來；我們考慮再三，只得送禮（半打葡萄酒）給警察，並改以「考察開發」的事由申請，這樣，護照才順利出來。

然而，蕭家祖母的病，未有起色；我們只得再次回鄉探望。老祖母牽著我們的手說她贊成我們回祖國，但必須早點回來。老人家寬宏大量、不自私的心胸，使我們忍不下心馬上離開。畢竟，這是生離死別啊！

不久，李南鋒從上海回台灣，他說，國際形勢有變化，日本佔領地越來越大，通往內陸四川、重慶的路線被封鎖得更加嚴密了，只剩下香港這條線了。他說，我們最遲在八月一定要到達上海，跟他們會合，不然，香港這條國際路線也可能會被封鎖掉。

李南鋒要回上海時，我們便把先前所買的黃金，溶解成金條，讓他塞在屁股裡頭帶去，做爲大家日後的活動經費。然後，我和老蕭便安頓我母親和娥妹，要她們變賣所有東西，搬到上海和父親同住。其實，我們並不是要遠走高飛，一去不回！只是，我們此去是要和日本帝國主義爲敵，日後也不知道究竟是死著相見，還是活著相逢？可我那幼小的娥妹還是那麼天真無邪，她看我給她前所未有的那麼多錢，就對著我傻笑；我只能告訴她：「妳留著，慢慢用吧！」唉！當時那種生離死別的複雜感受，真難挨。可我知道，對我來說，長久以來參加抗戰行列的盼望，已經不是遙遠的憧憬了，我就要跨出第一步了呀！

## 驚險的開始

我和老蕭排除萬難，終於在基隆乘船出發，三天後，抵達上海。蔣碧玉和李南鋒來迎接我們，鍾和鳴因爲時期緊迫，先赴香港連絡關係。鍾和鳴在日本大學求學時見過不少國內的愛國志士，對抗日形勢和政治見解，都比一般台灣青年精明許多。相對地，老蕭從未離開過台灣，爲人耿直，不含糊，凡事要求按照計劃；所以，當我們滿腔熱血經數日顛簸到了上海，卻見不到鍾和鳴時，他就有種失掉舵手，亂了陣腳的失望。我們只得硬著頭皮，先到日租界我父親的住處落腳。

一天後，鍾和鳴從香港來了電報，要我們立即到香港中美旅館會面。情勢非常緊急，我們於是喬裝成上海商人，買好船票，乘船前往香港。在船上，我們丟棄了

日本的護照，看著它隨海水流去。我們四人於是以無護照之身，僞稱要到香港經商的「廈門人」。那是一個風和日暖的秋天，海風在甲板上舒服的吹著，藍天碧海，海闊天高；我們原先害怕遇上日本憲兵警察臨檢而戰戰兢兢的；可後來我們得知船在航行中不需擔心憲警和稽查的臨檢，於是才放鬆心情，自由暢快地享受那風平浪靜的航行。

船到了香港，我們就住進鍾和鳴電報上所說的中美旅館。天已黑，我們卻找不到鍾的蹤影；因爲是在人地生疏的香港，找不到領導的我們都焦急萬分。「糊塗先生」是鍾和鳴的綽號，因爲他這麼糊塗，我們也就糊裡糊塗的過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後，我們都憂心忡忡地等待奇蹟出現；果然，九點多，鍾和鳴就出現了；說他的行李已搬到回上海的船上，準備回上海去了，來看看上海有沒有電報來？還好，這劫難在時間上沒有鑄成。我們也就搬出中美旅館，跟鐘和鳴到九龍那邊；吃了豐富的午餐，慶祝我們五人的「勝利會師」。鍾和鳴說，他到香港只見到《中華日報》的秘書，他不肯寫介紹信，告訴鍾說，要回大陸抗戰，只要到了沙魚村，說：「我們是從台灣回國，參加抗戰的！」就可以了……。

吃過午飯，我們就期待著明天黎明的到來；屆時，我們五個滿腔熱血的台灣青年就要進入祖國大陸之門，參加抗戰了。

第二天，我們在九龍車站擠上粵漢鐵路火車，然後在沙漁村下車。這地方純粹是個村落，沒有崗哨，也沒人管理，只有幫人挑行李的挑夫；我們於是僱了二個

挑夫，扛著五個大皮箱，匆匆忙忙上路。

在路上，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那些挑夫馬上就丟下行李，跑了；我們覺得莫名其妙，站著發楞。其中一位比較靠近我們的挑夫情急地說：「你們怎麼不藏起來，敵機來了。」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日本飛機來轟炸我們中國啊！就在不久前，我們在台灣聽廣播時，總是聽到說：「我方出××架機次轟炸，對方都靜悄悄。」現在，我們也已經成了它們轟炸的對象了啊！挑夫急切地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樹叢中去蹲躲，還要我們把身上的白衣服脫下來；他說，白衣服正是敵機轟炸的好目標呀！不久，飛機飛走了，我們又繼續趕路；幾個小時後終於走到淡水。

我們在淡水乘船，前往到惠陽那邊的國民黨駐防地——惠淡指揮部；這才算正式進入國門的第一關卡。

船是容一、二百人的木船，上船時，不必買票，也不必證件；船開了，自然有人來收錢；珠江江面很寬、很大，有二、三十位船伕用肩膀拉著大繩索在岸邊走，口中不斷呼著「咿呀咿呀」的歌，一步步地往前走，江邊、山丘、平地都沒阻礙，船也就逆水向前駛；我在靜靜的韻律聲中睡著了，並且第一次夢見妹妹和媽媽……。

船靠岸的時候，有穿民服，荷槍實彈的部隊，向上岸的人索看良民證；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既拿不出什麼證件，也沒有介紹信，只說：「我們是台灣人，我們是要回國來參加抗戰的。」「我們可以見到長官嗎？」「我們是千辛萬苦瞞騙日本



人才逃回國來的愛國青年。」……我們好像見到久違的親人那般，一股腦兒地要人家聆聽我們的訴苦。對方說：「你們可能要去重慶，重慶好遠呀！」「你們要去黨部，今兒暫歇。」他們講的都是廣州話，我們講國語；言語的溝通不大順暢。

到了指揮部，我們還餓著肚子，就要跟著我們的他們幫我們叫飯。我們不知道所謂「台灣人」給他們的印象如何？我知道，在福州，因為那些依靠日本權勢為非作歹的台灣浪人——「台灣仔」，一般人對「台灣人」的印象可能不大好。但，我們五人卻都不知道呀！我們都自以為是堂堂正正的台灣人，自認為懷著對國家民族的真誠熱愛，要回來盡自己微薄的力量。豈知，我們要澄清自己的身分、得到了解，還要繞一大段路，花一大把心血呢！

祖國的大門雖然敞開著，可我們想要昂首闊步直接進入，卻是談何容易的事啊！

### 愛國有罪嗎？

指揮部有好多房間、好多床，但沒有桌子、椅子，飯菜就排在床上吃；我們沒得洗澡，吃過飯，上上廁所，就睡了。

「匡當」一聲，是有人打破碗了吧？我從充滿離愁的睡夢中驚醒過來。坐在旁邊的碧玉看我雙眼有淚痕便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說：「想家是嗎？大家都一樣呀！久了就習慣了。」

這一晚，我們睡得並不安穩，大家都覺得外頭似乎一直有人在走動，我們上廁

所也有人跟隨。天亮了，我們出去洗臉也有人陪著。我們想出去吃早飯時，那荷槍者也不讓我們出去，只說，他會叫人替我們去買……。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是被軟禁或拘留了吧！大家都因此感到萬分委屈與氣憤。

十時左右，有人送來糙米飯和菜，那位士兵客氣地說：「請吃飯，有事，吃飽再說吧！」我們只好滿腹懷疑默默地嚼著那難嚥的飯菜。我想，這是我們回國抗戰吃苦的開始吧！沒關係，這是我們大家心甘情願的。我們以不懼不怕的心情坦然面對眼前的遭遇，完全沒有想要逃跑的心理。

後來，我們和一個會講客家話的士兵聊過以後，我們才知道，這裡是惠淡指揮所的營地，它們管制維持惠州、淡水間水上船運的安全。我們是不明身分的入境者，他們當然會懷疑啊！我們於是向衛兵坦然訴說我們愛國的衷曲，同時表示，我們期待他們的長官或黨部有人來看我們。

第二天，我們一個個被叫出去問話。他們一共三個人，一位講廣州白話，一位是翻譯。問話的內容大概是：「哪裡人？」「為何回國？」「有何企圖？」「有何希望？」「台灣的情形和家人？」等等。連續問了好幾天，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其中一次，有位大官說：「你們的口供不真實，有矛盾，你們要好好坦白。」有一位甚至說，要我們「投降」。「投降什麼？」那時，老蕭氣極了，立刻用手指指著大官說：「愛國有罪嗎？我們是自己組團從台灣回來抗戰的，愛國也有罪嗎？」

老蕭這句話是用國語說的。那位官員似乎聽不清楚，通過翻譯譯出來給他聽

後，他才聽懂。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言語不通所造成的誤會，好好的的一句話，翻來譯去的，到後來意思就不一樣了；我們也就可能這樣被冤枉了呀！

後來，通過跟衛兵的聊天，我們大概知道：這些天問話的長官都是法官，有位姓李，有位姓方的；以後我們在台灣還見過。他們都是廣州人，語音不通；再加上，「台灣仔」在大陸不是什麼好東西——非漢奸即間諜，不然就是圖謀不軌，以賺錢爲目的的流氓奸商之類；所以他們會誤會我們。

然而，惠陽屬客家系統，當地居民與我們語言相通。那些當地衛兵從我們的行動上也明白，我們應該不是爲非作歹的人，也都同情我們。他們告訴我們，當時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問題；像我們一樣，南洋一帶也有許多愛國志士組團回國參加抗戰，其中有些想到延安參加共產黨的青年就被惠淡指揮所拘捕。他們說，只要是共產黨，通常都是殺無赦的。

我們以後也碰到好幾隊從南洋回國的隊伍，他們都是沒吃過苦的青年男女，白白嫩嫩的；他們能夠以國語交談，只是大家同爲階下囚，沒有談話機會。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衛兵叫我們五個人把行李收拾妥當；儘管，荷槍押犯人的士兵都知道我們不是被捕的「日諜」，而是自投羅網的愛國大傻瓜，他們還是按規定，用繩子反綁我們的手，叫人家挑著我們的五個大皮箱，然後像押解大犯人似地，浩浩蕩蕩地向比較鄉下的郊外走去。我們五個人不知身犯何罪？內心雖然憤慨，但是正義填胸的氣度卻使我們不懊惱，不喪志，挺胸闊步地向前走。

到了幾間沒門的破土屋充當的監獄，我們兩個女人也就鬆了綁；他們三個男人的腿卻用一塊厚木頭（上頭挖洞）做成的腳鐐鎖起來，只讓他們的另一腿自由活動。一直習慣扭頭髮的老鍾，把頭髮扭得更勤了，直說要給蔣委員長寫陳情書，敘述我們五個台灣青年回國參加抗戰，卻因言語不通，引起誤會而被監禁的不幸遭遇……。信寫好後，就由我們五人簽名，並要那些衛兵替我們轉呈或投快郵，希望能有洗刷冤獄的一天。

事後，我們才得悉：有位法官將處我們以「漢奸」之罪，這樣，在每名可領獎金伍仟元的情況下，我們五人的獎賞一共是貳萬伍仟元！可我們當時卻一無所知。我們雖身受囹圄之苦，命在旦夕，卻因心安理得，而能高枕無憂地呼呼入睡。

如此，經過三天；第四天薄曉，我們又被叫醒，要我們整理行李，並叫了挑夫跟我們走；這次，沒有繩綁，我們可以自由在地走著。結果，我們又回到部隊的營地；五個人一起住在一間有床的房間，可以洗澡，伙食也比士兵還要好。老蕭說：「這樣怎麼對得起抗戰的阿兵哥呢！」但是，我們行動還不自由，仍有衛兵跟著我們。我們於是自我安慰地想到：「難道我們已經脫離死刑了嗎？是誰救了我們呢？」

在三天的監禁生活中，我們看到一隊由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結隊回國的青年男女，他們也是因為入國手續不清楚而被誤認是要參加共產黨，因而被拘留的；其中好幾位生了病，有的患瘧疾，發高燒，還在呻吟著。老蕭是醫生，除

了給他們一些建議之外，還送他們一些我們自己帶回國的藥。

這時候，我們才認識到中國國情的複雜；原來，中國聖神抗戰中還有國共兩黨的磨擦鬥爭，許多無辜的人們也因為黨爭而白白犧牲，不爲人知！

## 丘念台先生

我們能起死回生，檢回五條命，當然是黃復先生所賜。黃復先生的正名是丘琮，別號念台；他是清朝駐台長官丘逢甲的嫡系兒子。當中日甲午戰爭失利，將割台灣賠償時，丘逢甲於是將三歲的嬰兒用大眼睛木舟送回蕉嶺原鄉，所以就叫「念台」了。

念台先生在留學日本時便關心政治，回國後熱心國家大事，爲國奔波操勞。抗戰軍興，他在家鄉帶領一隊愛國青年，組織了「東區服務隊」，到廣東最前線——惠淡一帶，做民運工作。他同時也是廣東省參議。他常到縣政府領糧提款；有一次，他聽說有五位台灣青年被送監，法官判定是「漢奸」，將要執行槍決；他就會見陳法官，談論此事。他告訴陳法官，台灣有三種居民，本土的「番人」，福建臺灣移民的「福佬人」，還有就是廣東移民的客家人；像他自己就是生在台灣的客家人，所以名字叫念台。他強調，這些居民中，客家人最愛祖國；他們人少，較團結，好多仍是族居在一起。丘參議說：「台灣原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都派有督軍或專人治理的；甲午之役敗後，台灣割給日本；台灣有許多愛國志士，如我在日本

求學時就回去過台灣，畢業後也去了好幾趟，如果不是台灣本土的愛國志士幫忙救了我，日本人早就抓住我了。」他又說，日本人最怕大陸的中國人去台灣煽動抗日情感，散播抗日種子，所以，這幾位台灣來的愛國青年，他一定要見個面。他然後便請求第七戰區余漢謀司令，讓他問話，重審一次，再決定這些青年是「漢奸」或愛國者？他強調，能有如此大決心，遠離家鄉，奔向祖國者，一定出身有民族思想的家庭，其家族定有抗日淵源。

因此，我們才有離開監獄，回營部更審的機會；並且享有鬆綁和伙食的優待。

當天，我們還是一個個地被叫去問話；這次，是用國語溝通。只見一位單眼斜視，蓄著鬍子（事後才知那鬍鬚叫做「國難鬚」，是為這次國難而留蓄的），穿著褪色唐裝的老人家，坐在椅子；桌上擺個金錶，親切的問話。兩天後，他告訴我們，他認識：鍾和鳴的父親鍾蕃蕃，有一次，他在台灣南部美濃開座談會時，日人聞風而至，就是鍾蕃蕃先生通報他離開的。至於碧玉的父親蔣渭水先烈，他更是熟稔。老蕭的叔父蕭秀利在日本讀醫時，也常跟他在一起。他熱心的問我們——台灣的情況，對國內抗日的觀感，以及此後的希望等等。最後，他說，你們空有熱情而不諳國情，貿然回國參加抗戰，熱情雖然可嘉，但你們第一，入國手續不清楚；第二，不認識任何人；第三，雖然我認識你們的家長卻不能完全擔保你們。念台先生說，眼前我們已沒有生命的危險了，但是，他不能全保我們，我們只能以行動表現來自保了。



我們很高興終於能夠有機會用行動來表示我們愛國的熱情了。

念台先生臨走前又問我們：「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艱苦的，你們能吃苦嗎？」我們異口同聲說：「能！」他於是暗示我們，以後如果有任何事要跟他連絡，可以寫信到第七戰區轉「黃復」之名便可以了；他並希望「後會有期」。

念台先生離開以後，那位陳法官來告訴我們說：「他就是丘念台參議。」他說，我們的運氣還算不錯。丘參議剛好來惠領糧餉，他向丘參議提起五位台灣愛國青年之事，丘參議便表示：台灣不乏具有民族傲骨的愛國志士，但結伴而稍具組織回國參加抗戰者，我們還算是第一次吧！因此，他一定要設法請求上峰先保我們一半——免去死刑，另一半就要靠我們自己以行動來表現了。

丘念台先生在其述著《嶺海微瀾》一書（《中華日報》叢書）也記載了這段史實：「有一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在羅浮山留駐期間，從一批漢奸死刑犯中，拯救了五位台灣籍的男女青年，後來由我請准上級補為東區服務隊的隊員。這批三男兩女的台灣青年，都係大專程度，爲了效勞祖國想去重慶，於民國廿九年由台灣潛赴香港轉往惠州，被我防軍捕獲，認爲是日本遣入內地刺探軍情的漢奸。他們只能表達效勞祖國的衷忱，卻提不出什麼證據來，軍方指其嫌疑重大，準備全體予以槍決，免貽後患。」

「幸當時指揮所有一位陳姓的軍法官，覺得該案全判死刑，有待慎重研究。他知道我和台灣關係很深，便叫我再行審問一次。他們都堅決表示不是替日本做工

作，並各自述說愛慕祖國的熱誠摯意，而且他們的父兄親友，有些我都知名，所以容易了解其實情。

「於是我叫他們各寫陳情書一份呈送上級，並替他們請求暫免執行槍決，解往後方察看偵審。後來在桂林看管了半年調回曲江時，便全體被釋放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呈請七戰區把他們派到我隊服務，這是我們立隊以來最感痛快的事，有了五位台籍青年參加前線抗日工作，更增添了我隊的特色與光榮。」（頁二二〇—二二一）

這就是我們和念台先生的「一段緣」。

### 從惠陽到韶關

我們在送往後方的半年期間，沿途經過前線與後方，途中目睹了中國兒女在大時代所受的苦難；因此，我覺得，當時社會生活的種種狀況，仍有值得一記的必要；畢竟，這也是屬於抗戰史實的一部分呀！

在大家的印象中，總以為監獄應該是有高大的圍牆和堅固牢房的地方；那裡有銅牆鐵壁，鐵欄柵，鐵門，再加鐵鍊手銬和腳鐐，到處都是叮噹響的聲音吧！可在抗戰時期，可能是犯法的人太多了吧，很多監獄都是臨時的。它們大多是在祠堂或大廟宇裡，用木頭或木材簡陋的圍繞或隔離就算了，可以一眼看到擁擠的人們在裡頭悠閒地或坐或站著。

一個半月後，我們帶著輕便行李步出淡水指揮所，由兩位帶槍軍士護送，一站站地步行或坐車前往桂林。一站交一站是公務，軍士們交完差就走了。每一站，交接的時間都不一樣，幾天或半個月的，都看公務的方便。

我們有時直接被送入監牢，和普通犯人關在一起；那晚，我們新犯就一定要睡尿缸邊。有些地方，當我們到達時，當地典獄長看了公事，和我們談話後，就騰出一間空房，讓我們五個人睡在一起。

在獄中，一般吃的都是軍米——糙米（把穀子磨一下就成了，但很多交糧的爲了重量總摻進很多砂石），加把鹽，煮了就吃。味道頂香的，但必需一粒粒的數著吃，不然就會吃到石頭或砂子。我們兩個女的都感到難以下嚥，因爲我們都懷孕了。

第一站，我們走了些路就坐船到河源，衛兵把我們交給河源縣政府；然後關在一座有好高的圍牆的大牢獄。那裡有好多間像是倉庫的平房，用大圓木隔成好幾間，黑漆漆地，只在高高的牆上點燃幾盞油燈，男女要分開住，新進來的犯人要睡馬桶的旁邊，有跳蚤、蚊子。我和碧玉一夜沒睡，坐到天亮。吃飯時，我們慢慢挑著砂石一粒粒的吃；這時，我們又發現衣服裡傳染到有蝨子，於是就忙著找蝨子的卵，殺死它。

沒幾天，我們又被送到忠信。這裡的獄吏召見我們，了解我們的處境後，就讓我們五個人一起住一個房間，又給我們稻草墊地板；並且允許我們到廚房加菜。我和碧玉於是從行李中挑了二件衣服，送給獄長太太。幾天後，離別前，他們夫婦又

招待我們一餐歡送宴。這樣的人情溫暖，在苦難中更見溫馨。

這時候，我們帶出來的錢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一定要賣些鋼筆、衣服之類才可以湊出旅費；我們一路上雖由公費護送，但衛兵和我們的伙食還是要費用的，尤其此去曲江，乘車、坐船都得自己付錢。

從忠信出發的那天早上，那兩位押犯人的衛兵臉色很難看，要綁著我們走；他們顯然認為我們是江洋大盜，不屑為伍，一路還囉嗦著說：「你們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漢奸，還要什麼優待！你們可千萬別起歪主意，否則，我們的槍是沒長眼睛的呀！」我們大家沉住氣，一路上心平氣和地跟他們聊台灣的物產和風土人情，漸漸地，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背景和熱誠，對待的態度就不再先前那樣緊張了。

後來，我們在路上看到好幾個衣衫不整、骨瘦如柴的人，一個連一個地用繩子綁著，迎面走過。有個衛兵就告訴我們說：「那些就是鄉公所抽壯丁，人家用錢僱來頂替的兵，或是拉夫抓來的兵；因為怕他們逃，所以用繩子綁著走。這些人被送到目的地就交差了。那些被拉夫的或替身的，逃了以後又會再賣自己。畢竟，中國這麼大，各省又都各自為政，只要自己不說是逃兵，誰又會知道呢！……」我想，這就是諺語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由來吧！

突然，在山路上，我們聽到客家山歌劃過沉靜的空間傳過來，好大聲，並且是此起彼伏的傳遞著。我還不太懂客家話，只覺得那歌聲很悽怨，感傷！因為這樣，心中就有些難過地覺得此去前途渺茫而黯淡！可我立刻轉念，激勵自己，說：「不，

不……你一定要振作起來！畢竟，『抗日』二字，還沒有一撇呢！」

中午到了忠信羈。因為到下一站連平還要一天路程，所以那晚我們就住在當地的一家小客棧。這裡有個市集，我們看到許多大而不肥的鴨和蒜。衛兵說：「鴨子爛蒜頭，好吃啊！」我們於是買了二斤蒜頭和一隻鴨子，先把剝了皮的蒜頭炒過，然後和鴨肉一起燜煮，好好地打了牙祭。

第二天，我們黎明就出發。傍晚時分，抵達連平縣城，並走進縣長辦公廳。縣長看過公事，馬上分配給我們一間房，幾條長凳，這樣，我們就不必睡地上了。伙食仍是砂粒米飯，不過我們可以自由加菜。縣長得悉我們兩個婦女都已懷孕，就說，此去山路崎嶇難行，還是等看有沒有好心的貨車司機，搭個便車吧！除了有時敵機來襲，跑跑警報外，我們就在這裡過了幾天平靜的日子。

終於，我和碧玉搭上往韶關的貨車了；三位男士於是繼續步行前進。我們坐在貨物的上面（顛簸是不難想像的），看著往後倒退的樹林，以及挑著東西在碎石路上走著的老百姓……，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當車子停下時，我們已經到了廣東戰時的省會曲江了。貨車司機按照連平縣長的囑咐，把我們安頓在一家小旅館，等他們三位男子的到來。

兩天後，天要暗時，他們三人終於走到了。見了面就笑著說，那高山峻嶺好陡，如果我們兩個女生走走，準要走十天以上才會到吧！

這時，有一位軍官來帶我們去吃晚飯；他先帶我們巡禮一下這戰時省會——韶

關的街景，只見滿街燈火通明，街傍排滿了飲食攤子，很熱鬧。我們然後進了一間餐館。吃了晚飯，他又帶我們走向小路，向山上的一座廟宇走去。

### 從韶關到桂林

山上的那座寺廟，是石板建築，很牢固，還算雄偉；當時，韶關軍法處就設在這裡。它用大木頭把後殿隔成好幾間牢房，最後一個小房間讓我們兩個女生住，其它都住男性。白天，我們的門開著，可以到大廳散散步、洗衣服；後來也可向隔壁被拘押的軍官借書報。他們三個男的則和普通犯人關在一起，門是鎖上的，沒自由，每天只有一點「放風」的時間，我們可以去看他。

我們在軍法處住了十幾天，問了一次話，用國語；最後，要我們五個人一起聽訓，勉勵我們：不用灰心，中央一定會給我們安排工作的。

當天下午，我們五個人又被送到鄉下的憲兵隊。這憲兵隊是用好幾間民房組成的，其中一間似乎是他們的俱樂部，前半部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國旗，後半部有長板凳和下棋的棋盤等。

我們在這裡可以自由出入，或是到外面看看風景，或是參加他們的球類競賽等等。

天氣漸漸冷了，我和碧玉那不爭氣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來了；還好，我們每人分得一件大棉襖，既可禦寒，也可當孕婦裝。在悠閒的日子裡，我常常想念台灣佳冬

的老祖母、伯母和姑媽等親人，還有流落上海的父母及娥妹；我想，「船到橋頭自然直」，他們只要不懶惰，生活應該不會有問題吧！至於我們五個人，至今仍在白吃白喝，我們對這種被優待的生活感到不安。其實，我們心裡想的是：究竟我們何時才能得到釋放？何時才能伸展我們參加抗戰，貢獻一己力量的愛國熱忱，發揮爲國爲民工作的能力呢？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們終於在一位副官（他自己介紹）的帶領下，搭上粵桂鐵路火車，前往桂林。寬軌鐵路的火車，車身較寬大又平穩。沿途，田園阡陌，連綿不斷；穿得笨重卻自在可親的老百姓和軍隊，上上下下的，我們因爲初次接觸到那麼多的中華兒女而感到興奮。火車每到一站，我總會聽到賣燒雞、燻雞、包子、饅頭等的喊叫聲。一毫子買十四個雞蛋，這是我此生難忘的數字。火車在長沙停留較久，車站有賣各種食物的攤子，他們三個男的要我們婦女下車，買了二隻燒雞，一些麵食；可我只吃一口，就辣得直跺腳，嘴巴也合不攏了，只能以饅頭果腹了。

唉！湖南的辣椒，永世難忘！

薄暮中，火車駛入山水迷濛的桂林。據說，戰時的桂林是蔣委員長陪都所在地，餐館多，公務員多，來往旅客也不少，蠻繁榮的。我們走出車站，天空正下著毛毛雨，街燈不太亮，說是預防敵軍的空襲。我們前往街上的一間館子，吃晚飯；只覺得道路平坦寬闊，兩旁種植的高大樹木一直連續著；我們走了一些路，雨停了，空氣變得非常清新爽朗；一時之間，真知自己身在何處呢？

我們住進二間好大的房間，似是過去受訓軍官所住的，有鐵床，軟墊和棉被；起居很自由，三餐也很豐盛。有一位倪副官，彬彬有禮，每晚都會來看我們，和我們話家常，有時還買來糖果，大家圍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家鄉風光、家庭狀況等等，什麼都聊。他總是態度謙和地問我們：需要些什麼？感想如何？這樣，我們幾個月來疲憊的身體，因而得到充分的復原。但是，時間一久，我們就自我批評說：「如果我們要享受的話，盡可在台灣家鄉過安逸的日子，何必瞞天過海，逃避日寇，到這裡來享受呢！」於是就追問倪副官：「我們要被招待多久？」「何時約我們談？何時分派工作？」但他總是以一句廣東腔的口頭禪——「無所謂」——回答我們；他勸我們，多看書、練字！然後就送來《中國之命運》、《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書，還有寫大小楷的毛筆和紙張。

在那平靜的日子裡，生活的唯一點綴就是空襲警報。日本的飛機來了，大家就趕快到防空洞躲起來。那些大防空壕建築在好幾座大山裡，內部挖空，裡頭包括辦公廳、休息室、會議室、衛生醫療等地方，還有自動發電機、電燈、空氣調節等；規模宏大，實為罕見。新曆年到了，倪副官說我們可以上街去採購。我們於是買了煮火鍋的菜，吃了第一次離開親人的年夜飯。

## 從桂林回韶關

過年後不久，我們在期待許久的個別談話後結束了桂林的拘禁生活。他們要我



們束裝回韶關，說那裡有工作在等待我們。我們喜出望外地坐上夜車，回到韶關。怎知，我們又被送回山上的軍法處。

我們感到莫名其妙！情緒非常低落，大家心底都感到悲哀，無可奈何，不知所措！可我們很快就再提起精神，以樂觀的心情來等待，因為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愛國愛民族的道路啊！我們沒有怨尤，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實現我們參加抗戰的抱負的。

大約過了十天左右吧！我們又被送回原先的憲兵隊，並且獲得了自由。好幾位認得的憲兵隊弟兄們也都恭賀我們：「你們總算出頭了！」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工作早就有著落了，只是在等待公文旅行罷了。

我們五人當中，只有老蕭一個人有醫術，可以上前線或後方救人；蔣碧玉是護士，也可以實地做救護工作；但是，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三人卻沒有任何實際的專才，那麼，我們在抗戰救亡工作中到底能做些什麼呢？我們開始認真地去想。我們自問能去扛槍，打日本鬼子嗎？何況，我們二個女人已經大腹便便了。如果只靠嘴巴講愛國，那四萬萬同胞不是也都會說嗎？我們想到這裡，更加對自己的天真感到汗顏。

終於，派令下來了；我們也要分手了。

鍾浩東、李南峰分發到民運工作隊，受訓後再分發工作。老蕭、蔣碧玉和我被派往後方的陸軍總醫院工作。

這時候，我們才覺悟到光憑一股熱情要去完成心願，並不是容易的事；爲了替我們安排工作，大家都在傷腦筋啊！過去，我們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難，其實都是我們自己不成熟的思想行爲的後果。怨不得人！

我們應當以此經驗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 廣東陸軍總醫院

戰時的陸軍總醫院在南雄裏東山凹，一塊群山環繞的盆地裡，算是在後方了。由曲江坐汽車，經南雄到裏東，約二個多鐘頭。戰時的臨時野戰醫院由木材和竹子搭建而成的，三、四十間平房，包括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手術房、材料房等，應有盡有；並有民眾診療部，爲老百姓看病，頗具大醫院的規模。

醫生、護士及醫院工作人員的宿舍，分佈在各民房或木料搭蓋的二層樓宿舍；地方都很寬敞。我和碧玉被安排在二樓一個有十個床位的房間，老蕭則住在民房的醫生宿舍裡。我們都在大食堂搭伙。

我們放下行李就去見過郭燮和院長，他很親切和氣地鼓勵我們。郭院長是廣東大埔人，說的是半客家腔的國語。野戰醫院的其他同事，講的也都是廣東話，很少人會說國語，就是會說的，也只能講幾句而已。

老蕭是上尉醫官，派到外科工作。外科主任姓沈，是東三省人，留學德國，爲人耿直而實在，沉默寡言；他和老蕭所受日本系統醫學教育的語言相通，也很器重

老蕭。另一外科醫師張慶民是沈主任的得意門徒，上海同濟醫大畢業。老蕭自視甚高，因為祖父在抵抗日本侵略時讓日人殺死，他從小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單純的抗日理論；在台灣時，他不但不與日人交往，平常除了極好的二、三好友外，也不太和人交往；再加上，年輕守寡的祖母很疼愛他；母親也是早年守寡，幾位弟弟又都於幼年夭折……；使得老蕭養成沉默寡言、內向勇敢的性格。張醫師很欣賞老蕭，於是也向老蕭敘述自己如何在複雜環境成長，在堅苦環境學醫，以及輾轉到大後方來的過程……。因為這樣，老蕭便和他結為知己；不久，老蕭就搬去和他同住一房，互相切磋醫術，並向他學習國內大小事況，生活哲理以及做人的道理等等。這樣，老蕭原本閉封的腦子也通過張醫師的介紹，摻進了不少新思維，他不但對世界大局及中國的抗戰形勢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並且也恍然認識到：原來在中日抗戰生死鬥爭中，國內還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

我和碧玉是下士階。我們也穿起了白護士裝，被派到衛生材料處工作，做些捲繃帶、引流、棉球等較輕鬆的工作。管理材料室的黃小姐是外科沈主任的太太，沈主任原生有一子，在抗戰中犧牲了。我們熱烈地投入得來不易的工作，總覺得有做不完的忙碌工作似底。不久，我們的五個大皮箱也被送到總醫院來了，我們就把毛線或衣裙改爲小孩的衣服，準備當媽媽了。

## 戰地生子

舊曆年過後不久，碧玉生下兒子繼堅。繼堅滿月後的新曆一月廿八日，我生下

繼誠。繼堅比較瘦小，只記得兩個眼睛黑溜溜地，很有精神，不大哭鬧。繼誠比較胖大，兩手肥厚（斷掌），很有力量，運動神經很發達；因為我奶水不夠，他很會哭。

這時候，我們已搬到老百姓的民房住了。碧玉在內科，我在外科；不久，我倆都升為準尉護士。我也學會了血管注射，覺得很有成就感。

記得，三月某一日，那時老蕭仍在大餐廳搭伙，並且輪值擔任採購委員；但老蕭從沒做過家務事，怎麼能採購呢？我很爲他擔心。怎知，他卻運用科學方法，先分配金錢再調配菜色，用心計較質量，把那一期的菜色、質量分配得非常平均，他自己也很高興、自豪。不料，事後袁、鄭兩醫師卻有意見，他們諷刺說，膳食辦得好，表示自己清白有能力，好像也在暗示別人都在貪污嗎？老蕭氣得要死，從此，就回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了。

因爲我們三個人都有軍糧，於是請一位軍需的姨太太幫我們照顧孩子、燒飯。我們每天仍然如常上班，值夜。每天早上，我自己煮早餐的時候，老蕭都會抱他去散步；吃過飯後，軍需太太來幫我們看孩子。我們就一起去上班。十一點半回來午休，軍需太太也要回去煮午餐，我們就自己煮飯菜。午後二點，再去上班，到五點半下班。有時候要值夜，我們三人總有人留守。

我和碧玉買了二個竹做的搖籃，還有蚊帳；兩人把小孩養得很健康。真是所謂「大人一日，小孩也一日」，日日看著他們長大呀！

五月，有個夜晚，我們三個人恰好都必須值夜，只得請軍需太太幫我們照顧孩

子。第二天回來，軍需太太告訴我們，繼堅乖乖地睡了一晚，但繼誠卻吵了一個晚上。我打開蚊帳一看，除了臉和小手被蚊子叮得紅腫外，小腳的外邊也被竹籃割得亂七八糟，血痕斑斑；我心裡難過地想，他一定是因為蚊子咬而亂踢，越痛越踢得厲害，就越被割得厲害吧！然而，他一覺醒來，一看到我們，又若無其事地嘻嘻笑著。他四個月大就被我們帶到河裡去游泳；六個月已會爬和翻身，也會自己扶著床沿走了……。

## 盛暑來了

沈主任要老蕭到外科門診室當主任。替老百姓服務的機會來了，他每天都汗流夾背地工作著。這時，繼誠生了滿頭的癩子，常在睡覺中哭醒過來；陰曆近八月十五的有天晚上，老蕭說，癩子差不多都熟了，到外科門診來把它手術了吧！到了診所，準備好紗布條、黃藥水，一個尖刀一個癩子，把膿水擦掉，塞進紗布條，然後用繃帶把整個頭包起來。繼誠哭了哭後，又咧開大嘴在笑了。

「多堅強的生命力呀！」老蕭感歎著說：「還有多少危難的日子，在前面等著他呀！」

一輪圓月正照著我們回家的路。

不久，郭院長交給我們黃復先生（丘念台先生）的來信；他要我們五個人一起到前線，參加民運工作，並且要五個人整體行動，缺一不可。這時，碧玉早已決定好

了，我還在猶豫中。我不想離開繼誠。我們母子之情已很深，要我放下他就好像要挖掉我的心。我心不忍，不願犧牲母愛。但，再想想，我離鄉背井，離開家庭父母，爲的又是什麼？今天，怎能爲一個小孩而改變初衷呢？

有天下午，我在哄繼誠午睡，但上班時間到了，他還不睡。我忽然覺悟：孩子該是國家的，應由國家撫養，在此國難時期，任務重大，怎能爲了一己骨肉而偷生怕死，難道我就要這樣苟延殘喘地於一隅偷生嗎？不，不……我應該拋開私情，奮上前線，爲祖國奮鬥捐軀呀！

我們五個人開了個會，我和碧玉述說，在醫院病房遇到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將軍的妹妹張三姑的事。張三姑由香港回故鄉——始興，她到總醫院探望華振中（獨九旅旅長）夫人林女士（華夫人帶女兒來治腳疾）時，聽到我們的事情，很感動；就自動說要幫我們找人照顧小孩……。我們於是決議到始興走一趟，把二個小孩送去撫養。

鍾和鳴、碧玉和我坐車到始興，找到張三姑家；可是張三姑去香港了，只有佣人接待我們吃中飯；飯後，林女士跟我們寒暄了一會兒就說，她要我們的孩子，可她有急事便抱著孩子和我們帶來的孩子衣服先走了；後來，那位婆婆——佣人才說，要我們寫放棄孩子的賣身契，還要收他們送的中國銀行十元鈔票各五張，共壹佰元。我們很愕然！很吃驚！我們不是來賣孩子的，爲何要寫賣斷的賣身契呢？情緒難於平靜。我們沒有經驗，不知如何處理。終於，老鍾說，寫就寫吧！何必計較小節。後來，我們究竟怎麼寫？怎麼收下錢？怎樣離開張家？現在都記不起來了。

我只記得，以後，我想到小孩就流淚！母子連心，真沒辦法。

一九四二年春，我們在惠陽丘念台先生領導的東區服務隊時，突然接到林女士女兒的信，寥寥數語，只說繼誠患腸胃病已經病逝……。我身在惠博前線，真是哭訴無門。念台先生看見我痛苦的样子，到惠陽出差的時候，就帶我和老蕭到惠陽西湖邊租來的辦公廳住。惠陽小西湖是名勝古蹟，念台先生去縣府辦公的時候，就要我們多出去散散心，觀看風景；就在這時，我又懷孕了。我想，真是不該在這抗戰臨危的前線給部隊增添麻煩啊。

再過二個月，又接林女士女兒的第二封信，說：繼誠確患嚴重腸胃病，痢肚厲害，已奄奄一息，放在門邊；那時，正是星期六，她剛回家，她母親也在生病，告訴她，算命先生說她和繼誠的命不合，繼誠會死，所以她返校後就匆匆寫（第一封）信給我；豈知，隔鄰有位李姓婦人，是二夫人，無子，看到繼誠仍有呼吸，就把他抱回去急救；他們有緣，又被李太太給救活了，所以繼誠沒死。

然而，我和繼誠終究只有六個月的母子緣；始興一別，就沒法再見面了；等到抗戰勝利，我去查問，這才知道，他已於十一歲時，不幸死於肺病。

## 東區服務隊

從始興回到總醫院的第二天，沈主任特地設宴，為我們餞行；大家環坐在他家二樓的客廳，情緒非常低沉；他那低沉而堅決的話語，句句打在我们心上；他說：

「我昨天才知道，你們爲了抗戰，送走了自己的兒子，我心中非常難過和讚佩。」他又說：「我和我大兒子離別二十年左右了，一直沒聯繫上，前幾天，我才得到消息，他已經爲國成仁了；這本是意料中的事啊！戰爭，本來就這麼殘酷，生離死別的，你們可要珍重啊！」

第三天，我們結束了總醫院的工作，在醫院同事的祝福聲中離開裏東，步行前往前線博羅。臨別時，郭院長說：「前線醫藥非常缺乏。」因此下了條子，讓我們帶著二個救護箱，裡頭有體溫計、消炎藥、退燒藥、外科的灰錳氧和黃藥粉等經常用藥；雖然量不多，卻應有盡有。我們五個人於是踩著堅毅的步伐，光明正大地踏上征途。

九月的天氣真爽朗，我們每日趕上十一或十二段（趟）路，不算一回事；因爲我們的身子都經過鍛鍊了。有些路，老鍾和老李走過的，很熟；有些路，他們沒走過，就要一站站的問了。到後來，越走越難，腳起泡了，鞋子也破了。他們男士的體力還是比較好，就幫我和碧玉背包包。到珠江下游，有船可坐了；船順流而下，可淤灘很多，爲了加強水流，沿江用石頭堆積成小水壩，把水位加高，一葉扁舟就順流而下；但要是不偏不倚地通過水中央，那就要靠船家的本領了。船跟著流水，船夫撐著槳和櫓，輕快而不偏倚地滑過急流，通過了一關又一關。我們坐在船上，替船夫捏了一把汗；我們心中都在想，若碰歪了或稍一偏差將會如何？但船主一家生命財產都繫於此船上，他一定有成功的把握的；何況我們早就置生死於度外了呢！



餐風露宿。每天，露水未乾，我們就上路了；一直走到天色迷濛昏暗，才停下來休息。一路行來，都很順適。過了十二個晨昏，我們終於來到羅浮山腳徐福田的東區服務隊駐紮地。東區服務隊長丘念台先生，原名丘琮，其先嚴丘逢甲先生係由廣東嘉應州蕉嶺縣遷移來台之後裔，文武全才，與唐景崧總督同為抗日勇士。一八九五年，清廷割地求和，丘家不願為順民，在領導義軍抗日失敗後，帶一家大小回歸鎮平鎮居住。因思念台灣，故稱先生為念台。念台先生後在日本研讀工礦科，畢業後奔走國內二十多省；他的事業根基都在五嶺以南、南海以北的廣東、福建、台灣，為感於當年進行探礦採礦工作之艱巨困難，又因煤礦公司明昇暗降的人事掣肘，更痛感日寇侵略之野心，國事之紊亂，乃出於愛國心，偏離本行，到各地觀摩參觀，考察組訓等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開始，遂直接參與與政治。

據念台先生述著的《嶺海微綱》所載，東區服務隊的成立由來是這樣的：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旬，武漢會戰，情勢不利。……廣東也發生了戰事。先期集結於台灣的四萬日軍，於十月十二日在南海大亞灣的澳頭附近，……強行登陸。我當地守衛隊兵力薄弱，無法抗禦，以致淡水、惠陽、博羅、增城、石龍等地先後失陷，廣州成爲敵軍的主攻目標。」

「當時駐防廣東的國軍，多屬第十二集團軍所部，自撤出廣州後，乃退守清遠、橫口、良口圩以至新豐之線，以阻止當面敵軍的北進。……我軍經過集結整編後，隨即展開各線反攻，先後克復從化、惠陽、博羅、寶安等縣，把日軍迫退至廣

州市內，使其無法對外侵擾。

「在廣州棄守前夕，即十月二十日夜間，十二集團軍總部的聯絡官，突然約我（念台先生）去和副總司令香翰屏商議軍務，原來是轉達余（漢謀）總司令的意旨，要我（念台先生）擔任惠、潮、梅屬廿五縣的民眾組訓工作，即日出發，並發給籌備費毫洋二千元（約值一九六二年的台幣二十萬元左右），指定歸廣東民眾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指揮。……工作方面，首先號召各地熱心抗日的知識青年，加以組織訓練，使能積極協助政府動員民眾，進行長期抗日戰爭。」（頁二一〇至二一一）

念台先生認為工作任務既已決定，又「得到信任與尊重」，就「把考察延安所得的那一套」——刻苦奮鬥，接近民眾，瞭解青年，積極學習等榜樣，應用到隊員身上；並「指出其得失所在」，希望他們「切不可墨守舊套，事事被動」，而要主動爭取工作表現。

念台先生及其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因此大出鋒頭，以致受人密告有「通匪」之嫌，受到長官誤會；還好，他得到張發奎長官的信任、保證，才能洗刷「共產黨」之嫌疑。

我們到達東區服務隊已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了。當時，已是點燈的時候了；但這裡沒有電燈。老鍾和老李已來過一次，雖然念台先生因公外出，大家還是非常熱烈地歡迎我們。隊裡都是年輕小伙子，大家一見如故。當時隊裡男隊員有廿多人，女隊員有五人，因為我們的加入，頗為熱鬧。

部隊借駐徐氏祠堂，過軍隊式管制生活，重自治、自覺、自省、自立，並重學習。隊員程度有大學，高初中等，程度不一，但愛國心都一樣。大家都是離鄉背井，惜別父母，想爲國爲民貢獻心力。

每日的作息時間表如下：

- 一、六時，起床，整理內務，自修。
- 二、七時，開晨計會或檢討會，分配值日，伙頭軍二人，買菜煮飯，歌詠練習。
- 三、九時，開飯，或外出工作，或拜訪或自由學習，教育民眾工作，連絡抗日工作等。
- 四、五時，開飯。
- 五、晚間，開會，工作報告，檢討會或小組討論會，聯歡會等。

## 民運工作

念台先生及領導同志常帶我們五位新來的同志爲村中大小事奔走忙碌。在民運工作中，我們認識了許多老百姓；在聯絡談話中，我們了解他們的困難和待解決的問題；我們通常把有關問題帶回部隊，研究討論。我們發現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囤積居奇以及爲鬼子作伥的漢奸走狗等大問題。小的方面，也爲老百姓排解糾紛及解決家庭、族中困難等問題。

老蕭及我們兩位女護士也常為村中病患行醫，把由總醫院帶來的藥利用得很有功效。原來，這些地方瘡疾肆行，引起的後遺症是面黃肌瘦，肝脾腫大，爛腳疤的人很多，但大家的抵抗力不錯。我們把破衣褲煮過、消毒後，做成繃帶和砂布，用灰猛養、黃藥水給他們治療爛疤，並叫他們不要再碰生水、髒水；這樣，除了已是骨髓炎的沒法醫好外，其他的傷口都會長新細胞癒合的。

用奎寧丸治瘧疾，也是百發百中的。起初，我們把總醫院帶來的用了一些，可是我們隊裡患瘧疾的病患多，瘧疾患者又需連續服五、六天的藥才能把病蟲制服，在藥不夠的情況下，大家都是「周而復始」，治好了不久又再患。老蕭於是建議全隊節省每人三元的零用錢，到淪陷區購買奎寧丸、阿托品和雷佛如爾等醫藥用品。

然而，自從我們節省零用錢買藥後，大家就沒有錢買肥皂了。大家就把燒水洗澡時的稻草堆，用剗子剗出來，不要搗散，放在桶裡，再用開水一沖，鹼水就出來了；我們就用這些鹼水洗頭、洗澡、洗衣服、洗廚房用具，不但洗得很乾淨，而且不傷皮膚。

在長期堅苦的生活中，因為每個隊員的教育程度、家庭環境都不同，一些封建意識或多或少也會帶到團體中來，所以在生活中就會發生許多趣事。比如說，隊長是絕對帶頭的刻苦耐勞者，但老實說，他的體力常在透支中衰弱著。我們女隊員於是常在漱口盅（洗臉、漱口、喝茶、吃飯總是用它）底偷偷打一個雞蛋，讓他補充營養。平常吃豬肉時，總會在飯底下放幾塊小豬肉等。

因意識不同，判斷事情處理人事關係也有差別。如老蕭說多吃豬肉可以減飯量，適時正好有旱災，糧米缺少，他便主張用糧米跟村民換豬肉，確實把大家的饑腸補足了油水，米飯也就少吃了。

我們在地板上睡覺，有稻草就很溫暖了；如果有包米的麻袋，洗乾淨後，內鋪稻草，不但可蓋亦可鋪在地上睡覺，就像鵝絨被一樣暖和。蚊帳也是我們的必需品，幾個人一頂或自己買個小的，用起來、帶起來都方便，以免被蚊子叮，得瘡疾。我們大家都有一條三、四尺見方的包袱巾，睡覺時可以鋪在地板上當床巾，行動時可以把衣服、蚊帳、書籍等疊成約一尺半或二尺見方或長方形，用繩子紮緊，左右上下打上兩個結，背到背上，便可輕快的行軍了。就是五十多歲的隊長念台先生，也沒有例外地自己背行李。

一九四二年春，因為徐福田很潮濕，又巧逢工作需要，大隊就移駐惠陽橫瀝小羅的陳姓祠堂。這房子有左右廂房，上下樓及廚房、廁所，比福田乾燥多了；我們大家的身體也漸漸好起來。這時又逢米貴、豬肉便宜的年頭，我們便實行以米換豬肉的計劃；因為村裡也給我們一小塊土地，我們便自己種菜。因為工作有新的開展，生活也有趣極了。

日本鬼的戰術以點聯線，由前線而後方，一直找空隙深入內地，行軍劫舍、強姦婦女，老百姓聞風都扶老攜幼跑進深山逃避。因為許多地方屬三不管地帶，日軍常來，遊擊隊常到，共產黨隊伍也來駐紮，有時也混戰一場。

小羅地方也來過二次日本鬼，老百姓都逃了，只剩下一、二個老人家看家；有位住在祠堂不遠處的老祖母就給日本鬼子強姦死了。那次，我們在夜晚行軍，邊走邊打瞌睡，手裡拿支竹杖，快天亮時，走到一個圩，有個學校，先遣人員先去交涉借住，後到者打開包袱，一輪下來就睡著了；男生比較辛苦，還要輪流站崗。第二天，據說日本鬼子已走了，我們又回到原地；看見許多桌椅都被當柴燒了，雞鴨也遭了殃呢！

幾個月後，東服隊的工作開展到附近各縣鄉鎮，做文化宣傳表演工作。巡迴表演抗日歌曲、話劇等，鼓勵老百姓團結抗日。不久，部隊又回到博羅徐福田。

一九四二年過完年，巡迴工作告一段落，我們仍駐紮在徐福田。念台先生本打算建立民間的武裝組織，也就是實踐第二期抗戰要旨「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組織重於徵調」。當時建立武裝組織，政府沒有供應餉械，只靠我們運用工作情感去說服民眾，各自提供平時用以防盜的槍械，加以編組訓練而已。

## 到原鄉吸收新血

正當東區服務隊的工作順利開展的時候，惠州一帶也有港九青年和惠州縣城的青年組織抗日政治團體——「東江服務團」。他們由於思想行動有共黨嫌疑，已被軍政當局下令解散。東區服務隊因工作方針和名稱與它有些相同，連帶也招致外間

懷疑。所以，上峰余漢謀長官通知東區服務隊：暫時不要管組訓武裝隊伍之事……。東區服務隊只得遵照余長官之決定，把隊伍調離羅浮山區福田鄉，轉赴惠州以東的橫壢鎮。此地距離前線較遠，文化落後，文盲眾多，我們的工作便以安政教民爲目標。我們計劃在每保辦一間戰時的小學校——保國民小學。但因範圍大，惠陽、博羅、紫金、河源等四、五個縣區，共有四十五間學校要辦，師資缺乏，所以東服隊決定步行回嘉應州，到梅縣、蕉嶺等地，招募新隊員、新師資。

過完舊曆年，春雨綿綿的寒冷季節，我們由橫壢出發，步行至藍塘、紫金、黃塘、河源始乘船至龍川。在步行的這些日子裡，天氣寒冷，每夜下雨，白晝不管是晴朗或陰霾，路都是濕的，草鞋、布鞋馬上就濕透，而發生腳底疼痛現象。大半身體較弱的同志更厲害，碧玉就是最厲害的一位；我的疼痛還在可忍耐的程度，但莫名其妙妙的疼癢，難過得很。老蕭說，那是神經受冷發炎所致，如有阿士匹靈等止痛藥，會好些吧！可惜沒有，只得默默忍受了。有一天，到一村莊，只得遵照土法，搬來破尿缸，放進蘿蔔乾，等尿缸煮熟後用蒸氣——亞摩尼亞來燻腳，果然有效。再不然，就找來兩把棍子，把棉襖反串，做成擔架，由男同志擔著擔架趕路。

這些辛苦難捱的日子，日後想起來，都是值得記憶的了。

坐船的日子算是頂悠閒了。接近嘉應州時，我們都逐漸恢復健康了；以後再步行到興寧、五華、梅縣。

念台先生的抗日軼事大名遠播，各地士紳沒直接認識他的，也間接聽過他的

名。所以，我們所到之處，不難找到住處或蒙招待。在五華，我們見到十二方面軍直屬長官香翰屏指揮官；整隊聽他訓話，並接受慰奠。

念台先生家鄉在蕉嶺，丘夫人的家鄉在梅縣松口。我們在松口的松口中學駐紮了二、三星期。這段期間，我們見到在松口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只見她病體衰弱，真是難過。我們常到丘夫人的娘家梁府串門子，好大的院落，好乾淨的房子，使我和老蕭想起遠在千里外的佳冬蕭家。

我們久聞梅縣狀元橋旁下市的地方就有個蕭家，很想回去一探究竟。我們得到念台先生的許准，於是請古培靈同志一起前往。事先，我們已由一位來應試的東崇中學畢業的鍾同志得悉，現在的蕭家由一位龍芽老家來的叔婆管理，長久以來，她都出租給東崇的學生做宿舍。那時，剛放寒假，沒有學生。

這蕭家，房子還很新，共有三進；兩側是廂房，有的房間還都掛著門簾；屋頂是紅瓦，地上也都鋪著四方紅磚。第三進屋子放有已故長輩的神位牌，以及仍在世的男性的祿位。我們一進到廳堂，就跟回到佳冬的房子一樣，因為太像了。原來，那是老蕭的曾祖父拿錢回來蓋的。據說，抗戰前，老一輩的叔祖、叔祖母、伯父等都常回來小住幾個月；抗戰後就較少回來。

叔婆的兒子以為我們是要回來收租的，還假裝神經有問題的樣子。後來，聽到我們是回國參加抗戰，並由丘念台先生帶隊回梅縣一帶工作，只是順便回來老家探訪，並非以地主身分來要債或討回房子。他才放心熱烈地用藏放了幾十年的陳年酒



和炒麵招待我們。我們沉緬於故鄉的懷念中，暢談了以往老祖宗的往事和大家的近況。薄暮時分，我們才離開蕭家。步上狀元橋，我們依依不捨地看著橋下的流水，望著天際的流雲；然後才急步走回部隊。

這次，念台先生率東服隊回轉家鄉，在旅行中仍然繼續工作。我們每天仍有晨計會，計劃當天的工作，討論檢討會務等。我們所到之處都停留三、二天，張貼抗日抗暴的標語，打擊土豪劣紳，壓抑奸商壟積居奇、抬高物價等；晚上，還為宣傳工作開晚會，娛樂民眾；通過唱歌，演說，表演話劇等方式宣傳抗日工作。每日的工作形式不同，生活忙得充實又熱烈。各地知識青年對東區服務隊更為仰慕擁護，甚至有許多位遠從數百里外徒步前來投效，實在令人感動。我們在松口停留期間，招考了一批師資，有的跟我們一起回橫壠，有的慢幾星期才趕到。

這時候，東服隊因為增加了新血輪而朝氣勃勃，更有一番新氣象了。

## 鄉村教師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們又回博羅，籌辦羅浮中學與許多間保國民小學；大家為落實「教育上前線」的口號，努力工作著。我們以羅浮山的沖虛觀為羅浮中學校址，積極籌備；而保國民學校先由招募來的隊員老師積極推出，幾位老同志指導籌劃，進行得很順利。因為當地兒童失學太多太久了，家長都覺得有此需要，所以保國民小學蓬勃地開辦了。

正當大家都忙得很好的時候，老蕭卻突然發高燒了；最先是屁股生個瘡，只得借劉同志的利刃，叫我開刀，流出很多血水，幾天後也就好了；可是，高燒還是沒退，沒發冷，只是發高燒，不像瘧疾。古同志眼看老蕭一百台斤的身體只賸下五、六十台斤，身體太虛弱了，就請來一位姓張的軍醫官，幫他看病。張醫師只注射了一針葡萄糖，不久，老蕭就惡寒大作；我簡直被嚇死了。不久，老蕭又發高燒。第二天，仍然有發冷後又發高燒的情況，以後就每天有定形的瘧疾出現。老蕭自己診斷是患了惡性瘧疾，於是天天服奎寧丸，病就漸漸好了。然而，脾臟卻腫大起來了。有一天，老蕭看到一條錦蛇，他就拿石頭來把蛇打死，要煮來吃，補身體；可念台先生怕有副作用，不讓他吃。老蕭生氣地大聲嚷嚷，他大學時研究過蛇毒……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生氣。

老蕭身體漸漸康復，我卻患了瘧疾。這時，部隊又調回橫壠倭陂一帶；我們全體住進一座德國主教的洋樓，環境很好；德國人已回國，不遠處有位范牧師；洋樓很大，床桌椅都有，部隊住在樓上。

這時，我已懷孕滿七個月了，就服奎寧丸，一方面治療瘧疾，一方面催生；結果，我在樓下右邊一個房間，平安產下一個女嬰；雖然很小卻五官俱全。念台先生給她取名叫「惠區」。以後，隊裡隊員凡得男嬰者，都取名叫「X東」，得女嬰者都取名叫「X區」。惠區四個月時只有四斤重呢！在部隊，生活大眾化，當然也沒錢買牛奶；記得，她小時候只服用過一罐牛奶吧，那還是奢華的進口貨呢！從小，她就吃米磨成粉煮熟的糊，或是同志們閒暇時抓來的魚蝦進補。

在倭陂、藍塘、紫金一帶工作到過年，各地的保國民學校已辦得差不多，成績很好。我們由後方招募來的後方青年同志，熱心工作，彌補了這幾年各鄉縣政府因戰爭而停頓的教育工作。

此後，念台先生本擬帶領同志回羅浮山前線，積極辦理羅浮中學事宜；另一方面發展淪陷區台胞聯絡滲透工作。但政府以爲收復台灣已有全盤計劃，對從事收復台灣的佈置也已有所掌握，不准單獨行動；所以，念台先生只有退求其次，和四戰區長官張發奎及惠州指揮所主任香翰屏商量後，部隊便開回博羅羅浮山南麓地區，興建中學校，以教育民眾的文化工作爲重心了。

羅浮山週遭的鄉村早已成爲半淪陷區，敵我各方都不多管，當地民眾只有靠自己維持社會秩序和自謀戰時防衛的辦法，與敵人捉迷藏。這些三不管地帶民眾對東區服務隊的刻苦耐勞，對念台先生以身作則的服務精神，和藹可親的態度非常尊敬。所以，這次東區服務隊雖身無分文，卻能以「政治重於軍，民眾重於士，精神重於物質，組織重於徵調」等原則，按照「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政策，按部就班地創辦羅浮中學。

抗戰中，政府雖然不能給予補助，各位同志仍然工作熱誠，只怕工作推行不順利，沒有人計較職位高低與薪給，凡事以開會討論解決分歧，然後大家就分工合作，熱心地默默執行，絕不訴苦。

羅浮中學的校長是念台先生，教導主任由古培靈同志擔任，訓導主任是徐森元

同志。教員就由隊員中挑選擔任。

老蕭被大家推選擔任總務主任。老蕭是以大公無私、節流生息出名的人。他把學生繳交的米穀，由總務組統籌出借或先糶出去，再把所得利潤，用來維持學校的各項開支；他向沖虛觀借場地，充當現成的教室與宿舍。

一九四四年，羅浮中學在這三不管地區創設了；它不但是當地青年智慧的泉源，也為小學畢業生創造了繼續升學的機會。那時，惠區將屆週歲，我也派到橫壩小羅地方的保國民學校任教務兼教員。那年夏天，惠區已可站著吃飯，巧遇旱炎，天氣炎熱，沒下雨，老百姓的農田都龜裂了，井裡的水要很深才能吊半桶水上來，我們都沒得洗臉、洗澡，學生也交不出每月的斗米，我們只能喝稀飯度日；有些窮困的老百姓甚至到樹林，找樹根野菜度日，還有人把未成熟的稻穀剝來吃。

這是我一生難忘的苦難情景。

有一天，老蕭由博羅沖虛觀背一袋米來給我們做糧食。他步行了二天，過河時遇到漲水，就把背囊放到頭上，游泳過來；米碰到水，有些潮濕了；他的肩膀也有兩條皮帶紅紫痕似要出血；可這袋米卻解決了不少人的困境。小學生有的餓得不能走路，他們早上喝了米湯來學校，小便幾次後肚子便餓了，我們便請他們喝點稀飯。

當時，惠區患了腸炎，然後又出麻疹；在這醫藥缺乏之時，只能以不變應萬變，少服藥多照顧；我每天背著她講課、教學。上體育課時，放她下來，她因為檢雞大便吃，又患了痢疾；我還是沒給她服藥，天天背著她教書，讓她肚子溫暖，吃

稀飯，好了就吃一點魚，補補身子；她也就慢慢地長大了。但她的發育比普通小孩慢幾個月的樣子，一直到一歲七個月才會走；她很多尿，老蕭說，是褲子穿太薄的關係，我於是把軍用短棉襖改成長外套，讓她穿，她的下肢較暖，真的就少偷尿尿了。寒假開始，學校放假，我便背著惠區回羅浮山沖虛觀隊部。那時，惠區常在觀裡到處學步。沖虛觀附近住了些客家籍的勞動人家，有位老婦人認為我和她有緣，認我做乾女兒，惠區就是她的外孫女了；她常幫我照顧惠區。那時，這村的保國民學校沒校長，我就留在該學校。這位媽媽幫我帶惠區，使我能全力致力於校務，好好工作，取得保民的愛戴；這都是這位老太太所賜的，我並沒給她半點物質上的好處，她卻肯辛苦地為我背惠區。她那微駝的身子，至今仍在我眼前浮現；有朝一日，我如能重遊舊地，一定要到她墳前祭拜、感恩一番。

人生到處有溫情啊！多值得紀念的同胞情誼啊！她是那種為抗戰而默默付出一顆愛國心的人哪！

## 抗戰末期

一九四四年春，正當我們在前線忙於興辦羅浮中學與保國民學校的時候，國民黨台灣直屬黨部在福建漳州正式成立。丘念台先生接翁俊明先生令，為台灣直屬黨部執行委員，負起光復策進台灣失土工作。念台先生隨即結束東區服務隊事宜，於二月間領鍾皓東、李南峰和老蕭步行二十日，到達漳州永安。翁俊明主委遭謀害，

新任主委與書記長均屬外省籍，大家都有隔膜之嫌，但福建省議會議員卻常常與他們研討台灣光復後如何重建的問題。

關於推進工作的組織問題，念台先生和台黨部書記長商定成立兩個機構，一為閩南工作團，一為粵東工作團，各自分頭運用華南各省淪陷區的台灣僑民，滲入台僑團體工作。念台先生認為「要運用台僑滲入台灣，必須在接近淪陷區的地方去做，羅浮山區毗鄰日寇佔領根據地的廣州和香港，我們在那邊已有五、六年的工作歷史，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民眾基礎，豈不是發展台灣黨務的最好地區嗎？當然我們不能捨棄這個工作基地。」（《嶺海微觀》二二二頁）因此，這時，羅浮中學及保國民學校仍由其餘同志負責，繼續教課。

當時，共黨一直注意我們東服隊的工作，常乘機派人吸收工作熱誠的同志；，已有好幾位同志都到東江縱隊去了。廣東省黨部委員兼地政局局長都曾坦白的表示中央和省會黨部嫌疑東服隊有共黨嫌疑。念台先生則據理力爭說明他的思想與作為。後來，特務又在外間探問，尋根究柢，這才知道，念台先生的行動方法是很新的，類似左傾的；但他的思想根源都著重於講忠、講孝，絕對是頑固而右傾地。

在抗戰的若干歲月裡，出現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就是凡在前線刻苦努力的人，很容易被人懷疑為具有「共產黨」思想的左傾份子；遭受懷疑的人，如果不善應付，甚至可能被「逼上梁山」，真個投入共黨。念台先生率領的東服隊歷次遭受誤解，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四四年夏，老蕭仍跟念台先生在福建。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在古培靈同志的安排下，與許博齋同志及惠區，乘船潛入廣州。我打扮成鄉下人，到白雲酒店找老蕭的叔父蕭秀淮；他恰巧不在，叔母及三個兒女住在九樓，她們以親人久別重逢的心情招待我。他們在這裡做囤米的生意。白雲酒店由住在八樓的蕭秀珍管理。她得知我由內地出來，也不叫我去見面，馬上先去報告日本領事館，說有蕭道應的消息。在此之前，日本領事館接獲台灣方面的密報指出，失蹤五年的蕭道應夫婦，可能在廣東，是積極的抗日份子；三天前，日本領事館於是剛有人來查問蕭道應夫婦的事。蕭秀貞很顯然是怕受我們連累，馬上向日本領事館報告我已到達廣州的消息。許博齋得知消息，馬上先回羅浮山隊部報告。我就帶著惠區到中華路的日本領事館應審。那時，秀淮叔用了點錢，編了故事說，我和老蕭回國觀光留學時，誤入了梅縣蕭家，就在那邊生活幾年；因為做生意失敗，欠債未還，蕭道應一時還不能出來，就先由我這個婦人家出來廣州，向叔父借錢回去還債……。剛好，這位問話的鄭上尉是我福州同學；他父親就是過去福州領事館的館員；他直接用福州話和我交談，不用翻譯，也就輕易地相信我了；他只囑咐我：「寫信給蕭道應，收到錢，就快點到廣州來消案。」

抗戰進入第八個年頭，算是最艱苦的時期。敵軍要求速戰速決，瘋狂大進軍，企圖從國軍手中奪取漢口與廣州中間的一段鐵路線，把抗戰中國割成兩段，完全隔斷重慶和散處贛浙閩湘各省的補給站，以及美國許多空軍基地。這樣，它就可使中國遭受重大打擊，還可攻佔湘桂鐵路，摧毀廣西境內的美軍基地與滇緬公路。因

此，廣州差不多每晚都有美軍轟炸機來空襲。聽到空襲警報，大家就都向樓下躲去。有時，惠區睡了，我懶得逃；心裡想既是盟軍的飛機，就是被炸死，也就算了……。爆炸聲和火燄燃燒的奇景，真是太美麗了；人的吶喊和尖叫聲，聽起來好似很近，實際卻很遠。轟炸後，不知又有多少老百姓受到無辜的災害，又將有多少人無家可歸啊！戰爭多殘酷啊！我常常背著惠區，站在八樓的窗口，等待滅亡的一瞬間。那時，我又懷有好幾個月的身孕了。時間在拖延中過去。我又被叫去問了二次話，他們沒太逼我。可能是時局緊張的緣故，日本人已無暇管及台灣人的閒事了；我也就安靜地在叔父家待產。

在待產時，我很不服氣地想到：難道女人爲了孩子就一生無所作爲了嗎？我，我雖英氣填胸，卻也無能爲力。後來得一女嬰，名叫惠瑩；養到八個月，因病醫療誤時，夭折了。我一個人悲傷著，還好有金池舅母和惠區的安慰。

一九四五年八月某日，聽工人說日本投降了，廣州物價高漲，秩序大亂；到處都是別動隊——臨時政府軍，名義上維持秩序，其實卻到處收刮、接收日台人的財產；因爲他們有槍，而槍是不長眼睛的。日軍因爲「無條件投降」而成爲「俘虜」，不但不能保護日台人的財產，而且將他們集中起來，準備作戰俘。他們只能穿著雪白乾淨的軍服，一邊在廣州各地掃垃圾，清潔街道，一邊等待乘船回日本。

叔父、叔母及舅父、舅母準備要逃生，也顧不得我們母女；還好，在秀淮叔孀的贊助下，我才可以帶著惠區，僱船回博羅，歸隊找老蕭。一直到抗戰勝利前，老



蕭也曾出來廣州兩次；老古出來廣州聯絡一次，帶回去在廣州的台民名錄等材料；不幸的是，不久，我便聽說他在工作中成仁了。他是位熱心有作爲的愛國青年啊。

## 台籍官兵集訓總隊

路上交通很亂。可日本大東亞戰爭的失敗，中國抗戰的勝利，使得我敢於懷抱信心，不顧危險，帶著伯父留在廣州的行李及叔母送的縫衣車，乘船直達博羅。豈知，當我找到老蕭時，始知念台先生已解散東服隊，率領幾位同志離開了。我們在舊地盤桓數日，最後決定還是回台灣，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繼續奮鬥去吧！我們於是辭別博羅一帶的老百姓，變賣了由廣州帶回來的東西，作爲盤纏，再僱船到廣州。

到了廣州，我們先到念台先生在廣州的公館，找念台先生；然後再去找舅父母。舅父一生坦直，從不貪污，雖爲白雲酒店的管家，卻兩袖清風；我們於是設法解決舅父的生活問題。白雲酒店已於八月廿日被別動隊接收了。秀淮叔和秀貞叔叔們都有黃金積蓄，已經住到台灣同鄉會爲他們準備的宿舍集中去了。

這時，念台先生已得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長官的批准，將日本政府徵召到中國當軍伙、通譯或看護士的好幾千名台灣人，集中到花地，加以集中管理，名爲「第二方面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並派有符駿總隊長及符大隊長。集訓總隊領有伙食經費，共住進五個倉庫。其中，男隊員四個倉庫，共二、三千人；女隊員一個倉庫，二、三百名。念台先生派老蕭爲中校政訓室主任，我爲少校教官兼女子副大隊長；

此外，他還請來各方面關係的張(旺)、鄧(錫章)、王(詩琅)、池、廖等輔導教官，執行訓管學習工作。

這批台籍官兵隊員和女護士分別來自台灣全省，有的被徵召，有的是自願的，程度參差不齊，思想也有差異；他們普遍對日本戰敗，自己所處的境遇和未來前途，感到迷惘與遺憾。尤其是女護士們，她們初進花地倉庫時，情況淒涼，時感困惑、惶恐，經常有人因為感情不平衡而自殺。念台先生於是帶著我們，用台語、日語，給她們解釋和訓話，這才漸漸把他(她)們的情緒安定下來。

我們訓練的主旨器重於精神訓練。通過上歷史課，給他們講解台灣歷史的演變，以及中國對日本展開民族戰爭的經過；讓他們知道中國收復失地的情況，台灣歸回祖國懷抱及所有台胞都理所當然恢復為中國國民，此後並要負起建設台灣和復興中國的責任。我們鼓勵他們說，大家現在身在異地，應先學國語、學漢文，以後回台灣可以到各階層工作應用，為重建台灣作先鋒。

王教官詩琅先生是台灣文化界的前輩，在報界很有名望，也是抗日先鋒，對台灣歷史尤其精通；所以他的教學，聽的人特別踴躍。他於日據時代因寫抗日文章，被日人打傷成爲跛腳。張旺先生、鄧錫章先生的社會教育，以及我的國語和抗戰歌曲等，學習的人也不少。學員經過訓練後，管理起來倒也不難。

起初，每天早晨的集合訓話由符大隊長擔任，我做翻譯翻成台語；老蕭則以政訓主任的身分，用台語或客家話直接講話；他所講的話，諸如台灣回歸祖國不是

「大蕃薯吃小蕃薯」等譬喻，以後都傳爲佳談。

在離鄉背井、苦等回鄉船隻的半年日子裡，也發生過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如：

一，大家熱心求知，歡樂一堂唱歌，開年歡會等。

二，空閒時到河裡游泳抓蠅子，後來痲肚傳染霍亂，病死三個隊員；大隊參加火葬時，許多人都哭了，愁雲密佈。因爲是傳染病，有女隊員自願去日本軍隊討藥和鹽水針來急救；老蕭爲了杜絕蒼蠅的傳染而下令：飯菜煮好後馬上放進蚊帳內……等。因爲這樣，救了許多人。最後，在幾千個隊員裡只死掉三個人，算是奇蹟。

三，老蕭爲肛門長瘡隊員手術時，因沒有手套可戴，赤手執刀而遭非議；老蕭告訴他們說，我爲了不讓瘡長進大腸而以克難方法急救病患；在沒有手套的情況下，這也是應該當機立斷的作法。話說回來，難道我的消毒過的手不比大便膿血裡的細菌乾淨尊貴得多嗎？我的手都不怕被它的細菌傳染了，你們還怕我的手傳染嗎？老蕭的克難犧牲的精神，當然不是那些養尊論乾淨衛生者所能實行的吧！

## 歸台

那時，台灣同鄉會已找到一條原是挪威（或瑞典）的貨輪——沙班輪，船身還好，但要改爲載客輪船，必須裝修供乘客坐臥之用的四、五層舖位。同鄉會在廣州

開會，決定採取公開買票的方式，讓台胞返鄉；我們集訓總隊隊員們也可以自己籌錢買票。同鄉會開了幾次會，我都列席參加；並且呼籲同鄉會不能讓集訓總隊二百多位待字閨中的黃花閨女淪落異鄉！我強調，女隊員就是沒錢，也一定要讓她們回台灣。經過極力爭取，同鄉會終於同意女隊員可以免費坐輪船的最底層。雖然空氣較不流通，也只得忍耐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某日，在廣州的台灣同鄉會通知總隊部，船已修整好，第二天八時上船。總隊部把女子大隊的名冊交給我，通知她們。大家都好高興，馬上忙著整理行裝，交換通信處，道別等等，整晚沒睡。

第二天早上，匆匆吃完早飯，我們便由僱來的船載向沙班輪定泊的地點。上得船來，把東西放好，大都到甲板上看風景。這時，船上已經非常擁擠了；但船的四周仍然有不少人用繩子偷上船。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快到十一點了，船還沒開；聽說要到下午三點才開。我怕學員們餓肚子，於是和大家商量，由我回花地，拿飯來給大家吃。可我回花地，僱了兩條小船，裝滿六大籬筐的飯趕到時，卻遠遠就看到沙班輪已在冒煙，船身也在動了。我因為有公務在身，以及女兒惠區已在船上，急著催船家們拚命趕，終於趕到沙班輪邊，學員們立即放下繩子，要把我吊上船去。就在此時，同鄉會理事長也趕來了。原來，那船只是在做開船升火的準備，同時爲了不讓偷渡者再繼續往上攀而移動。沙班輪於是又放下船梯，我得以有驚無險地回到船上；可在匆忙中，卻沒把六大籬筐飯送上船來，真是白忙一場。

船開航了，轟轟鬧鬧的聲音也漸歸平靜了，我們幾位教官都睡在甲板上的通鋪一角。我們都暈船了。惠區也不吃不喝。到了黎明時，大家說看到台灣了，但船仍繼續慢開；原來是基隆不給船登陸，只得開到台南安平上岸。

在安平，同鄉會借了學校，可以暫時安身；也發有證明，可以免費乘火車回家。大家都歸心似箭，三三五五結隊離開了。有位學員告訴我說：「老師，昨晚好險，船在外海傾斜，還好那位挪威船長技術好，把船扶正，繼續航行。不然，我想救走老師的女兒游水逃生！」我想，這應該是惠區的最後一劫吧！

那時，我還懷有身孕，我背上惠區，提著簡單的行李，走路搖搖晃晃底。我們坐上三輪車，到台南火車站；再搭火車到高雄，然後再換搭往林邊的火車。

車到林邊，我看到那位沒牙齒的姑婆，手裡拿著背帶，站在車站出口，遙望著我們。她說她已經等了好幾天了。我因為她這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愛」而熱淚盈眶。

回到佳冬蕭家，只有伯母在等待著我們；她總是忍受一切，默默地等待。二個月前，老蕭因為伯父有事已前往汕頭去了；現在，伯父和他都還在汕頭，等著買舟回來呢！

歸鄉的歡樂歸於平靜後，我就利用暑期，把蕭家的二十幾位小孩集中起來，教他們學習注音符號和國語。以後，當地小學的校長和教員也請我到學校，給他們上課。這是我抗戰勝利歸鄉後的第一課吧！

## 組織和我們聯絡上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老二佳區出生。老蕭歸台後，在台北找到杜聰明老師；因為法醫學系的日本教授已回日本去了，他要老蕭在法醫學系當講師，發揮他病理及解剖學才能。八年抗戰中，老蕭離開了醫學書本，還好，病理和解剖學都是他所喜愛的，復習起來並不難；況且，他的同學都是教授級了，只要請教得體，有條理，應該不是問題。

八月，家父黃貢和母親也由上海回到台灣來。家父巧遇老友之孫，他因要趕回福州，便將靠近中山北路巷內的一棟日本房子送給家父。這都是父親平常樂善好施的回報。這棟日本房子雖只有二十幾坪，卻解決了我們一家老小的居住問題。我們一家又團圓了。

這時，鍾和鳴在基隆八堵當基隆中學校長。雖然離台北遠一點，我還是到基隆中學教國語文。老蕭還是時發瘧疾。一家相當忙碌。記得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時間槍聲，老蕭還是跑出去，弄得衣服都是血回來，說是幫人家抬了屍體。後又發了高燒。

二二八事件後，我們分配到台大東門的宿舍，有前後院，房間也大點；我們一家就搬到東門宿舍住。

這時，組織派施同志和我們連絡上了。張志忠和季滢兩夫婦也常和我們一起。十二月底，我生了北區，也離開基隆中學，到王超筠主持的北一女，當庶務主任。

學校事務、家務事，搞得我身疲力倦；每次拿起組織要我學習的文件，就昏昏欲睡，真慚愧！爲什麼不努力學習而虛渡那美好的時光呢？

在印象中，季澧寫得一手好帥的字，辦事也條條是道。張先生和霽可親，謙遜而厚道，日理萬機而不愠。他們夫婦真是好榜樣。此時，季澧也任教北一女中，住在教員宿舍，生了一子（叫楊揚）後，就搬進中山北路，我父親的房子；後又生一女。我要淡水的表姨來幫忙她。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季澧一起任教大同國中。這時，我又懷孕了；雜務太多心不專，他們也不敢付我以大任。我只是庸庸碌碌的，腦中、心中總以爲自己是有所爲、肯上進的知識青年，豈知都是一知半解而已。此時，《光明報》已在人們手中出現。後來，我才知道，它都是在基隆中學及我們中山北路故居油印出來的呢！

一九四九年暑假，基隆中學已被注意，政府雖沒大量逮捕，但風聲鶴唳，大家都開始緊張，學校還沒上課，大家都躲躲閃閃。那時，老蕭的法醫研究室裡有郭琇琮和張志忠的弟弟掛名研究員，他們都是前門進後門出的活動著。暑假後，上班第二十天的九月廿二日，我生下繼光，在家做月子。老蕭特地大辦滿月酒席，請了許多同學好友，表現出我們很安定，並無什麼變化；但第二天，我們就抱著滿月的嬰孩，躲到汐止老家山上。父母深明大義，從沒對我們的所做所爲發過怨言。

後來，我們知道台大的宿舍不久將被討回，暫由工友交來的薪水也將被停掉，父親爲了長久之計，也學會做房子經紀人，每天奔波各地，爲人介紹房子。

## 地下歲月

一九五〇年，基隆中學終於被一網打盡。這是黨的第一損失，第一警戒線開始被破壞了，我們也要轉移陣地。

過了年，老蕭上來汐止老家，把我接到鶯歌黃屋黃培奕的老家。這時，繼光已四個月。黃培奕也是台籍官兵集訓總隊的隊員，他和石聰金等都是愛國青年的中堅份子。黃屋有一大片房間，幾十家同住，各立門戶，以做豆皮爲生，各忙各的，真是個隱藏的好地方。假如不是有內線通外鬼，是不容易被破獲的。

他們得半夜起來泡豆子，天未亮時磨豆子，榨掉豆渣，煮成醬，再挑豆皮，一張張的烘乾，一張張的剝下來（不能太乾，會破）；還要翻豆皮，不乾不濕，恰到好處，才能拿到市場去賣。小竹竿拿掉豆皮，幾次後，還要泡水拿豆腸；一貫作業，技術爲主。

黃屋有四位老人家。老前輩都深明大義，深體時艱，心懷大志。黃培奕的祖父和叔公是眾人的支柱，他們深惡地方的貪官污吏，常爲年輕人講解正義廉恥之事，是黃家的黃青天。二叔公爲人較沉默寡言，但爲正義事，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以後，黃屋事發，他默默地被關了九年，沒半句怨言。真是老英雄！三叔公爲一勞動階級，終日苦幹硬幹，值得欽佩。另一叔公是茶農，住在茶工廠那邊，是明白是非的人，常囑附家中大小，不可多嘴，不可多與外人閒聊，就可確保黃屋安全了。

在黃屋，大家都稱我「阿姑」，宛如自家人。在隱藏的生活中，我除了幫些小



忙外，就是學習了。最初是收聽海外廣播，學習記錄；但沒有隱蔽的房間，事機不密，被人聽見後就不敢再聽，以防因小失大。自己看書報，同時，晚上和婦女們聊天，教她們識字；可是大家太忙，不能經常連續。

台灣政府要舉行戶口大普查時，大家在地下挖了坑洞，讓我們藏匿。但考慮到小孩時有哭聲，很不妥當，大家商量要把已六個月大的繼光送回佳冬家裡。那時，傭人阿時姑，她也是佳冬人，還在台北，和我父母同住；我們於是決定讓她抱回佳冬家。我們先通過石聰金聯絡賴端元表弟，到山仔腳；我扮成村姑，背著繼光，大叔公牽著牛，護送我們前往；石同志確定無人跟蹤，做好手勢，我們才把孩子交給賴端元。

回黃屋的路上，我心如刀割。我想起一九四〇年送六個月大的繼誠到廣東始興，給張三姑的情景……我安慰自己，繼光只是回到祖母身邊，時常會有消息，也有親人照顧他，我應該堅強地勇敢向前走！

那時，鶯歌雖無明眼警察巡視，卻多的是線民和化妝的特務，又正是基隆中學事發緊張時刻。我們送走孩子後也準備逃入山區。男同志正要以三峽烏塗窟附近深山作為根據地，進行武裝訓練，準備裡應外合地實幹硬幹。

在這勇往直前，不成功則成仁的決心之下，我暗暗自問：「爲了革命，要你殺人，你辦得到嗎？」我想，我只是有愛國熱心，有真誠服務的精神而已，論起革命殺人，我是辦不到的。這算是怯弱而富有基督教精神吧！但我有不成功則成仁的決

心，我確信自己在萬一事敗而被捕時能夠堅持。雖然，我並沒被通過爲共產黨員，可我仍有不計較名份的鬥爭決心。

## 山中逃亡小插曲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開始，大陸參戰。我們覺得解放的指望渺茫。鶯歌線民到處亂竄，黃屋已不能再住下去；北部風聲漸緊，各個零星據點漸感不妥，只得改頭換裝村婦打扮，漸進苗栗山區賴阿煥家躲藏。賴阿煥也是由廣東集訓總隊回來的隊員，在自己家鄉山上爲黨作了很多事；他的哥哥是位老實苦幹的農民；嫂子雙眼失明，我常幫她挑水做活。

賴阿煥家，目標實在太大，不久，我們就到隔山的阿金叔家；在那邊約住了半年。期間遇到二次危險，一次是遇到調查戶口，一次是正在洗衣遇上警察；結果，因爲阿金叔的急智，應付得宜，而化險爲夷。

第一次，記得是炎熱的一天，老蕭和也逃匿於此的前桃園縣南崁區長林元枝，在房間裡，我在客廳和大家聊天；那隻大黃狗正和小孩在樹下玩；所以，警察突然來調查戶口時，狗並沒有吠。阿金叔很鎮靜，說我是他的表妹，因和夫婿口角，而到山上散心，玩幾天；馬上就拿柚子來請客。警察向我要身分證，我返身到房間，告知老蕭他們由窗口外逃到樹林去。我拿著假身分證站在一旁，阿金叔請茶，請吃柚子，還對我使眼色，要我離開；我隨則返身離去，等到傍晚，才又回到避難所，

真有如隔世呢！

另外一次，我獨自一人在溪邊洗衣服，迎面來了二位調查戶口的人，問我是哪一家的？我鎮靜地用客家話回答：是阿金叔家的親戚，來玩的；那兩人看看左右，覺得沒什麼可疑的，也就走了。可我卻失了神似地到樹林裡，躲了大半天才回阿金叔家，問有沒麻煩？他們說全家都出去做工了，沒人在家，只有叔母在做月子；所以沒調查什麼，也就走了。

山上人的生活普通都是挑著沉重的蕃薯、砍好的柴及青菜等山產，到街上賣，再換些米、油、鹽、肉回來。我們看到他們那滿臉的皺紋所透露的艱辛，除了感謝他們在克苦困難的經濟中敢於苦撐革命的精神之外，更加不忍心增加他們的負擔；可在逃難中，也只能以國家民族為重，把群眾為我們而付出的金錢和勞力等，推崇為為革命而犧牲；他們看我們一樣地艱苦工作著，也非常尊重、敬仰我們。

平常，他們煮飯都是把米和十倍的蕃薯籤一起煮，煮好了就把米和蕃薯籤濾起來；再把青菜放進米湯燙過；然後把蠻有營養的米湯用來餵豬。如果在菜上有蘿蔔乾或一些肉或鹹魚下飯，那就算很好了。那些飯菜如果有山豬、山狐竄跑過的，就會有狐臭味，我咬一口就想嘔了；可他們卻吃得津津有味呢！

快過年了，阿金叔五歲的男孩就成天高興地喊著：「快要有純白米飯好吃了！」然而，我們卻怕過年；因為大家都會有親戚、朋友來串門子，我們又要躲起來。男同志計劃要去炭窯燒木炭，我卻只能呆在阿金嬸房間，替她抱孩子，補補縫縫的。

苦難的第二年終於又過了。小孩們高興地吃著白米飯、白斬雞和有豬肉炒的菜。但解放的消息卻茫茫然！我們又要換環境了。

## 化整為零

元宵過後不久，組織已有化整為零的計劃，苗栗一帶不再打擾下去了。我們也只好另找出路，回家鄉找親戚朋友發展去了。舅父吳金池和他在廣州娶的太太在屏東的市場賣豆腐、米等為生，孩子們女的嫁了，男的各自有家室；他是個相當接受時代洗禮的人，他知道我們逃亡的決心和回家鄉發展工作的苦心，因此對他唯一的外甥夫婦來訪，非常歡迎；他對親戚子女說，我們在北部生意失敗，準備回家耕田……。怎知，舅父卻因為收留我們，給他帶來往後十年的綠島牢獄之災和夫妻的分離；可他老人家一直活到九十高齡，都別無怨尤。

我們在屏東住了約半個月，老蕭和佳冬方面的同學、同志連絡商量後決定：大家還是不能回家、公開露面，只能到親戚家或有關的鴨寮暫住。因為南部風聲也很緊，特務和線民很活躍，到處明查暗訪，好似預知有台共組織往南移的樣子。

羅冬梨、李丁福是老蕭的老同學，羅芳整、阿坤、耕德等下一輩年輕的智識份子，是聯絡外圍的骨幹。他們在家工作，以養鰻、養鴨、養雞作為掩護，有鰻寮、鴨寮、雞寮等可為藏身之所；指揮若定，消息靈通，經濟也不匱乏。

葉水旺是葉朝的兒子，看養鴨子的本領是一流的；書只讀到三年級，但腦子是

一流的——傻中帶聰慧，通過和我們接觸，學會認字，理解國家大事；他講話有技術，探訪鄉情敵情很有技巧。以後憑他的靈巧，學會做膠帶，發了一些小財。各難友都會分頭到他家去避難，找個地方歇腳聊聊天。有天晚上，我到他家休息，朝嬌帶我到一大水桶休息；在睡夢中，忽見有一男子跨進來，我們二人都嚇了一跳，原來這大水桶是他經常睡覺的地方（並不是天天來）。後來，朝嬌告訴我，原來那人就是陳狄生，也是同學和同路人；他有肺病，不久後就逝世了。三月掃墓後，老蕭祖母的外家孫——林葵——請我們到葵表叔村裡去住。上埔頭，一村二十幾戶人家，只有住在路邊的一戶是外姓人，其餘各家都是親親戚戚；各房間都有門簾，經門簾向外望可看見誰來了，可簾外向，裡望卻看不見人。村裏的女孩——阿菊、阿娥、阿冬和邱賢妹等都喜歡讀書、寫字、做針線等，她們白天雖各有工作，總還是有人來和我作伴。添來叔和阿秀叔等長輩吩咐全村大人小孩，絕對不可對外人說，家裡有外人來住宿；他們也都守口如瓶。添來叔並將稻草堆搭成中空，晚上我們可以爬到裡頭睡覺；他並且和我們約定：如果遇到突擊檢查，就會有人偽裝肚子痛來上廁所，我們就不可以出來。

阿立哥的大鴨寮蓋好了，也請我們這些受難的朋友去住；他還留個小房間，買了蚊帳，給我住。他養了好幾百隻鴨子，白天，男同志就打扮成農人，出外趕鴨子；連台北來的同志陳廷旭，化名老張，也學會了許多趕鴨子的技術。我則在小房間看書，或記記抗戰時的回憶。鴨寮裡白天常有蛇、蝎出沒，青竹絲、錦蛇常由木板底下探出頭來，或爬出去；我本來很怕蛇的，他們告訴我，只要我們不去打動牠

們，牠們只是遊來爬去，不會傷害人的。

有一天，炎熱的中午，我們在鴨寮休息時，外面來了兩個婦人家，其中一位應該是褲子破了洞，要到鴨寮把褲子換邊穿；她走向鴨寮，拉了拉門，然後說：「阿立哥新蓋的鴨寮怎麼關得那麼緊呀！是不是有金條放在裡頭啊！」她用手指挖了挖，看看清裡頭的情況。我剛好就坐在門口，趕快用衣服把門縫遮起來。她後來想從鴨坪走過，因為鴨糞那麼多也很難走，只得轉個彎，叫另一人把守，就把褲子換了面。我們聽到她們其中一人說：「聽說，蕭家的那膿頭回來了，妳知道嗎？」她們一搭一和地說著，哈哈笑；羅、李、陳各位先生都在蚊帳中，慫得不敢吭聲。最後，另一個才說：「阿立哥不在，別以為我們偷了什麼，走吧！」她們走後，老蕭就苦笑著對其他同志說：「她們說的『膿頭』，指的就是我呀！由此可見，我回鄉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了啊！……」

阿立嫂也種花生，收成時，她就拔起來的花生搬到鴨寮裡來剝；她還做了花生豆腐給我們吃，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吧！可惜，就在這年五月，大洪水過後，阿立哥跟大家到林邊溪溪邊去圍佔種西瓜地時，被水沖走了。

那麼壯，那麼豪爽又愛國的一個人，就此永別了！令人尊敬的阿立哥走的那麼早，那麼乾脆，只留下寡嫂和個性強硬的孤兒……。

## 高草的成仁

廣東台籍官兵集訓總隊有二百名由日軍總醫院轉來的女看護助手。因爲日本人對她們的待遇不薄，其中有些人與日人戀愛，甚至有爲日人殉情者。這些女孩子受過戰爭的磨練後，大都能判別是非以及日人侵害的歷史；在花地集中營修過中國地理、歷史、國語文等學科後，對中國漸有好感；她們對集中營的男隊員和教官也有好感，並結爲朋友。男隊員有男教官，如張旺先生、鄧錫章先生、王詩琅先生等領導；女隊員如高草、林秀枝、陳清子和幾位客家妹都對我非常親近。大家較有來往。一九四六年，她們在廣東同鄉會安排下，由我帶領回到台南安平港後，大家就各自回家了；此後，我聽說有當教員者，有進鄉公所服務者。有位施明月，本是愛寮老板（施乾）的女兒，也當起管事來了。

我在台大東門宿舍住時，高草曾來探望我，她也當了教員；她和石聰金等男隊員有連絡，常看《光明報》。她把日人的教育餘毒全改過來，革命思想很前進。我們很談得來。所以，有次，我便利利用回南部之便，到斗六蔴桐去看她；她母親指著她房裡高矮的櫃子感嘆說：「爲什麼她總是不結婚呢？」她的思想清純、前進，有積極的毅力，又學會了許多國際勞動歌曲。我很想念她，欽佩她，常以民初女革命家秋瑾喻之，至今還是如此。我們談談先烈故事和台灣最近思想傾向，基隆中學的問題，二二八問題，談到黃培奕、石聰金等同志們徹夜在鶯歌山之腳，張貼反對貪官污吏的標語的英勇事蹟……談到深夜，我們忽然聽到石瓦片「滴滴」、「搭搭」地響了十來分鐘；原來是天在下冰雹呢！

二年後，我已逃回佳冬，她又和我聯絡上，並到南部來看我。我們在麟洛車站

相見，非常欣喜；我帶她到蕭彩祥家，又到崙上姑婆之女兒家和楊堅信表叔家。這些是我的第一道防線。傍晚離別時，我們約定五月四日再相見。

我通常在第一防線外圍見親人，晚上或一、二天後，才騎腳踏車回上埔頭。佳冬的蕭家，雖近在咫尺，也不敢回去。有時，伯父要聯絡或送衣物，也都寄在第一防線，再轉交。五月三日，我得到消息說高草要見我；我懷疑的是：爲什麼改了時間？一早，我用布巾蒙面，戴竹笠，騎腳踏車，從上埔頭到崙上姑姑家；我看到屋前排有椅子，椅子上掛有白上衣；我也不知道那來的靈感，急轉彎車頭，急速就跑。我順路往麟洛蕭家去；在後門，見到彩祥叔，他告訴我，昨天半夜警察就來搜家了，快逃。我於是又騎車到堅信表叔家，嬸母告訴我，表叔已被抓去，要我快逃。經過崙上姑婆之女兒家時，我由後門進去廚房，樹蘭表妹正在煮飯；她說：「今天早上，我看到妳轉頭跑的時候，心頭就『撲通！撲通』跳；屋裡的警察也馬上出來，看見妳走了，並沒追出去，因爲太陽實在太大了。他們把姑姑帶到客廳問話……。」樹蘭要我快走，我也就騎腳踏車一路趕回上埔頭。

上埔頭已得到消息，說高草已被跟蹤，她所到的三個地方都被破獲；彩祥叔、堅信表叔和姑姑……等人被抓起來了。他們原先以爲我是自投羅網，一定也被捕了。我也不知道是天助？還是人助？逃過一劫。後來，姑婆因爲是農家婦女，什麼也不知道而被釋放；她的兒子是位運轉手司機，也是什麼都不知道，卻受了苦刑，雖然沒承認什麼，卻被關綠島，十年後釋回。彩祥叔和堅信表叔因爲熬不過刑求就糊裡糊塗地承認：曾聽過什麼新民主同盟，有很多人參加，但不是共產黨……；以



後都被槍決了。彩祥叔的兒子蕭東應是位老實的農民，也被抓到綠島去，關禁了十年才釋放。彩祥叔和堅信叔何其可憐！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只是爲了大義，幫助我們逃亡，就被憐懂處死了。

高草被捕後，他們經常勸解她寫悔過書，表示說，只要坦白寫黃（素貞）老師的事，她就不致於死……。據以後守衛告訴我，高草這女孩子很關心黃老師，常問她們：「黃老師怎麼樣了？她會死嗎？」高草以爲，她被捕之時，我也被捕了呢！她怕她的自白會連累到我，所以好幾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後決定不寫自白書而從容就義。

當我聽到高草被槍決的消息時，我仍在逃亡中。我難過極了。我想，一生中會否幫助過人家？暗中曾否有人受過我的教益？我敬佩像高草這樣成功的革命者。可惜，她在還沒發揮她的能力前就犧牲了，從容就義了。我還能說，我不敢爲復仇而殺人嗎？我痛恨我自己只能在默默中逃難，保護自己。我恨自己，所以常在逃亡的夢中驚醒；在夢中，因爲不能成功復仇而痛恨自己是個弱者，而耿耿於懷。我最後的兩個女兒叫揚區和萌區，就是爲了紀念高草、發揚高草的革命精神而命名的。至於「區」的含意，則是紀念丘念台先生創辦的「東區服務隊」。

書至此，我已熱淚滿眶！何時，她才能名留青史呢？

## 北上苗栗山區

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教員鍾國員，方教務主任等被捕後，不久都被槍斃了。爲了鎮壓民心，《光明報》被查封，全島有沾到邊的學校教職員都大量被捕，而槍決之。台大醫學院的內科主任許強也遭逮捕而槍決，許多醫師如蘇友鵬、胡鑫麟等也都被逮捕了。到處都好緊張。我們組織因沒橫的聯繫，各地消息不很靈通。據說，這樣的大開殺戒很引起國際公憤，因台灣共產黨多爲知識份子，多爲氣憤貪官污吏，爲社會公義、人民生活與民主而奮鬥的，並非爲求官、求利、求財，爲自私而參加革命的。國家要造就一個大學生，要教育知識份子，更要費很多公款，豈可亂殺有用之人才。所以公評於世論後，乃有《自首自新條例》。

高草事件後，一九五一年五月，據說要大包圍南部各地區，尤其屏東佳冬。我們仍匿藏在上埔頭。晚上則睡進草堆之中。約過了一個多月，一個晚上，忽聽到阿賢妹叫肚子疼的聲音；天亮了，也不敢出來，獨自一人等待事件的過去。我想，他們也一樣在等待中吧！約中午十二點後，我才聽到老蕭叫我出來的聲音；我於是探頭出來。說是搜查的人已經走了、撤退了，但還會來，要我打扮成農婦，挑飯到甘蔗園躲起來。我們到了甘蔗園，看到一口井，大家都口渴了，於是用那骯髒的斗笠去捧水喝。秀孀教我們五、六個人用一條布巾蓋在飯上面，布巾上面蓋滿稻草灰，挑到隱密的地方，然後用手捏著飯吃。

據說，晚上，警方還要帶警犬來搜索，所以我們已不能再回上埔頭；我們應該走向更遠的西瓜園去，那邊有我們自己親信的群眾搭棚種西瓜。那地方從沒被利用過，也沒被注意過。我們白天只能化整爲零，個人單獨走到遠遠的西瓜園的外圍，

假裝尋柴、撿草，晚上才回到西瓜寮會合。村上婦人會冒險送飯來。吃飯時，大家就交換情報消息。晚上睡覺，也要有人輪流放哨；最好不要遇到、看到人最好。經過了兩星期，大家都晒得好黑。老張和阿坤、羅和李在這裡有群眾基礎，知道哪個西瓜寮可躲藏或喝水。我和老蕭較沒熟人，白天不能到任何西瓜寮去躲太陽；我們倆離得很遠，只能一人悄悄地在樹蔭下或山凹內躲避。

經過組織的研判，南部佳冬地方已待不下去了。有五年或六年之久隱藏在潮州中學的劉特偵老師已被捕了，秀利叔的母親通知他應該逃了，但他卻不走；因為他是老蕭介紹給秀利叔的，他怕連累到鄉下的一班人，於是勇敢就義。他雖承認自己是大陸來的正式教員，終究難免一死。

八月，炎熱的一天，我和老蕭走出西瓜園，到東港站，搭車去苗栗。我們怕被人發現，二個人離得遠遠地。我因晒得太黑了，用布巾蒙著臉，隔鄰的一婦人問我：「爲什麼晒得那麼黑？」我說：「去東部種西瓜，剛回來；真的晒得好黑嗎？很難看嗎？」那婦人點點頭，還看看我。以後，我就默默地裝睡，不敢再看她。不知何時，她已走開了。我看看用草袋裝著的幾件衣服，二個布袋；我想自己一定像個又醜又髒的女乞丐吧！

到苗栗，已過了中午。我們由白沙屯站走入山路，在沒人處，吃了點乾糧；等到天黑，再走進竹林，找個隱蔽較平的地方，鋪上布袋，蓋上布袋，就睡了。

一夜安穩地睡到天亮。

我們繼續向三義鄉的魚籐坪出發。老蕭來過這裡，路熟，山路也不難走。魚籐坪的羅姓三兄弟中，老大羅盛鼎早二年已參加了組織，老婆生了三個女孩，堂上還有老母親；大家都很和氣、好客。經常有同志來參加山上的勞動，各方面的消息較靈通。住了幾天，我們又到苑裡石聰金家，他的老婆剛生第二個孩子，要我們在他家住幾天，並帶我到街上，買了幾件衣服。石聰金的父母仍健在，母親很會織大甲蓆。石家也是大家族，已各立門戶，人多口雜，不能久住。

石聰金又帶我到群眾阿柳嫂的家。柳家有二戶人家，他們也都以織草帽、草蓆爲副業。我假裝是被丈夫遺棄的婦人，無家可歸沒人要，柳嫂相救來學織草帽的。柳嫂有兩對兒媳，輪流看家務農；女兒寶貴、小姑阿銅都很好奇我的來到，她們沒讀過書，但很聰慧，很少外出，不知外面的世界。我們織著草帽，聊個沒完，以後就要我教她們讀書寫字。

在柳家住了三個月，阿柳嫂發現我懷了孕，而且已知道我的來歷，很看重我。後來，南崁的舊鄉長（林元枝），一隻手的阿標和阿木等人也來了。賣魚的老莊、做工的老孫、討海的阿卻叔和阿卻嬸也常來串門子。阿柳嫂的丈夫是位老實的農夫，只顧田裡的作業，家務全由阿柳嫂打理，所以不問人來人往的事；另一戶柳家的嬸嬸，丈夫早逝，婆媳倆只顧織蓆，很是安靜。

## 上北打胎家族蒙難

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們到台北中山北路李龍修的家；他是老蕭高等學校的好同學，也是過去的老鄰居。他的老媽媽熱心的招待我，很是感激。第二天，我們已約好邱仕榮同學，在沅陵街一家醫院，幫我手術。邱兄說：「小孩可能已有五個月大，太危險了！」可我們已顧不了危險了。在逃亡中，嬰孩將給團體帶來很大的麻煩；我決心寧死也就算了。終於，在緊張又難過的情形下，完成了手術。邱兄告訴我：「拿掉的是個男嬰，你要看嗎？」看到一隻腿和生殖器。邱兄說：「好可惜啊！」唉！豈只可惜，我傷心又失掉一個兒子呀！此後，在李家調養了幾天，得老太太的愛護，很快就復原。

回到苑裡阿柳嫂家，我已會編織帽子，也教她們認字了；但是我的血還是在流。這是很危險的，表示還有殘留屍體在子宮裡。我只得用土方法處理，吃了阿柳嫂用麻油和「木耳」煮的肉，過了三天，在一晚上流了更多的血，最後流出一個東西，好似小產似地，血才慢慢停下來。原來，那是一個似心臟的肉球殘留物，是「木耳」結束了這親情的折磨。

但是，家族的受難沒被放鬆。蕭彩祥叔、楊堅信表叔被捕後，屈打成招，說是參加新民主同盟，而和高草同時於一九五一年被槍決。接著，那時已是七十高齡的老人家——伯父蕭信棟亦因「資匪」被判十二年，送綠島。他在年輕壯年時經營錫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功虧一簣，差點傾家蕩產；後在汕頭經營輕便鐵路。抗日戰爭後，得道應之助，排除萬難，回台灣與伯母安享天年。怎知，因為受到我們的拖累，年老又得流亡於綠島。他在嚴寒的冬日仍洗冷水澡，口從不出怨言；與舅

父吳金池老先生，都很受人尊敬。

年輕的耕德兄弟被捕後，進出死人房四次，堅不承認曾加入組織，終被釋放。還有，上埔頭好幾位親戚都被叫去問話；他們都矢口否認，堅定的說不知道，受了幾天牢獄之災，也就放回家了。他們又到佳冬蕭家，找較胖的女人，如蕭雙喜，體態有點像我，就被特務叫去問話二次。

那時，惠區已小學三年級，佳區也快上小學；繼光則患中耳炎，在祖母的保護之下，衣食不缺，還有廷姑的照顧，但常在半夜三更被如臨大敵的警察驚醒大哭。

## 魚籐坪的羅家

羅盛鼎是五兄弟中的老大，他有位偉大的母親，深明大義，寬宏的胸懷得諸兒女及家鄉人的敬重。盛鼎於逃亡中受槍擊罹難後，她仍掩護盛昌、盛春、盛土，以及還在讀書的小弟勝水，為我們工作。他們家有山、有田、有竹林，本可安安穩穩地過一生，但為了兒子們剷除貪官污吏，救全中國窮苦老百姓的偉大理想，而盡他們所有所能的努力著。

我們是最後到達他們羅家的人。盛鼎兄受難後，他的妻子仍帶著三個女兒，無怨尤地上山下田。當時，特務線民時常到各家串門子，屋內不能住外來的生人。羅家兄弟和老蕭與范新戊於是在山上做防空洞。他們把山邊的竹子壓下來，覆蓋上防漏瀝青紙，再用樹葉、泥土掩蓋，在隱密處開個用爬才可以進出的小山洞；洞裡有

小流水，有蓄水池，還可以煮飯；有些地方較高，倒還可以站著走來走去。半夜，在洞裡煮飯，可以吃三餐。菜只是蘿蔔乾之類，不必煮；有時，羅家會送來葷菜、鹹魚等。大小便可以到溪邊解決，大便要把它擰碎，讓水流掉，或用泥土蓋起來，才不會被人發現此地有人住。白天，也可到竹林或樹林看書，但一定不能被人看見。這是這段期間生活的最大原則。

老蕭主張所有綁著的支柱要打活結，一旦要翻起來較容易；可老范卻都暗暗綁上死結。大家都不知道。最後，這洞裡進來了三十幾個人，還格鬥了呢！

老范是我在北一女的同事，他任會計，我任庶務組長；所以很熟。不知何時，他也參加了組織。他在苗栗的據點很多，常帶同志到他親戚朋友處工作或休息。因為我胖，目標大，經常要在晚上換地方住，並要人帶路逃亡；來到魚籐坪的最初，我便被老范帶到一位假姓范的人家去。這位年輕人態度翩翩，很瀟灑，自稱這是他的小家庭，只有一子，還有大老婆另住，因家庭不睦，要我幫他們調解。起初，我也費了一些心思口舌；但我絕沒有教他們自私自利，蓄意拆散人家家庭；我只教他們以和為貴的道理，幫她看顧小孩；所以能平安相處一個多月。

這次，老范帶我去范家並不是在晚上行動，卻是在大白天；我們都是走山路，中午還在隱密地方休息了一大陣子；老范和我談了許多話。我心中有些疑惑，感到老范有些奇怪。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回到防空洞，就告訴老蕭，我感到老范有些靠不住，他的朋友處也很不安全。第一，那婦人的丈夫並非善類，靠不住。第二，

老范怪怪地，有些談吐靠不住。還有第三，第四……。老蕭卻罵我說：「自己目標大，還嫌什麼地方可疑！你自己又不會走山路！只會給組織帶來麻煩！」真的！我總是很難單獨行動，在行動中，我真是累贅呀！

## 那天晚上

組織在最近要開大會，討論一切。最近，大家都分散開，化整爲零。自張志忠、季濛蒙難後，大擔子都落在老洪和曾永賢肩上。曾永賢是苗栗人，走得較順利，也可帶老洪走。老蕭雖也是中委，但他自認是近視眼，較不會認人，只能做運籌計劃的內勤，或實地勞動，不應多與人交接來往。

離開會的日子近了，我又得打扮成村婦，頭戴斗笠，走出山洞，回到村裡姓范的人家，去拿幾件衣服、鞋子、包袱和假身分證。日子總是在等待解放中度過，好像是分秒必爭，又好像是永久的等待。

本來，我都是睡不安寧的；那晚，卻在酣睡中被人叫醒，說要檢查身分證。我猛一醒，看見有幾個人站在門口，就把身分證拿出來；那位婦人只是睜著眼看我。那幾個人卻連看也不看身分證，就對我說：「穿好鞋子、衣服，走吧！」我心中才想到，該來的終於來了！死的日子也到了！我想，犧牲成仁的決心既已確定，也就沒什麼可怕的了，只待槍聲一響，讓老蕭他們知道：我已被捕或死了，就完事了。可是，他們並沒有綁我，只叫我走。我走出門口，看到剛割了稻的田，拔起腳就



跑。豈知，跑了幾步，腳卻陷進爛泥土裡，拔不起來。他們並不開槍，有兩人追過來說：「本來不想綁妳，要讓妳自己走……」然後兇巴巴地說：「把她綁起來！」他們不開槍，我心裡想，這下子就沒辦法通報老蕭了。走了一段漆黑的山路，我感到迷濛中有車子的光，心裡正納悶時，有人叫我上車。原來，老蕭、老洪、老曾和羅家兩兄弟盛昌、盛春都已經被綁在車上了；沒被綁的有郭維芳和王子英；他們都在車子上等我，我一到，他們就叫開車。

車沒開多久，我就頻頻地想要小便。老蕭告訴他們說，我有三個月身孕，一受刺激，緊張，就想小便。他們也不為難我，一路上為我停車好幾次，並給我鬆綁小便。

## 原來已被出賣了

郭維芳、王志英與廖學信等藏匿於斗六、斗南一帶，高草被捕時也被破獲，同時坦白、自新，並於最短期間重回組織，不給人識破，再破壞所有組織，圍捕大家，拐誘大家去「自新」；這樣就可為自己「免罪」。

范新戊自新後潛回苗栗一帶，於最短期間聯絡上陳福星、曾永賢、老蕭等，誰都沒看出破綻，並誇讚他有辦法，關係好，有許多可以保護躲避之所。這次的南北大集會，就靠老范的連絡。原來這是老范和調查局郭乾輝處長的設局。

郭乾輝處長原來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他年輕的時候參加了共產黨，是中央幹

部，參加了長征，郭太太也是共產黨員；在一次大圍剿中，他被國民黨捕獲，原來應格殺無赦的，卻遇到調查局一位昔日的共產黨員馮達，以「自新」的辦法處理他們。據說，他們的案件只有肅清貪官污吏，並無搶劫擄奪的事件；再加上他們都是高幹，熟諳共黨的一切作爲，就留爲調查局工作了。馮達後被派在情報局工作，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天下午，大家按時到會，一見面，一握手，就爬進防空洞。老范第一個進去，把老蕭的手槍先藏起來；老蕭第二個進去。調查局工作人員跟著進去……老蕭覺得不對勁，不相識的人怎麼越進越多，隨即返身去找他的槍，但找不到；他感到危機逼近，去搶敵人的槍，卻又開不響；因爲那是加拿大的槍，有雙層保險，沒辦法開。敵人要制伏他，他力大又學過柔道，拚命抵抗，拿他沒辦法；只得用刀刺他的手臂、腳、腿。因爲郭處長說要活捉，不能開槍打死人，所以他們好幾個人就用繩子把老蕭雙手反綁。老蕭也昏過去一天二夜。第二夜，捉到我之前，他才醒來；可是，雙手已腫得像發麵一樣。他自己說，非用盤尼西靈治療不可；否則，兩手可能會殘廢掉。以後，他的右手約半年才能動，左手則一年才能動呢！

老范和特務計劃在無月漆黑的夜晚展開緝捕行動，已是成功的一半。因爲在黑暗中，敵我不分，敵明我暗，我只能隨其配佈；如竹搭的洞頂已被老范網紮死，不能掀翻。在漆黑中，有槍的同志已被繳械，動彈不得。又有已被說服的郭維芳、王子英等人在旁說服，所以就乖乖地投降了。但在附近，仍有好幾位同志在觀望後，都聞風逃開了。

## 大龍峒拘留所

我只記得，一到拘留所的房間，生死不管地倒頭便睡，睡了許久許久。想想人類如我者，真是一文不值。

有人由小窗口遞進飯菜。我由小窗口望外看，許多熟面孔，也有不認得的人，總共有一、二十個人吧！大家正圍著二張桌子吃飯。我想到在稻田奔跑，等待他們開槍的心情；我想到，在卡車上，老蕭告訴我：「妳有身孕，不會死的。堅強點！」死，我豈怕死！一槍就完結了。一切豈不容易。現在，身繫囹圄，既送飯來，不問青紅皂白，就先吃了這牢裡的第一餐吧！

飯後，門開了，叫我為老蕭打針；因為他的手已腫了一倍大，如吸收不好，手會自己中毒，要廢掉鋸掉。老蕭的吃飯穿衣，大小解，都有位彭欽嗣幫忙，自新書也由他們代筆。爲了治療兩手的麻痺，老蕭要求多作運動，如自己動手做乒乓球，自己打井水洗澡；手一隻能用，再用一雙腳來幫助，他自己一個人打水給大家洗澡。因爲天氣也漸漸熱了，運動身體是很重要的。

羅盛昌群眾的手好似也腫了，也注射了盤尼西林，幾天後也就漸漸好了。他們兩兄弟關在一個房間，大家要去大小解的時候，都會經過兩羅的房間；心中覺得很對不起他們，但他們總是微笑地，無怨言地迎送著我們。後來，發現他們也有煙抽了，但仍被鎖在門裡。我和老蕭的門只在晚上才上鎖，白天就和大家在外廳吃飯。

郭處長來訓話，要我們多看書，寫筆記。他對老蕭說：「政治是無情的！」要

他走「自新」的路。當時，幾個人一組，出外工作，數天才能回來；那就是去搜捕那些還沒辦「自新」的老同志，要他們早些「自新」。

這時，我心中還是有二個矛盾想法：爲了保存組織實力，等待解放，是不願意去做的。但解放的形勢遲遲不來，在當時的台灣島若是再等待下去，只會拖垮或遺害更多的老百姓。郭處長說：「政治是無情的。」我往深處想：「什麼是政治？」光是愛國家、愛民族能算是政治嗎？我想，我是不夠格的，我的涵養不夠，還不配談政治；我只是個愛國者而已。

我們於是在調查局的安排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局裡給每個人一份稿子，個人背熟照唸就是了。據說，報上還登了呢！

此次，調查局以共黨過去的幹部，周全地布置內線的方法，一步步地活捉共產黨，算是非常成功的。郭乾輝也因此升爲副局長。

後來，同志們陸續被派出去工作。我也曾被保密局借出去，派到阿金叔那個山區，去說服他們出來「自首」，因爲他家是群眾。事前，我誠懇地和保密局的隊長提出天真的要求（也可說約法三章）：一定不要虐待他們。因爲住在他們家，錯是在我；我寧可受刑，也不要他們坐牢。那位隊長答應了我。我於是帶他們在半夜爬山到阿金叔家，誠懇地勸慰他必需到苗栗，辦「自首」手續；並安慰阿金叔母，要她不要難過，幾天就會回來。到了苗栗，那位隊長就給阿金叔辦理「自首」，三天後，就放他們走了。我又被帶回大龍峒拘留。

後來，苑裡的阿柳嫂和她女兒等人，也都被叫出去「自首」；但都被關了二個月之久！

## 落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的預產期逐漸近了；於是與父親聯絡。父親幫我做了保，然後把我送往他老朋友的女兒在後車站開的高婦產科醫院。母親把她唯一的包金玉環賣了，給我做生產費用；還給我去補牙。父親、母親和三女兒北區都住進醫院來照顧我。北區已經很久沒看到我了，以為我是她母親的朋友，叫我阿姨。

十一月廿八日，我生了一個紅通通的男嬰。父親信基督教，說是神所寬賜，就取名「寬賜」吧！但老蕭不信這一套，以客家話的發音叫他「安阿牯」。「安阿牯」就是客家話小男嬰的意思。以後，適親的阿聖姑賜名給他叫「開平」，就是從此「開始平安」的意思。繼光的別號叫「維平」，就是「維持和平」的意思。

我所受到的親情照顧，使我永世難忘。後來，母親臨終那一天，淡水的至親阿姨告訴我缺少一隻玉環時，我便哭著跑遍通化街，最後，卻只能買一隻假玉環，給她戴上。抗戰時，我爲了參加抗戰離別雙親；這次，爲了實現祖國革命，共產國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又讓他們毫無怨言地自食其力，與生活奮鬥，並且變賣最愛的手飾，爲我調養身體。我時時都心存感激地想：「我將來一定要孝順他們，以盡人的責任的。」

一星期後，我抱著嬰孩，回到牢裡。

牢裡的守衛莊耀明先生爲人慈祥寬厚，他們夫婦對我們這批人犯更是敬重愛護。據說，他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在南京莊太太娘家，沒有跟他們到台灣。因爲這樣的緣故吧，他們夫婦尤其喜歡「安阿牯」，當他四、五個月大時，常在傍晚抱他出外散步。

不久，黃培奕和陳福星（老洪）的太太也到牢裡來了。陳太太是因爲她先生的「自新」而用政治解決，把她由綠島遣送回台，就要還她自由了。他們爲了觀察黃太太的思想意識，把她和我同關一房，好幾個月後才放回。黃太太比我早三個月生了孩子，她有很多奶餵孩子。我卻常常向莊太太要開水，給孩子沖牛奶。

老蕭的手的麻痺較好後，也被派出去工作。我很煩惱，不知是好？是壞？

原來，調查局已得悉：石聰金一直利用大安溪的地理環境，掩護他們的勞務工作。豈知，特務的爪牙越伸越多，他們訂好某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行動，並帶老蕭一起去，以備說服老石。老蕭出去後想要走告老石的父親，但不得要領。後來，某日清晨，去包圍大安溪草寮時，看到老石他們在刷牙，便被悉數逮捕了。此後，只勝下賴阿煥一人了，他的家已破產，孩子被溺斃……他更堅強，連老石也找不到他了；他就這樣從此「消失」了。

張志忠先生領導的這批台共組織，本來計劃要以武力組織，裡應外合，解放台灣的；可是，韓戰爆發，大陸的軍隊都援朝去了，把台灣解放的任務暫放一邊。此

時，除了調查局利用共黨舊幹部圍剿台共之外，台灣當局所屬情治機構——保密局和警總等也趁機展開全省大掃蕩。張志忠與季滢夫婦，蔡孝乾、洪幼樵等組織領導人已先後被捕。從此，台共所有組織零星四散，轟轟烈烈的戰鬥，最終也以各地區領導人「自新」、「自首」的號召，劃下句點。

我和老蕭的革命歲月，也就這樣告一段落了。但是，所謂「白色恐怖」，可落幕了嗎？

## 永恒的憂傷與苦痛

陳映真

蕭道應先生是在日據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族歧視最苛酷的時代中，以一個台灣人鄉下孩子，受完當時「台北帝國大學」（今之台大）醫學部第一屆生教育，並以第一名壓倒群英畢業。像這樣的殖民地精英知識份子，大可在草創期台灣現代醫學界中以行醫、研究揚名，躋身於日帝下殖民地仕紳，享受同化臣民的光華，傲視貧疾「落後」的本族同胞……。

然而青年的蕭道應先生卻選擇了另一條荆棘之路。他不曾只顧沾沾自喜地凝視眼前得來非易的光華。他，殖民地苦難又優秀的兒子，一直把眼光投向了抗戰晚期的、充滿痛苦、悲慘和烽火硝煙的、祖國大陸上侵略與反侵略、革命與反革命的、擴及全民族的鬥爭。抗戰救亡的實踐強烈地呼喚著他和他的同儕青年，終於使他們潛離殖民地，奔向了抗日烽火中的祖國，加入了廣東抗日東江縱隊，展開了艱難、曲折的鬥爭。

抗日戰爭勝利，蕭道應先生回台，旋即潛入地下，把自己獻給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台灣地下黨中央遭到嚴重破壞，從此大量的黨員被捕，報紙上天天都有組織破壞、同志被捕被殺的消息。就在這危急慌亂之秋，蕭道應先生和其他兩三個同志，迅速成立了新的臨時中央，決定了鬥爭的新的方針政



策，一面安頓從各地殘破的組織疏散出來的同志。一九五二年頃，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全島組織失去戰鬥力情況下，形勢全面逆轉，國民黨一改濫殺為「招安」以徹底收拾殘局政策下，這地下黨的新中央亦終告瓦解。蕭道應先生在苗栗三義鴨母坪山洞中持槍抗爭拒捕失敗被捕。

後來經幾位常在蕭先生身邊的老同志們的引見，我有幸認識了蕭先生，也蒙受他真誠熱情的信賴和友情。我曾寫過報導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股林山區沉落〉，寫的正是蕭先生的第二個中央覆滅過程中的一小節。在採訪中，我屢屢聽見當事人以敬愛之情提起蕭老。但我早從早已認識蕭老、曾試圖採訪他的報導文學家藍博洲兄那兒知道，蕭老絕口不提當年白色肅清下流轉於苗栗山區的往事。因此雖然台灣地下黨的、蔡前之後新中央的歷史強烈地吸引著我，幾次蒙邀在他家作客並惠食，我都始終一句也不敢問及他的激烈的青春往事。

那是因為我從資料上得悉，國府爲了徹底有效地「肅謀」，在白色肅清的末期的一九五二年，政策上從濫捕、嚴刑拷訊、濫殺，一改而爲「招安」、「自新」。肅老持槍奮力拒捕失敗被捕，被迫「自新」而倖活。

然而倖活下來的幾十年，對於蕭老和各別的其他一些人，卻因爲自己對無人加以告責的、自己的「失節」與「苟活」，緊緊地自我究問，絲毫不肯寬諒。多次聽說，每值蕭老飲酒，家人就擔心他喝到半醉，必流淚甚至慟哭，以頭撞牆，痛不欲生。被迫「自新」、求死而不能的「恥辱」的餘生，終竟成了受自己堅不肯饒恕的

追訴和審判的永無盡期的苦刑！

爲自己的過往憂傷、悔恨、慟哭、自譴、毫不容情的自我審判和定罪，是人類文明中許多偉大的文學和宗教的十分重要的母題。蕭道應先生碩壯如莊稼漢的外表，下懷抱的那永恒的憂傷和死也不肯寬恕自己的痛苦的心，每每思之，既肅然而敬，又惻惻難忍。

在威暴的權力殘酷肅清「異端」、「異己」最黑暗的歷史中，我所能知道的蕭道應先生一生的側面，已經教育了我絕不能簡單化地面對如此特殊而又複雜的歷史。

一九四一年，日帝在太平洋戰爭中勢如破竹。右派、自由派固不待言，大量的日本左派和共產黨人也宣告「轉向」，支持和歌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殖民地朝鮮文人、黨員也有大量「親日轉向」的歷史，都至今沒有加以清理。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趨附戰後屢從於美國的「親日轉向」的歷史，和韓國軍方獨裁權力以延命，榮華和富貴。最近，有東京大學的一個教授，聲稱他年輕時「想當毛澤東的好兒子」、「做社會主義的好學生」，而今，卻墮落到成爲來台灣用「行政院文建會」的錢，爲台獨派反民族台灣文學論撐旗助威，而猶自以爲「光榮」！

與這些人相比，像蕭道應先生那樣，被理不盡的歷史所撥弄，卻在嚴厲的自我譴責之火中燒炙半生，苦苦不肯釋放自己的憂傷和痛苦，常常引起我的沉思。

二〇〇四年九月卅日再寫



## 台灣法醫界的先驅——蕭道應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編輯

台灣法醫界的先驅蕭道應，前半生懷抱著愛國的熱忱，獻身長達五年的抗日游擊歲月；戰後曾受肅清運動的迫害，卻毅然從事調查局的法醫學鑑定工作，經歷數十年的內心煎熬。往事不堪回首，他只想歸於平淡……。

### 好友相邀共赴國難

蕭道應是屏東縣佳冬的客家人，當地的望族。蕭道應的母親早逝，父親因早染肺結核去世。其他四五個兄弟姊妹也因相繼感染肺結核而早夭，只剩蕭道應一人由他的伯父，清朝最後一任舉人蕭信棟扶養長大。當年日本軍進佔台灣時的登陸地，為離佳冬約二十公里的枋寮，首當其衝的佳冬成為第一戰場。當時蕭家帶領指揮村人，與日本軍浴血抵抗，殲滅日軍約三百人。日軍最後轉由福隆登陸，佔領台灣。

當時日人稱台灣人為本島人。而蕭道應從不稱自己為本島人，他自認為華僑，只稱自己為台灣人。蕭道應於公學校畢業後，唸了一年高等科才考入高雄州立中學校。入學後一個月，他因一直穿著台灣衣服上學，而被日籍歷史老師責罵。在中學時期。他感受到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隔閡，從而對排外意識感到疑惑。這狹義的

民族主義與廣義的民族主義開始在他的腦海中糾結著。

蕭道應在高雄中學結識了同樣具有國家熱忱的鍾浩東（原名鍾和鳴），兩人結爲好友，日後並相邀共赴國難。高中畢業後，蕭道應順利進入台北高校就讀，接著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並且在此時結識了教北京話的台灣汐止人黃素貞，後成爲蕭夫人。中國正式宣佈對日抗戰時，身在台灣的蕭道應，恨不得即刻飛奔到祖國參加抗戰。他不只一次向老師杜聰明表明要赴中國參加抗戰的志願，但是老師總是勸告他畢業後再去參加抗戰。此時他卻勤學北京話，並於周日時勤練體力，每周一定進行陽明山至淡水之間的徒步旅行，做爲抗戰的準備。畢業之後，蕭道應到河石外科學習外科醫術；半年後。蕭道應即以赴大陸考察爲由，帶著黃素貞赴大陸投入抗日戰爭。

### 誤為漢奸，死裡逃生

一九四〇年十月，蕭道應夫婦至上海，與鍾浩東夫人蔣碧玉及表弟李南峰會合，接著到香港與鍾浩東會合，再一起轉到廣州。侯孝賢的電影《好男好女》的故事就此展開，一群懷抱著愛國情操與浪漫革命情懷的台灣青年，開始了長達五年的抗戰生活。沿途中，觸目所及盡是被日機轟炸得支離破碎的鄉村房舍景象，這才使他們體會到戰爭的殘酷。

偷渡到惠陽之後，他們二對夫婦因爲操持台灣及日本口音，被誤認爲是日本派

來的間諜漢奸，要把他們槍斃。有一次受偵訊時，蕭道應以北京話指著軍法官說：「你有權判我們死刑，但無法阻止我們愛國。」幸好當時有一位陳姓軍法官，覺得他們不像間諜，堅持必須慎重調查。此時在羅浮山區組織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剛巧從前線到惠陽領軍餉。丘念台和台灣的關係很深，因此陳姓軍法官就讓他們與丘念台會面。後來才知道，丘念台認識蕭道應的伯父蕭信棟及鍾浩東的父親鍾蕃蕃，還有蔣碧玉的父親蔣渭水，於是丘念台救了他們五人七命，因為黃素貞和蔣碧玉都懷孕了。

蕭道應他們在惠陽又關了一個多月，才由軍士解送他們到桂林軍事委員會。他們忍著一站一站的煎熬，終於在半年後押送到桂林。在桂林被看管了一個月後，送回廣東曲江，鍾浩東與李南峰到民運工作隊受訓，而蕭道應夫婦與蔣碧玉被分發到南雄的陸軍總醫院服務。黃素貞與蔣碧玉的孩子也相繼出世。

### 獻身敵後政治工作

丘念台得知他們五人被釋放調回曲江的消息後，立即呈請把他們派調到他所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爲了工作需要，他們不得不犧牲親情，強忍著悲痛將孩子送給他扶養。直到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蔣碧玉才得以和她的孩子在大陸相認，而黃素貞的孩子則不幸早夭。

他們入隊後主要的工作是協助審問日本戰俘，並且在羅浮山周遭半淪陷區的三

不管地帶，從事街頭宣導組織民眾，做敵前敵後的政治工作。一九四二年，隊伍奉命轉赴惠州以東的橫壢鎮，此地文化落後，文盲甚多，工作便以諳政教民爲目標，半年期間共辦了四十五間小學。蕭道應並且在當地擔任赤腳醫師，並研究萃取中藥材合併西藥處方自製藥材，以補抗戰時藥材不足之窘境，來爲該地民眾治病。

日本投降後，各地日籍台灣官兵都集中於廣東，名爲「第二方面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最初隊員一千多人，後由海南島及南洋集中三千餘名官兵，共有五千多名。他們都是被日本政府強徵到大陸和國軍作戰的，日本戰敗投降後就把這批人移交廣東軍方。經丘念台的介紹，蕭道應爲該隊國民政府軍上校政訓室主任兼隊醫，協助安撫教育與遣送這批人。由於當時營區內的環境衛生很差，在營區普遍發生過霍亂，蕭道應即刻下令不可飲用地下水，每十人準備一個蚊帳，食物碗筷等均放入帳內。其中一名去世的隊員，在死前蕭道應爲其做過手術，因此被誤認爲是手術造成的死亡，造成其他隊員不滿，幾乎引起暴動。蕭道應極力解釋，說明是因霍亂引起腸破導致腹膜炎，才造成隊友死亡，並即時喚起隊員們的返鄉情結，情緒終得平靜，也因此化解一場可能的暴動，而疫情也適時地被控制住。那次霍亂共約十二人發病，僅三人死亡，可說是當時醫學防疫工作成功的典範。

## 走過肅清運動的陰影

抗戰勝利後，蕭道應夫婦於一九四六年返回台灣，結束他們近六年來的抗日游擊歲月，準備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行列。回到台灣的蕭道應，即在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室擔任代主任。後來因陳儀執政權及駐軍的濫權腐敗、擾民亂紀，台灣人民漸由歡迎到失望。蕭道應也與當時的知識份子一樣，思想陷於無出路的苦悶，在認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後，思想日漸左傾。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再加上大陸局勢的發展狀況，敗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爲了消弭其潛在的統治危機，於是對一個尚未發動的反對運動採取有計畫的肅清運動。蕭道應夫婦被迫逃亡兩年之後，於一九五一年被調查局抓到。受拘禁的一年中，黃素貞在監獄裡再生一子蕭開平。這一年他們受盡了審問拷打，每天活在沒有明天的威脅中。最後能夠被釋放，蕭道應夫婦認爲是國民黨覺得肅清了太多知識份子，想用懷柔政策緩和反對運動的情緒。被釋放後的蕭道應在調查局的科技中心擔任法醫工作。但內心的掙扎卻不曾停止過。那份對國家的熱忱與理想，在經過政治的迫害與囚牢裡的殘害後，已如槁灰，對政治的心情不再有了。幾十年的歲月中，他有如生活在一座無形的監獄裡。

## 出掌台大法醫室主任

日本爲非常重視法醫科學的國家，因此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的法醫工作，受日本法醫制度的影響頗深。日治時代大學均設有法醫學教室，日本醫學界以最優秀、有



抱負的人才，投入法醫學領域研習。台灣在日治時代的法院裡未設法醫，只有警察單位才有法醫編制。日人爲了達到南進政策的目的，從東京大學醫學部聘請三田定則教授來台，創設台北帝大醫學部並擔任法醫學科主任。

台灣光復後，台大醫學院杜聰明院長囑咐由大陸抗日回台的蕭道應接任法醫室主任。當時剛光復的法醫研究室設備匱乏，僅有少量試管與實驗用儀器。三年後蕭道應離職，即無人主持法醫學科業務，校長傅斯年將法醫學科併入病理學科。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間，台灣沒有一所醫學院有法醫學科的編制。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調查局於改組時成立了第六處，專門處理局內外科技事宜，蕭道應即主掌第六處科技中心的第四科之法醫鑑識科，對外接受司法治安單位委託有關法醫學之各種鑑定工作，並且在毒物科主掌法醫毒物檢驗工作。調查局科技中心創辦法醫證物鑑定科及毒物化學科以來，所做的調查項目包括了生體檢查、屍體檢查、證物檢查、文件檢查、醫學詢問等。從一九五八至一九八九年間，共接受了五千餘件死因鑑定，及各種證物鑑定與檢驗工作。奠定了台灣法醫案件之基礎。而蕭道應一手創立的科技中心，遂成爲森嚴神秘的調查局內唯一可以對外開放參觀的單位。

## 樹立法醫公正不阿的風格

光復後四十年間，各地檢署雖有法醫室之成立，但在缺乏優厚待遇與工作環境的情況下，法醫師呈現嚴重缺額的現象。然而蕭道應仍和多位法醫師同仁，堅守在

全省各地檢署法醫室，任勞任怨地執行檢查及解剖工作。蕭道應認為，法醫是決定各種是非的一門科學，必須慎重，每一句每一字都關係著人民的人權，不能多說一句也不能少說一句。他常說：「很多從事法醫工作的人，看到屍體的頭顱有外傷，便斷定為顱內出血。不打開頭顱怎麼知道顱內出血？」與父親同走法醫工作的蕭開平曾表示，父親個性剛烈，一絲不苟，對工作要求絕對的公正客觀，不容許任何關說，他的報告一定依據證據下結論，隨著證據說話，若證據確實，則鑑定結果不容許任何更改。因為他，從而樹立了法醫公正不阿的風格。蕭道應經手辦過的案件不計其數，其中「武漢旅社事件」(註)讓不喜歡出鋒頭的蕭道應聲名大噪。為此，胡適與前台大校長錢思亮特地走訪調查局由蕭道應掌管的科技中心，並親自題字以示鼓勵，而胡適所題「用科學的工具和方法來做辨冤白謗的工作」及錢思亮所題「科學的方法，謹慎的態度，作出準確的結果，解決困難的問題」，便成為法醫界引以為圭臬的信條。

已從調查局退休的蕭道應。將前半輩子的熱忱理想獻給了國家，後半輩子獻給了法醫學，現在追求的則是平淡寧靜的生活。

### ——摘自新新聞文化公司《福爾摩沙的聽診器——廿二位台灣醫界人物的故事》

註：「武漢旅社事件」為一名菲律賓華僑被發現暴斃於台北市武漢旅社，初次驗屍時判定為自殺。後由蕭道應的檢驗，發現死者身上遺留有巴拉松。當時只有學術界的人才拿得到巴拉松，由此線索查出這是一起因財務糾紛而引起的謀殺案件。這個事件轟動一時，並且引起當時對法醫工作的重視。



# 我所認識的道應叔

蕭吉紫

## 生長環境背景

蕭道應先生六堆（註）之左堆人，一九一六年生。先祖（阿太）蕭光明因經商致富，光緒初年即請唐山師傅在佳冬建造了與原鄉（梅縣）老家相仿的三落五進式大屋，建材全部從唐山運過來，即目前在南台灣的三級古宅——蕭家古厝。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甲午戰敗，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次年日本接收台灣時發生了乙未之役，左堆副總理蕭光明在茄苳腳附近率千餘人抗日。步月樓（蕭家的書齋）之役，日軍傷亡慘重，六堆援軍赴陣不及，左堆義軍不敵，被迫棄守步月樓。此役讓日本懷恨在心，接收後大肆屠殺庄民，這些庄民合葬於「忠義祠」。長久以來均由蕭家後代（祭祀公會）祭拜。信棟先生是道應叔的父親，七歲時適逢步月樓抗日戰役失敗，其祖父蕭光明副總理在與日本講和，保證不與鄉人爲難後，即帶領兩位孫子「信棟」、「秀寬」返回原鄉，並與子「贊堯」（在潮州做官，秀才）在原鄉立下了發展的根基。「信棟」先生於東京的大學畢業後，在汕頭開設洋行，在商界非常活躍，光復後被公推管理六堆科舉會。當時科舉早已廢除，其宗旨仍在獎勵六堆學子，凡中學程度可申領講學金。後因耕者有其田政策，將所

得食物債券及股票全部變賣，充作重修忠義祠之用。

蕭家古厝的右側洋樓原爲馬廄，日據時代改建爲三樓的「洋樓」，作爲招待訪客的場所。據說是家人堅持固守不受屈辱騷擾的民族性格，絕不讓日本人進入「五堂蕭宅」，所以在此招待訪客。

道應叔出生於富豪之家，但沒有纨绔子弟的驕矜，外表稍嫌嚴肅，但對人對事都滿腔熱忱。從小受到父親先祖的庭訓與堅強的民族意識，身上的血液也充滿了濃濃的民族情感，對朋友有情有義，極其痛恨日本人。日據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科第一名畢業——這也是他不輸給日本子弟的明證。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因其民族意識的強烈，與大陸友人時有連繫，被誤爲通匪而遭通緝。後來事實真相查明，政府還他清白，並借重其才華，安排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當法醫，並升到代處長，爲國家、社會奉獻心力。退休後仍無法休息，許多案子仍借重其長才及經驗，指導後輩。今，次子開平傳承其衣鉢。

## 我所認識的道應叔

道應叔育有二男五女，嬸嬸黃素貞女士是位賢淑聰慧的內助，在蕭家這個大家族，爲人媳婦要被長輩稱讚、晚輩尊敬，可不容易；但嬸嬸待人溫和厚道，敬老惜幼，雖然長久旅居台北，但每年返鄉時都受到家鄉親友的歡迎。他們夫妻倆，一個嚴肅不苟言笑，一個慈祥笑口常開。叔叔對嬸嬸常粗聲厲氣，嬸嬸則忍氣吞聲，所

以能維持一個完整的家庭，並且子女都受過高等教育，個個都很孝順。叔叔往生後，我曾對嬸嬸悄悄地說：「今後聽不到雷公響，您可能會不適應哦！」

記得我讀高雄女師時，兩年的暑假都到台北參加戰鬥訓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結束後留在台北玩，即住在道應叔家（通化街一號）。三樓的房子，一樓是診所，二樓起居室及廚房客廳，三樓臥室，樓頂養蘭，全家九口加上幫傭、護士，以及家鄉的來客，只要你願意與他們擠，他們全家都歡迎你，吃住不用說，嬸嬸及弟妹們還會帶你去玩。有一次，叔叔帶我上頂樓看蘭花，他一一介紹獲勝的名蘭，以及新培養的幼小花苗（培養瓶內的），真令我大開眼界，然後問我：「妳喜歡嗎？」我說：「喜歡！」他又說：「好，自己挑，要多少就拿多少，不過妳要向我保證——好好養它，不能養死，否則我會找妳算帳！」想想回家的路途，坐十二小時火車，加上叔叔介紹的養蘭的耐心及技術，我知難而退，一盒也不敢要。聽說所有去過的親朋好友都有此經驗，可見他惜蘭如己的個性。

有一次護士告訴我，經常有背著小病患求診的母親，付不起醫藥費而面有難色，叔叔或嬸嬸會叮嚀母親趕快帶小孩回家吃藥並小心照顧，醫藥費以後再算，然後在藥包中偷偷塞幾張鈔票。其醫德仁心真是醫界的典範，難怪當了一輩子法醫，又開診所，患者多，卻仍兩袖清風！我師範畢業後，教書、結婚、生子，一晃四十幾年過去了，現已是六旬老婦，雖然沒再到台北叔叔家，但他們全家每年都會回故鄉一次以上，尤其掃墓從不缺席。道應叔慎終追遠孝思，當今親子疏離人情淡薄者應該反躬自省了。

註：六堆：今日高屏客家住民的通稱。最早是個民團組織，他們由於受到長期以來的教訓，體認出生存比任何政治利益都來得重要。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起，府城已被朱攻陷，他們以軍事行動來護衛鄉梓。滿清在平定亂事後，對這些領導人授官獎賞，並建「忠義亭」（今竹田西勢之忠義祠）以慰先烈先聖先賢在天之靈。六堆民團遇到有動亂時就會集合武力，稱「出堆」。今長治、麟洛地區為「前堆」；竹田為「中堆」；內埔為「後堆」；里港、武洛、美濃、高樹、杉林、六龜地區為「右堆」；新埤、佳冬為「左堆」；萬密地區為「先鋒堆」。

## 台灣人抗日的典型——

### 蕭道應在日據時代的抗日歷程

林德政

著名法醫先驅蕭道應，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七歲。

這是一個傑出法醫的殞落，更是一個畢生堅持國家民族主義立場的鬥士的殞落。

蕭道應是屏東佳冬人，許多人知道他是台灣法醫界的先驅。早在民國四十年代，他就已經進入法醫界，他以其優秀的病理學涵養，為許多棘手命案，抽絲剝繭，還那些不幸遭到毒手之受害死者以公道，給兇手應有之制裁。台灣法醫界因為他，逐漸建立起威信與制度。但除了法醫之外，他早年有著英勇的反日、抗日事蹟，這卻是比較少為人所知。現在他不幸去世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愛國事蹟，是不應該淹沒於歷史之中的，那是抗日史實的一部分。

一九一六年，蕭道應出生於台灣屏東佳冬。蕭家在當地是世家大族，清代中葉之際，自廣東梅縣遷居而來，歷代以耕讀傳家，兼營染坊，以忠厚訓勉子孫，代出傑出子弟。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給日本。當年日軍派出軍隊到台灣接收，南路從屏東東港一帶登陸，蕭家以民族大義，不願為日人統治，響應「台灣民主國」之號召，集合里人起兵抗日。蕭道應的祖父蕭讚堯就是佳



冬地區的抗日義軍領導，他率領義軍在佳冬土地公廟與日軍激戰，不幸寡不敵眾，兵敗被日軍殺害，壯烈犧牲，年僅三十出頭，留下寡妻幼子二人。由於祖父因為抗日而犧牲生命，這段家族的悲慘歷史，在他長大懂事之後，從祖母口中得知其詳情後，便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加上他的母親畢業於高等女學校，也是一個具有知識的現代女性，富有民族意識，年幼時都是做唐裝給他穿，影響所及，他的心田裡逐漸養成不滿日本、痛恨日本的思想。

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人要出頭，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日本以殖民主義統治台灣，實施差別待遇，刻意壓抑台灣人，教育機會不平等。蕭道應處在那種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力爭上游，讀書非常用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今台大）醫學部醫科，不僅贏過同班台籍同學，並且壓倒日籍同學，其優秀可以想見。在學期間，他在病理學領域的課程，特別用心，成績特別突出，教授對他刮目相看，尤其是杜聰明，特別愛護他。

就在蕭道應就讀台北帝大時，反日思想更趨濃厚。大三時，一位自中國大陸歸來的年輕小姐黃素貞，在台北教人家北京話，蕭道應因為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學習。黃素貞教學生動活潑，除了一般教學以外，還會教唱歌曲，特別是當時中國耳熟能詳的抗戰愛國歌曲，例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的學生，不時高唱那首雄壯的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逼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

地高昂起來，也因此萌發了想要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一九四〇年春天，蕭道應自台北帝大畢業，與教授北京話的黃素貞小姐志同道合，決定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離開台灣，回到中國大陸參加抗戰。當年八月，蕭道應夫妻兩人自基隆乘船離台航向上海。登船之前，為免日人盤查，特別將黃金燒成條狀，塞到屁股裡面，以便到大陸後當旅費。到了上海，換穿中國衣服，裝成中國人模樣，轉往香港。南下途中，勇敢地把日本護照丟入海裡，以示決絕，表明永遠不做日本二等國民的決心。當到香港後，會齊鍾浩東、蔣碧玉、李南鋒，五人遂經由九龍，進入沙漁村，步行了五個多小時，到達惠陽。

蕭道應本以為就此踏上祖國的抗戰之路了，哪知他們五人好不容易地走到惠陽後，沒想到因為身上拿不出任何身分證明文件，被惠陽的國軍指揮部人員認為是日本間諜，扣押在指揮部裡。法官訊問好幾天，問他們從哪裡來的？怎麼回到中國的？回來做什麼？希望做什麼？由於法官只懂廣東話，不懂得普通話，而蕭道應等人只懂得普通話與客家話、閩南話，所以訊問還得透過翻譯，翻譯程度不好，因此法官認為他們的答話，前後不一致，有矛盾，不採信他們的話，下令把他們拘押，並判他們以漢奸之罪，雙手反綁，下到監獄，準備擇期槍斃。

以蕭道應出身台北帝大醫科的學歷而言，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優秀的青年，這樣的人待在台灣，好好地當個醫生，不是很好嗎？結果他滿腦子抗日思想，跑到大陸，現在被誣賴為日本間諜，下到監獄，淪為階下囚，即將槍斃，這不是冤哉枉矣

嗎？如果不是貴人出現，他們五人就必定當了愛國冤魂了。這個貴人是誰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念台，也就是當一八九五年割台之際，倉促之間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當時在廣東博羅領導「東區服務隊」。蕭道應五人被監禁準備槍斃時，丘念台正好到惠陽洽公，領取服務隊的薪餉。一到惠陽，就聽說抓到五個台灣來的間諜，即將以漢奸之名槍斃，他一聽感覺不對，就要求讓他重審一次，以明實情。

丘念台明白了他們的情形與志向，對他們說：你們不諳國情，冒險回國參加抗戰，雖然熱情可嘉，但入國手續不清楚，又不認識任何人，只能以行動來自保。丘念台又告訴他們說，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問他們能不能吃得苦？獲得蕭道應五人承諾後，丘念台遂保了他們，就這樣從千鈞一髮之際保住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還是得送到桂林複審，當時桂林設有軍委會行營機構，到桂林前先到韶關，那裡有軍法處，再繼續往桂林，沿途有時受到禮遇。有時受到衛兵無理的斥責，罵他們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漢奸」，這些謾罵，他們都忍耐下來，畢竟他們是爲了抗日、爲了愛國。但沿途環境衛生差，一路上大家都長了虱子。一九四一年年初，他們在桂林過完陰曆新年，在桂林軍法單位以溫和的方式，考核他們的思想，要求他們閱讀蔣中正手著的《中國的命運》一書，以及《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國》等。經過層層考核，過完年，終於獲得正式釋放，送回廣東曲江，分派工作。蕭道應、黃素貞、蔣碧玉被分發到陸軍總醫院，擔任醫護工作，鍾浩東與李南鋒分發到民運工作隊。

蕭道應被派擔任外科上尉醫官，黃素貞和蔣碧玉擔任護士，沒多久，黃素貞就學會了打針等護理技術，三人都熱愛這得來不易的工作。此時蕭道應和黃素貞的兒子繼誠出生，一家和樂。蕭道應因為病理學涵養豐富，受到器重，又被派擔任外科門診部主任。蕭道應正高興可以為軍民同胞服務之際，卻因為救命恩人丘念台來信，希望他們到東區服務隊工作，乃離開陸軍總醫院，前往位於羅浮山腳的東區服務隊報到，步行二十多天到達。

丘念台要求不可以帶小孩到東區服務隊，為此蕭道應夫妻雖然心痛，捨不得，但心裡想小孩子也是國家的，就透過張發奎的妹妹張三姑，將兒子繼誠送給別人抱養了。爲了抗戰，爲了參加東區服務隊，懷著不捨之情，將愛子送給別人。不幸的是這孩子，未及成年就因病去世了，這也是他們夫婦參加抗戰的代價之一吧。

「東區服務隊」成立於一九三八年，是丘念台奉廣東軍政當局准許成立，專門從事民運組訓工作。蕭道應他們到達隊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該隊有隊員三十餘人，男隊員二十多名，女隊員僅有五人，他們的加入使東服隊加添了生力軍，是隊上僅有的台籍隊員。尤其是蕭道應身為醫生，更受歡迎。東服隊過的都是團體生活，隊員同吃同住，每天早上六點就要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天只吃兩餐，工作到晚上，睡前還要開會檢討一天的工作。因爲這個工作，蕭道應夫婦認識許多民眾，除了藉由行醫，爲民服務，與民眾打成一片外，還得做文化表演工作，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戰戲劇，他們夫婦如同當時一般民眾一樣，生活清苦，有時連買肥皂的錢也沒有，只好運用他的醫學常識，教隊員們自製肥皂。

羅浮山當時位處前線，算是三不管地帶，國民黨、共產黨游擊隊、日軍都出入其間，日軍有時候會來侵擾，殘暴的日軍，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竟然連老太太也會強姦。有一次蕭道應親眼目睹一位老太太被日軍強姦致死，痛恨日本之心有增無已。

一九四二年，東區服務隊轉移到羅浮山區的橫樞鎮，該地文化教育落後，服務隊因此籌畫辦理「保國民學校」，以教育當地民眾的失學子女，每一保設立一個國民學校，總共辦理了四十五所，東服隊隊員全部投入籌備工作。學校成立後，隊員義務擔任教師，即使如此，師資還是不夠，隊員乃到梅縣、蕉嶺一帶招募新血。由於戰時缺乏交通工具，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走路去的，只有很少路段坐船，走路走得雙腳起泡，傷及神經，痛澈心扉，女隊員走不動路，必須人抬，但大家都忍耐下來。每到一地，都受到民眾的歡迎，許多年輕人來報名，經過考試，錄取二十多人。

有了小學，接著就籌辦「羅浮中學」，校址設在一家道觀「沖虛觀」，於一九四三年籌備。由於太過忙累，蕭道應與太太黃素貞，先後都病倒，為惡性瘧疾所侵擾，輾轉病榻許久，體重從一百多斤掉到五十幾斤，後來服用六〇六，好不容易才得以痊癒。

「羅浮中學」一九四四年成立，丘念台擔任校長，蕭道應擔任總務主任，為學校的經費事情忙碌，還要上課，教「生理衛生」課程；太太黃素貞身為東服隊隊員，也投入教學工作，身上背著大女兒惠枝教書上課，小小年紀的惠枝，也品嚐到

抗戰的辛苦。不久逢氣候乾燥，久旱不雨，學生交不出充當學費用的斗米，隊員只好喝稀飯度日。蕭道應身為總務主任，負擔經費大任，因為關係重大，把關嚴格，且為人耿直，例如對部分同仁有時去飲茶，用公帑開支，蕭道應就加以勸告，惹來不滿，丘念台因此勸告他不要太嚴格、古板。羅浮中學辦了一年，由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竟在博羅附近打仗，戰況激烈，學校受到影響，辦不下去了，只好停辦。東區服務隊在一九四四年結束，丘念台被任命為國民黨台灣黨部執行委員，帶領蕭道應到福建永安洽公。

抗戰結束，丘念台奉命在廣州成立「台籍官兵集訓總隊」，蕭道應與妻子赴廣州，他被任命為中校訓育主任，黃素貞則出任女子大隊的副大隊長，隊部設在廣州花地一家工廠裡面。隊員有軍伕、軍屬、護士等，總共有三千多人，其中屬於軍人者有一千六百人，得自己煮飯，隊員在附近河裡抓蠓仔，用醬油、蒜頭沾著吃，得了霍亂，死了三個隊員。對不幸喪生者，他立刻將其遺體火化，以遏止病毒擴散傳染，引起隊員不滿，他們以為死者應入土為安，即令應該火化，也不可那麼快，應多留幾天追思啊。他極力解釋並安撫，才化解一場可能產生的暴動。為此蕭道應叫隊員以後不可在生吃蠓仔，米飯煮好，要放在蚊帳內吃，以便防止蒼蠅，隊員生病也由他動手術醫治，認真照顧隊員的健康。除了醫療，蕭道應還負責擔教導集訓總隊隊員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課程，讓隊員趕快對祖國有正確認識，並且還不時要安撫隊員們不穩的情緒，如女隊員的感情問題，如多數隊員的思鄉情緒等等，直到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蕭道應才回到台灣，結束六年的大陸抗日生涯。

對日抗戰期間，無論是在「東區服務隊」，或是在「台籍官兵集訓所」，他都是僅有的醫生，他為大家治病，任勞任怨，沒有怨言。戰後回台，昔日台北帝大醫學部同窗都已經在醫療界位居要津，不是擔任教授，就是開業有成，唯獨他可說一無所有，得從頭做起，這都是因為他年少時遠赴祖國參加抗戰之故。但是他一生毫無後悔，並且回台後選擇的職業，是一般台灣醫生看做冷門的「法醫」。以世俗眼光來看，一定無法理解，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家不做的事情他去做，如今法醫在台灣已奠定基礎。其志業影響到他的次子蕭開平，開平也是醫學系畢業，同樣不當一般醫學生所嚮往的內科、兒科、皮膚科、耳鼻喉科、外科或婦產科醫生，而是效法父親，也當起法醫，為苦難的人申冤，顯而易見，是受父親影響。

蕭道應早年爲了參加抗戰，吃足了苦頭，差一點就要犧牲生命。他熱愛國家，一生始終堅持大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他身強體壯，年滿八十五歲，猶在騎摩托車出入市區辦事。從法醫退休後，也一直在兼任案件檢驗工作，看病理切片，可說是退而不休。他一直堅信自己還可以活好幾年，看到台海兩岸終將有嶄新的局面出現，沒想到肝疾奪走了他的生命。其大陸的抗戰經驗，與丘念台分不開，也是台灣人對日抗戰的重要篇章。他一生以「勇於改過，敢於認錯，立場自省，自動堅韌」，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將之筆之於竹版上面，掛在家裡牆壁上，自勉也勉兒女。而今驟然而逝，緬懷其早年飄洋過海，投入對日抗戰的歷程，令人懷念，令人敬佩。而老一輩抗日反日的台灣人，又遠去了一個，但他的典型與風範，將永遠鐫刻在台灣史上。

## 一個元氣十足的真人

侯孝賢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電影《好男好女》開鏡。之前，因著開拍前的猶豫，突感沮喪。我想，人是各為主觀的。

像送子張三姑（四戰區張發奎司令的妹妹張三姑，感佩蕭道應和鍾浩東夫婦的愛國理想，答應領養他們小孩，使其無後顧之憂到前線），原本亦是見面當下的熱情；一旦真面對事情，雖言三姑到香港去了，但精明世故的老管家是要付收養金打契約，以後也好有退步；不然出了什麼問題是難收拾的。人不能光憑情義的。

丘念台要他等五人到東區服務隊，見只來了兩人，不悅；這也是有著他的堅毅和鄉情。後來見蕭太太小孩病死的消息傳來，蕭太太的萎頓，惠州出差時藉故待他夫妻同去，是要他二人散心，也是蕭道應夫婦有其忠厚動人之處。人在社會之中不可逃，諸多牽扯，是為難也是心甘情願。

八日，到蕭道應家。

蕭道應八十歲當日修好了近四十年的摩托車，換彈簧。蕭太太說四十年的老車，蕭先生說二十年，老夫妻倆拌嘴奚落對方。

談不久，蕭太太即將她書寫之紀錄文《抗戰回憶錄》交給我們，也不認為自己



一生有何過人之處。這篇紀實是五〇年代逃命時所記，爲保命傳給子孫的吧。

蕭先生說，他從不看藝術文學，他說那是假的騙人的，真是學醫的，有其實際的度量。講到戰時消毒用的「灰錳氧」，當下試驗，泡了一臉盆紫色水，倒多了，直嚷著浪費。

以前人真的元氣足。

蕭先生就是一個元氣十足的真人。

——摘自《好男好女》拍片筆記

## 蕭道應先生傳奇而悲苦的道路（一九一六—二〇〇二）

藍博洲 撰

### 抗日世家

蕭道應先生，祖籍廣東梅縣，屏東茄苳腳（今佳冬鄉）蕭家子弟。

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蕭家來台祖蕭達梅（一七六八—一八三六），從祖地來台經商。來台二世祖蕭清華（一八〇一—一八七二），曾經襄助當時駐紮大響營的李泐將軍撫蕃及開拓恆春、車城和枋山等地，聞名於世，並於台南再娶閩南（福佬）人楊氏。三世祖蕭光明（一八四一—一九一一），生於台南府，早在青少年時期便跟隨母舅從商，經常往返佳冬、台南之間，其後在台南開設店號「蕭協興」，經營米穀生意，獲利甚豐；因而有「府城外甥」之美譽。此外，他又結交總兵劉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光緒皇帝曾賜軍功五品。

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這時候，夙有軍事防禦歷史經驗的南部客家農業宗族公社——六堆各堡的中堅份子，隨即在內埔媽祖廟召開響應抗日之會議，並組織了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誓死抵抗。十月十一日，日軍第二師團一萬八千人於枋寮登陸，隨即兵分三路進攻。由於佳冬腳位於枋寮、東港之間，日軍如果不能先佔領此一戰略要地，則進不能入東港，退不能守枋

寮。於是以其精銳之第四聯隊第三中隊進逼六根庄（今佳冬、六根兩村）。左堆（今佳冬、新埤）總理蕭光明於是挺身而出，坐鎮「步月樓」，領導左堆義勇軍及劉永福留置佳冬的四百兵士，展開一場孤軍抗日的聖戰。

戰鬥從早上八點多一直持續到午夜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左堆義軍終因彈盡援絕而不支潰散。據統計，日軍官兵共戰死十五名，受傷五十七人，義勇軍的傷亡總共約一百人。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蕭道應的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

蕭光明先是與左堆副理張阿庚隱匿新埤張家水涵內長達一個月之久，然後再由孫兒蕭信棟等人陪同，潛往廣東原鄉避難；一直到四年後（一八九九），才又返回佳冬。生性豪邁的他，返鄉以後不但受到地方民眾的敬重，日本當局也尊稱他為地方第一流紳士。同時，基於安撫地方的考量，推舉他擔任「保甲甲長」；同年十一月，台灣總督府又授與他紳章；其後，日本明治天皇又賜勳六等。

然而，這些都只是日本殖民當局歷經殘酷的「血的掃蕩」之後，為了鞏固殖民統治而採取的「安撫政策」而已！只要步月樓的彈痕猶存，漢民族意識強烈的蕭光明也就永遠不會淡忘那場犧牲了他兩個兒子與庄民的生死決鬥。爲了蓄積往後反抗的能量，他於是忍辱偷生，等待日後反擊。他一面經營釀酒和染布事業，並且因爲經營得法，再次在經濟上成爲地方的富豪。①

## 殖民地差別教育

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的大屠殺之後，台灣人民武裝抗日的運動從此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國際情勢的大變化，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也以新的「文鬥」姿態出現了。一九二一年，台灣進步的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啓蒙運動。接著，受到文化協會啓蒙的台灣工人和農民，也開始民族的和階級的自覺而組織「農民組合」與「工會」，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反日鬥爭。一九二八年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並在島內展開各種各樣的經濟文化或政治鬥爭，造成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

「西來庵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六年，作為蕭光明先生曾孫的蕭道應先生，在佳冬蕭家出世了。抗日家族的血緣，步月樓可見的斑斑彈痕，以及父祖們經常談起的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戰鬥往事，以及「台灣文化協會」以來的台灣抗日民族革命運動的啓蒙，決定了他日後注定要走的抗日之路。

當時，在「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總綱領指導下，日本殖民政府必須在殖民地台灣發展一定程度的生產科技教育和公民教育，做為殖民地「建設」的補助性人力；所以，它在領台後不久，就開始在殖民地台灣實施日本化教育，大力推行日語。就像所有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在其他殖民地一樣，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的教政策，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目的。爲了穩固殖民地支配制度，它必須消除台灣人的民族自覺，貶低台灣原有的文化價值，使台灣人認同及誠服於日本殖民者；爲

此，它又必須要另行一套歪曲的人文教育或「精神」教育。具體來說，作為日據時代殖民地台灣男子中學教育的濫觴，它首先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四月，設立國語學校語學部的國語（日語）科<sup>②</sup>。到了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在本省中部仕紳的聯名請求下，為台灣青年單獨設置的台中的公立學校，才正式成立。但是，無論在修業年限、入學資格及學習內容上，仍然與日本人所進的學校有極大的差別待遇。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對台灣人的教育方針及學制。<sup>③</sup>到了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台灣總督府又再公佈《台灣新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台共學」制。從此以後，在殖民地台灣，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大致上已經撤除。但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台灣學生能夠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

據台灣總督府一九二二年《統計書》及《學年年報一覽》的記載，一九二二年的台灣，一共有八所中等學校，其中教員人數一百二十八人，全部是日本人；學生共計兩千零二十人；台灣人卻只有五百六十九人。蕭道應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循序由公學校而考進高雄中學校的少數台灣知識精英之一。

然而，總的來說，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的教育，無非是爲了改變台灣人的心智，使得台灣人能夠更爲有效地受它騙使；至於它之所以致力於實業和科學教育的普及，也不過是爲了培養一些工商業的下級幹部，以助長它對台灣的經濟榨取。

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的蕭道應，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麻醉教育，刻意要培養成爲「皇民意識之發揚」的一代人之一。那麼，他的抗日民族意識又是怎麼覺醒，進而找到一條實踐之路的呢？

### 戴白線帽的青年

一九三三年，高雄中學校畢業的蕭道應，考入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高等科理類。④

按照當時的學制，中學校的修業年限是五年，然而，只要有足夠的自信，修完四年課程的學生，也可以報考台灣兩所專門升大學的預備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預科或台北高等學校。

台北高等學校的全稱是「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一九二二年四月創設，原名「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爲大學預備教育機關，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一九二五年繼設高等科，分文、理兩類，修業年限三年（戰時縮短爲兩年）；入學資格爲該校尋常科畢業或中學校修業四年者；考試科目與日本本土的高等學校大致相同；每年只招考應收新生人數的一半，另外一半則由尋常科畢業生和各中學校長推薦保送；當時，台北高等學校及各中學的校長都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學生進入台北高校的機會自然遠遠超過台灣學生。⑤

一九二六年起，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正式於古亭町之校舍（今和平東路師大）

上課。當時，台北高校生戴的是有兩條白線環繞蕉葉帽徽的帽子，一般稱爲「白線帽」；由於台灣子弟要考進台北高等學校非常不容易，所以，戴「白線帽」的青年便成爲許多少女崇拜的對象。（蔣碧玉語）

但是，作爲殖民地人，在日本帝國主義民族岐視政策統治下的命運，注定是悲哀的。日本學生非常粗暴，經常不分青紅皂白的痛毆台籍學生。面對這種台籍學生經常被日本學生欺負的「悲哀」的生活，那些對粗暴的日本學生心懷反感的台灣學生，總想找機會討回受傷的民族自尊心。

民族意識強烈的蕭道應就是那些敢於反抗的台灣學生之一。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那個時代，日本學生經常欺負我們台灣學生。」蕭道應的同學邱林淵（李辰）見證說：「當時，日本殖民當局不准台灣學生在學校說台灣方言。有一次，有一些台灣學生說台灣話被一些日本學生聽到，他們就要來欺負那些說台灣話的台灣學生。結果，這事被蕭道應、許強和謝有福等人知道了，他們就毫不退縮地起來反抗那些日本學生。……我一直認爲，蕭道應和許強都是非常有志氣的台灣青年，他們面對日本人的壓迫，很敢反抗。這在當時，需要不小的勇氣；因爲，如果因此而被退學、趕出學校的話，是很麻煩的。」⑥

儘管如此，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生活還是相對「自由奔放」的，學生不但可以留頭髮不必剃光頭；「尤其最重要的是，功課不重，有充分的時間閱讀各種書籍」；一般說來，當時的高校生，「無論是歷

史、哲學、藝術，無不涉獵。」⑦

就在台北高等學校相對自由的學習環境下，蕭道應和同學許強展開了他們的思想探索。「許強教授是閩南系，我是客家系。」蕭道應說：「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彼此都認為應該『反封建』。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的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說互相都要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接著，我們談到『反封建』的課題。我們認為，封建意識的範疇相當廣泛——迷信，也屬於這個範疇之內。所以，『反迷信』即為『反封建』的主要課題之一。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儘管在形式表現上，我們是反迷信；但這只是形式，本質上，我們之所以反迷信，還是基於反封建意識的認識。另外，我們原則上認為『世上並無命運問題』，如果人不努力，必不進步，那就一定陷於不好的命運。所以，形式上，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本質上，我們還是反封建。對家庭的諸多問題上，我們也是抱持反對的看法；所以，形式上，我們似乎是反家庭者，但本質上，我們還是在反對封建意識。我們除了了解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外，還了解到：人，並非照日本歷史所謂的『天照天皇』之說那樣造出來的。這樣，在形式上，我們又變為『反宗教』了。其實，我們之所以『反宗教』，基本上，還是基於反對封建意識。」

「除了反封建，我們也常常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蕭道應進一步解釋他們當時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看法。「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認為，台灣土地上的



一切事物和人，都是他們所擁有的。基於自衛，我們於是展開最消極的反抗。我們都反對一切『改良主義』之手段。我們認為，一切『爭取台灣人權利』的合法鬥爭是沒有用的，反而有害。如果不能給日帝致命打擊，想要爭取真正的台灣人權益，是不可能的。我們最消極的態度就是，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在台灣的日本人認為台灣是他們的，所以他們自稱『內地人』，台灣人是『本島人』；但是，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們一般都稱日本人為『日本人』，絕不稱呼為『內地人』。當我們跟日本人對話時，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時，我們都避稱『日本人』或『內地人』，一切稱謂都改用『你們』來稱呼；提到台灣人時，就用『我們』來稱呼，以免引起身分認同上的麻煩。這雖是生活上無關緊要的小節，但整個問題的重點是爲了使我們自己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

「最後，我要說的是，』蕭道應先生強調說：「當時，我們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都認為：觀察世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要採取『運動』的觀點——因爲今日之我並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並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沒有一概不動、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都要經歷一個運動過程。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屬性，靜止則是物質運動的特殊形態；世界上沒有絕對靜止的東西，任何事物都在變；『變』是絕對的、永恆的、無條件的，而『靜止』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這些都是我們日常所談的問題，這樣的思想認識也規定了我們以後必走的正確道路。』⑧

## 尋找抗日之路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走上法西斯的道路，爲了積極準備侵華戰爭，它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也改採所謂「島民皇民化」的政策。因爲這樣，台共領導下的台灣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大的警察暴力鎮壓下去了。隨著日本對台灣進行的「皇民化」殖民政策，台灣人民從此過著台灣有史以來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

儘管如此，蕭道應仍然與許多殖民地台灣的青年學生一樣，在缺乏領導與組織的條件下，經常自發地發動零星分散、各自鬥爭的反日運動。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蕭道應畢業於台北高校理乙科。同年四月，蕭道應又與高校同學許強、邱魏根、邱林淵（李辰）、謝有福及李龍修等，一起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一九一八年，起初只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才增設醫學部。據《台灣教育沿革誌》記載：醫學部之所以較遲才設立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爲台灣地跨亞熱及熱帶，對於熱帶醫學具有研究者甚難羅致；其次是因爲醫學儀器設備的費用甚大，經費方面一時難以應付。⑨

由於日本當局認爲：學文、法科系的台灣學生思想最爲不穩，最具危險性。所以，它並不願意讓太多台灣學生進文、法科系，但它又不好明令禁止，因此就讓這些學生畢業後不容易找工作，或者只能做低階的工作。這樣，爲了現實的就業問題，大部份的台灣學生祇好選擇走學實科的路，而且以學醫爲上策。⑩

因爲這樣，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招生時，報考的人數非常踴躍；包括許

多日本學生，留在台灣的先期生，以及應屆畢業的學生等百名以上各地精英，爭取四十個名額。結果，四十個名額中，台灣人只有四成，十六個名額；其他都保留給日本人。名額少之又少，競爭激烈。①

就在蕭道應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隨著日本法西斯化的不斷深化，作為實踐「島民皇民化」口號的第一步，日本當局在四月一日宣佈禁用漢文。它一方面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一面又封鎖島外的新聞，企圖讓每一個台灣人民因此忘記自己是中華民族，而誤認為自己也是「日本人」。接著，七月七日，日本帝國又通過蘆溝橋事變，正式發動了侵華戰爭。台灣乃於八月十五日進入戰時體制。

因為二〇年代以來台灣本土的反日政治運動和團體早已遭到徹底的彈壓，像蕭道應這樣中華民族意識強烈、政治意識覺醒的台灣青年，於是就把反日的戰場轉向祖國大陸。就在這時候，蕭道應也因為學習中文的關係，認識了陪伴他往後一生的革命伴侶黃素貞。

## 革命伴侶

黃素貞，孤兒出身，養父是台北汐止山上人；當她四、五歲時，全家遷居福建福州。當時，她的養父開了家台灣餅店，日子算是過得蠻好的。之後，她依照規定，在福州台灣人辦的公學校讀書，接受了六年的日本教育；然後又在教會學校——

福州蒼前山女中，接受了初中及高中教育。

黃素貞高中將畢業時，正值「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規定要所有的台灣人跟著一起撤出；他們一家五口只好於八月十九日，搭乘一艘由福州滬尾開往台灣的盛京丸，回到台灣。當時的台北，因為中日戰爭爆發，學北京話竟然成爲當時的風尚。黃素貞一位同在福州讀過書的朋友的父親也在教北京話，因為課太多，負荷不了，就介紹她到宮前町（今圓山附近），教幾個台北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北京話」。

「這些學生大部份是民族意識強烈熱愛祖國的客家人，」黃素貞說：「他們包括從日本回來渡暑假的鍾和鳴（浩東），鍾九河、邱仕榮和蕭秀河、蕭和應、蕭道應等；另外還有不是客家人的許強。我除了教他們北京話之外，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因爲大家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大家就會談論起中日戰爭的局勢。當時，他們認爲，這次的中日戰爭實質就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我們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這也是他們學國語的目的。後來，大家決議：既然大部份人是學醫的，那麼，乾脆就組個『醫療服務團』吧！」<sup>⑫</sup>

一九三九年春天，台灣廣播電台招考對華廣播的北京語廣播員，管區警察強要黃素貞去報考。蕭道應知道了這事，擔心她不自覺地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於是立即找她認真的討論。他首先問她：「妳有想去報考嗎？」她態度明確地回說：

「我當然不願意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作宣傳啊！」「那好！」蕭道應釋然了，然後又關切地問說：「那妳打算怎麼應付這事呢？」黃素貞說：「我直接拒絕不就行了！」「這樣不行！」蕭道應著急地說：「他們怎麼可能隨便放過妳呢？」他想了有一會，然後就笑著向她建議說：「我看，妳乾脆騙他們說，妳就要跟我結婚，不方便再到外頭工作……。」黃素貞把蕭道應的建議向父母提了，商量以後，他們也覺得可行。這樣，爲了取信管區警察，蕭道應和鍾九河便於五月二日搬入大龍峒黃家，跟黃素貞一家共同租屋、生活。一段時間以後，蕭道應和黃素貞便順理成章地由「同居」而結婚了。

## 到祖國去

後來，那個抗戰「醫療服務團」卻因爲種種原因沒有組成。最後，他們籌組的回國抗戰隊就剩下鍾和鳴，在台大醫院當護士的蔣碧玉，鍾和鳴南部家鄉的表弟李南鋒，以及蕭道應和黃素貞夫婦等五人。

一九四〇年元月，鍾和鳴與新婚妻子蔣碧玉（蔣渭水的女兒）及表弟李南鋒，三人先行奔赴上海探路。蕭道應預定在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後的四月，隨即帶著太黃素貞趕赴上海，與鍾浩東三人會合，尋找參加抗戰的路。

那時候，日本政府不但禁止黃金買賣，而且出境時所能攜帶的現金，也有嚴苛的限額。爲了籌措前往大陸的經費，臨行前，他們還曾經幾次前往瑞芳、九份，買

黃金，然後把它燒成細條狀；讓鍾和鳴、李南鋒及蕭道應等三位男同志塞入肛門，先後夾帶出境。

鍾和鳴三人到了上海，就一面探尋到內陸參加抗日組織的路線，一面等待蕭道應夫婦前來會合。

不久，汪精衛於三月三十日，在南京粉墨登台。上海全市學生舉行總罷課，展開熱烈的反汪運動。

到了四月，蕭道應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了。

「我和老蕭隨即以『畢業後考察』爲名，辦理赴大陸旅行的護照。」黃素貞說：「但是，台北北署的刑事警察卻百般刁難；我們於是送了半打葡萄酒，終於打通關節。然而，就在我們臨行之前，南部家鄉卻傳來老蕭的老祖母病危的消息；我們夫婦只好延期出發，趕回佳冬家鄉，探視老祖母。七十三歲高齡的老祖母躺在床上，牽著老蕭和我的手，然後以虛弱的語氣說：『阿婆贊成你兩公婆去大陸，但是，你們一定要早點回來！』因爲老祖母這樣無私的表現，我和老蕭反倒無法狠下心來，馬上離台。我想，這次畢竟是與老祖母的生離死別，要走，也得等老人家百年之後再走啊！」

到了七月，日本佔領區越來越大了，通往重慶的路也封鎖得更加嚴密了。鍾和鳴於是又寫了封信給蕭道應，要他們在八月一日前趕到上海。

「我和老蕭心裡清楚，」黃素貞繼續說道：「現在情勢緊迫，不容再延遲了。」

這時候，老祖母的病情也已穩定下來，雖然臥病在床，可短時間內也不太可能走，要拖還有得拖！我們於是決心立即出發，前往上海。」

蕭道應夫婦在基隆上了船，航行三天後，平安抵達上海。

「下了船，我們看到只有蔣碧玉和李南鋒前來迎接；」黃素貞說：「他們說，鍾和鳴已經自己一個人先到香港探路了。我們四人於是又化裝成客家華僑，轉往香港。爲了表示回國抗日的決心，在船上，我們四人便把身上的日本護照丟到大海裡頭……。船到香港時，天已經暗了下來。我們依照鍾和鳴的約定，住進中華旅館。然而，一直等到夜深的時候，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他的身影！在這人地生疏的地方，我們只好憂心忡忡地等待。第二天早上，九點多鐘，旅館服務生才向我們轉達說，鍾和鳴要我們到九龍會合……。」

## 愛國有罪

他們五人在九龍會合後，便搭乘廣九鐵路線的火車，進入廣東，然後一路北上，朝向東江流域的惠陽前進。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侵占廣州（廿一日）、武漢（廿七日）之後，全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由於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的開展和抗日根據地的迅速擴大，嚴重威脅日軍的後方，日軍不得不暫停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以主要力量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於是將戰爭初期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爲

主，政治誘降爲輔」的策略，改變爲「政治誘降爲主，軍事打擊爲輔」的策略，加緊對國民黨誘降。

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之下，國民黨開始走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第五屆五中全會制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隨即在各地製造一系列的反共事件，掀起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高潮從北南來，東江的形勢也隨著全國形勢的變化而變化著。

在東江地區，日軍退出惠陽博羅以後，出現了安定的局面，國民黨於是向共產黨人開刀了。一九四〇年春節前後，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逮捕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sup>⑩</sup>博羅隊的全體隊員；五月廿一日，「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惠州的團部被封閉；不久後，堅持留下來，繼續宣傳抗日的十多名隊員又被逮捕。四月間，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主任香翰屏下令曾生大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成立的東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集中惠陽整訓。曾生擔心這是國民黨企圖消滅他們的陰謀，於是斷然拒絕；丘念台居間協調不成，曾生部隊於是向東撤離坪山駐地，損失慘重，並有一批隊員被俘，集中關押在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看守所裡。

當時，蕭道應和鍾和鳴等五個熱血澎湃的台灣青年並不了解國內複雜的政治環境，他們只知道：國民黨的蔣介石在領導抗日；他們又聽說國民黨黨部在惠陽，於是天真地想著：「到了惠陽之後，就可以通過黨部的安排，前往重慶了。……」

然而，當他們抵達駐防廣東的第四戰區十二集團軍所屬「惠淡指揮所」營部所



在的一座大祠堂時，卻因為沒有良民證，身分不明，而被扣押下來審問。問話的內容主要是：「哪裡人？」「爲何回國？」「有何企圖？」「有何希望？」「台灣情形，家人……」等等。審問是由審問的軍官先用廣東話問他們，然後透過翻譯，翻成北京話，給他們聽；他們接著便用北京話回答，再由通譯將他們所說的北京話翻成廣東話給法官聽。由於這樣一來一往，語言溝通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無論他們如何表明他們的動機、身分及愛國的熱情，法官都認爲他們的「口供不一致」，無法採信；最後便一口咬定他們五個人是「日諜」、「漢奸」，硬要槍決他們。

「難道，」蕭道應聽了不服，當場就大聲抗議說：「我們愛國也有罪嗎？」不久，他們便被扣押到指揮所的牢房；蕭道應等三個男人還被用木柵製成的腳鐐銬住。他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待決的死刑犯了。

黃素貞說：「在三天監禁生活中，我們看到一隊由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賓結隊回國的青年男女，他們也是因爲入國手續不清楚，而以『共產黨嫌疑』罪名拘留；其中，好幾位還患瘧疾，發高燒而呻吟著。老蕭是醫生，除了給他們一些建議，還送他們一些我們從台灣帶來的藥品。……這時候，我們才知道中國國情的複雜；原來，中國神聖抗戰中還有兩黨的磨擦鬥爭，許多無辜的人們也爲著黨爭而白白犧牲，不爲人知！」

## 貴人相救

「然而，國民黨裡頭也不是沒有好人的。」黃素貞感嘆地說，「當時，有一位姓陳的法官覺得，我們五人怎麼看也不像是間諜，因此，堅持必須慎重調查後，才能決定是否要槍決我們。因為這樣，他可以說是我們五個人七條命的救命恩人。因為，那個時候，碧玉和我都懷孕了。」

這名陳姓法官知道，丘念台和台灣關係很深，比較了解台灣，於是趁著丘念台從羅浮山區到惠陽領軍餉時，把五人的事情告訴他。

「台灣不乏愛國志士與熱血青年，但他們五人卻是第一批結伴而稍具組織雛形回國抗戰的青年；」丘念台告訴陳軍法官：「所以，這件事我一定要管，我一定要救他們。」

丘念台於是請求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香翰屏，讓他跟他們見面談話。

「我們五個人於是又被叫了出去，並且被吩咐去挑回行李。」黃素貞回憶當年的情景，繼續說道：「當初，我們是雙手反綁被押至指揮所牢房的；可這次卻沒有，只是要我們跟著走。我們被帶進一間屋子。進門後，我看到桌上擺著一只手錶。衛兵命令我們在桌旁的椅子坐下，隨後，我們就一個個被帶進另一個房間，單獨受訊。我看到，那位審問長身穿退色的黑褲唐裝，單眼，留著一臉鬍鬚。後來，我們由站守在旁的侍衛口中得知，原來他是在羅浮山區領導東區服務隊的少將參議丘念台。當天，我們被先後審訊兩次；一次是上午，個別審問；一次在下午，集體問話。這次，丘念台與我們問答，都用北京話；我們總算能好好表達自己的意思

了。最後，丘念台向我們五人提到，他不但認識蔣碧玉的父親蔣渭水和鍾和鳴的父親鍾蕃蕃，也認識蕭道應的叔父蕭秀利<sup>⑭</sup>；他說，他在日本留學時，經常和在日本學醫的蕭秀利在一起。丘念台然後又感慨地說：『我雖然對你們冒險回國，參加抗戰的熱情，十分感動；可你們光有熱情，卻對國內的情況不瞭解；你們的入國手續不清楚，又不認識任何人；難怪人家會懷疑你們的身分。雖然我個人認識你們的家長，卻也不能完全替你們擔保！……這樣吧！你們先各寫一份陳情書，敘訴你們回國的動機過程和遭遇，我幫你們呈送上級，請求暫免執行槍決；先把你們解往後方，察看、偵審。』……」

丘念台離開惠陽時又再特別勉勵他們說：「雖然我不能完全保你們，至少，你們現在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我將請求政府給你們表現的機會，你們也必須以行動來證明，你們的確是來參加抗戰的。畢竟，愛國，不是靠一張嘴說說就好，還要有工作上的表現。」接著，他又轉口問他們說：「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艱苦的，你們能吃苦嗎？」不等他們回答，他又暗示他們，要他們安心等待；如果有任何困難，可以寫信給他，收信人「黃復」，並向他們一一握手，道別說：「後會有期！」他然後揮揮手，又回羅浮山區的前線去了。

## 押解桂林

丘念台走後，他們在惠陽又關了一個多月，才由兩名荷槍的軍士押解，起程前

往桂林軍事委員會。他們由軍士們一站交一站地解送著，由惠陽經河源，連平縣忠信，忠信壩，連平，到戰時省會的韶關。

「一路上，」黃素貞說：「我們有時坐船，有時坐貨車，通常走路的時候較多。每到一站就被送到當地的監牢，短則幾天，長則半個月之久。有些地方把我們和普通犯人關一起，我們便和一般犯人一樣，要忍受睡馬桶邊和老犯人刁難的待遇；有些地方卻讓我們五個人睡一個房間，地上鋪上稻草，這算是最優待的待遇了。但是，吃的卻都是拌有很多砂石，實在難以下嚥的糙米飯。對已懷孕的我和碧玉來說，那時的牢獄生活，真是活地獄。」

到了韶關，他們便被關押在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法處的芙蓉山監獄裡。那裡原是一座石板建築的廟。

「十幾天後，我們五個人被叫去聽訓；」黃素貞說：「他們勉勵我們：『不要灰心！中央一定會給你們安排工作的。』然後又把我們移送憲兵隊。憲兵隊在鄉下，背山依水，風景優雅；我們在那裡的吃住都不錯，而且可以自由出入，打球、運動！我們想，這可能是獲得自由的先聲吧！」

十二月初，他們五個人又在憲兵隊一名副官的押解下，搭乘粵桂鐵路線的火車，經由長沙，最後，終於在薄暮中抵達山水迷濛的桂林。

在桂林軍事委員會，他們被安排住在兩個大房間（男女分開）；每人有一張鋪有軟墊的鐵床可睡和一床棉被。在那裡的一個月期間，他們起居自由，三餐豐盛，

身體也因為充分休息而逐漸復原。

「每天，我們都在屋裡練字或讀《三民主義》之類的書。」黃素貞說：「在安靜等待的學習生活中，躲空襲警報就算是生活中的一點綴了。這段期間，我們也在裡頭認識了一名南洋的華僑青年，他是因為要回國參加抗戰，卻被誤為共產黨，而被關了起來。他很同情我們。通過與他的聊天，我們對國共鬥爭的激烈狀況，也有進一步的理解。」

這樣，他們在以餐館、公務員和來往旅客「三多」聞名的繁華的桂林，度過了一九四一年的新年；這是他們離家以後的第一次新年，也是一個冷清寂寞的年。

年後不久，快要過舊曆年的時候，他們又被叫去談話；說是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要他們準備到韶關，有工作在等待他們……。

當天晚上，他們五人就抱著一償夙願的興奮心情，坐上開往韶關的夜行火車。

## 野戰醫院

回到韶關，他們五人又被送回軍法處。

「我們感到莫名其妙。我們擔心地想，難道事情又有什麼變化了嗎？」黃素貞說：「這樣，因為前途的不確定，我們又都陷入一種不安的情緒當中。一直要到大約十天後，我們又被送到憲兵隊後，我們才確定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現在只是在

等待分發我們工作的『公文旅行』而已。」

他們五人的工作派令終於正式下來了。結果，鍾和鳴與李南鋒被派到韶關民運工作隊受訓，從事民運。蕭道應和黃素貞夫婦與唸過護校的蔣碧玉，則一同分發到南雄的陸軍總醫院服務。

南雄陸軍總醫院是用木頭、竹子和茅草等搭建的臨時野戰醫院，包括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和為一般老百姓服務的門診部；此外，也設有一間克難式的手術房。院長郭變和，廣東大埔人，講半客家話的國語。

「起初，」黃素貞彷彿回到了抗戰時期的野戰醫院，說：「老蕭因為是上尉醫官，分配有一間單人房的宿舍。後來，他爲了切磋醫務，討論國事和人生問題的方便，就搬去跟上海同濟醫學院畢業的張慶民醫師同住。這樣，原本對祖國的認識簡單的，他，通過張醫師的介紹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尤其是對國共之爭的歷史，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和他共事的沈外科主任是個很硬氣的男子，老蕭跟他也沒談得來。留德的沈主任很欣賞老蕭的醫學實力。老蕭後來知道，沈主任的獨子在日軍侵略時被日軍所殺；因爲家破人亡的慘痛經驗，抗日的意志非常堅決。」

起初，黃素貞和蔣碧玉的軍階都是上士護士；黃素貞在外科，蔣碧玉在內科。不久，她們又一同升爲準尉護士。

「剛到那裡的時候，我和碧玉一同住在村落裡醫院租借的宿舍；」黃素貞繼續說道：「那是一棟木造的二層樓民房，一間住十人。我們住在二樓，一面等待生

產，一面在衛生材料處工作。衛生材料處處長姓黃，是沈主任的妻子。那時，從前線回來的阿兵哥身上大多長了疥瘡；我們的工作主要就是把他們脫下的衣服，以及繃帶、紗布等衛生材料，拿來洗，然後煮過，消毒，再為他們擦上硫磺膏治療。」

一九四一年二月初，農曆年（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七日）剛過，蔣碧玉生了一個男孩。隔一個月，二月二十八日，黃素貞也產下一子。

「在物資匱乏的戰地，養育小孩是件辛苦的事；」黃素貞說：「我和老蕭初為父母，整天忙著為那些傷病的軍士們服務，並且看著孩子一天一天地長大，日子也過得充實而有意義！」

## 東區服務隊

丘念台先生聽到蕭道應等五人被釋放、調回曲江的消息後，立即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部，要求把他們派到他領導的「東區服務隊」。

九月，醫院院長把丘先生的信，轉給老蕭夫婦和蔣碧玉。在信上，他要他們五人到前線參加工作，並且強調，必須五個人整體行動，缺一不可；但小孩不能帶去。他又強調：「既然你們能遠離家園，決心報國，就應該到前線參與抗日；如果只是待在醫院裡，未免太可惜了。」「因為在台灣時已經墮過一次胎，心裡總是捨不得再扔掉這個孩子；」黃素貞傷感地敘述當時的心情。「我認為，這樣的話，實在太對不起祖宗。所以，一直在猶豫著。我原先想，『他們四個人去就好了，我一

個人留下來照顧小孩吧。」在那段猶豫期間，老蕭就勸我說：「當初，我們既然願意放棄家庭，犧牲一切，回到國內來參加抗日戰爭，如今怎能爲了小孩而前功盡棄呢？」他希望我能好好考慮，自己決定。對我來講，這個決定的確是非常困難，因爲我實在很捨不得小孩。但是，我又想到，我們五個人原本就是爲了抗戰而一起回到祖國，若是爲了我一個人而擔誤大家到前線工作，也是不對的。我想，既然自己原本就是要回來參加抗戰的，現在，爲了工作的需要，也只能切斷母子的親情，把孩子送人撫養了。我雖然心中痛苦，卻不得不如此。想到這裡，我於是下定決心，把孩子送人，然後到前線——東區服務隊，爲抗日戰爭貢獻一份心力。」

爲了處理小孩的託養問題，他們因此又待了一、兩個禮拜。孩子送走了，他們便把傷心事拋到一邊，每人背著一個包袱，勇敢地踏上征途，徒步前往丘念台處。

「九月的天氣很爽朗，」黃素貞說：「我們每天趕個五、六十公里的路程，還不是什麼難事。天黑時，就到村莊的小旅社過夜。一路上，走得非常辛苦；到後來，鞋子破了，腳也起泡了，路是越走越難走了。還好，到了東江的下游時，有船可坐。這樣，熬過了十二天的水、陸行程，我們終於在天就要黑的黃昏時分，到達位於羅浮山山腳的東區服務隊駐紮地——博羅縣徐福田。我們於是在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待了三年。丘念台並且替我們另外取了化名，老蕭改叫蕭濟寰，我叫黃素貞。」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棄守前夕的十月二十日夜間，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副總



司令香翰屏向丘念台轉達余漢謀總司令的意旨，叫他擔任惠、潮、梅屬廿五縣的民眾組訓工作。丘念台於是率領十二名年青同志，徒步回到家鄉蕉嶺縣文福鄉，成立「東區服務隊」的訓練中心。這樣，東區服務隊便作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所屬，正式成立，從此取得國民黨承認的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一九三九年初，國民黨當局撤銷了「統率委員會」這個機構，東區服務隊隨即面臨能否計續合法存在的問題；四月，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在韶關成立，以張發奎為司令長官；丘念台於是前往韶關活動，取得張發奎同意，將東區服務隊歸屬第四戰區，給予一筆經費；並命該隊前往潮汕前線，協助駐紮當地的獨立第九旅旅長華振中做青年組訓和民眾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東區服務隊轉移惠陽，後駐博羅縣福田鄉荔枝墩一帶，展開群眾工作。

東區服務隊原來只有十來個基幹，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當蕭道應等五名台灣青年加入時，已增加到二十多個人；其中，女隊員有五個。隊員的教育程度參差不齊，正式大學畢業者，只有二、三個；其他都是高中、初中，甚至有小學程度的。但，大家都是愛國青年，所以都很熱誠而團結。

東區服務隊的工作，首先是「號召各地熱心抗日的知識青年，加以組織訓練，使能積極協助政府動員民眾，進行長期抗日戰爭。」丘念台曾往陝北延安特區，考察有關青年組訓、民眾運動及游擊戰術，因此，東區服務隊的學習生活也採取「自治、自覺、自省、自立」並重的原則。<sup>⑮</sup>

黃素貞回憶說：「東區服務隊每天的作息時間表，大致是早上五點半起床，整理內務，跑步、運動、歌唱練習。七點，開晨課會及檢討會，分配值日伙頭兩人，負責買菜做飯。九點開飯，飯後，或者外出工作，或者拜訪，或者自習。下午五點晚餐，飯後自由活動，或者外出探訪民眾，或者辦婦女夜間補習班。晚上八點起開會，會議有工作計劃會、工作檢討會、生活檢討會、時事討論會以及學習討論會；星期日晚上則開聯歡會。晚上十點，準時就寢。」

東區服務隊的駐地，基本上是一個封建落後、糾紛又多的三不管地帶；所以，在民運工作中，他們要設法瞭解當地老百姓的困難，並替他們解決問題。

因為當地沒有任何的醫療機構，學醫的蕭道應與護士出身的蔣碧玉及黃素貞，除了安政教民的日常工作外，還要充當醫療人員。

「由於這裡瘴疾盛行，當地居民普遍都有面黃肌瘦、肝脾腫大、手腳潰爛的後遺症；」黃素貞說：「老蕭於是要我和碧玉用灰錳氧幫他們消毒，然後用黃藥水塗抹患處，並勸導村民不要喝生水。漸漸地，患者手腳的潰爛都長出新細胞而癒合，抵抗力也增強。老蕭同時考慮到不讓瘴疾『周而復始』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患者服用奎寧；他於是建議東服隊所有隊員，每個月每人省下零用金（三元），到淪陷區購買奎寧、阿托品和黃藥片（雷佛如爾）等藥品。……然而，自從零用錢節省下來買藥後，隊員們卻沒有錢買肥皂了。老蕭於是又教大家自製肥皂。他用剗子把燒洗澡水用的稻草堆（不要搗散）剗出來，放在桶裡，再注入開水；這樣，碱水就出來

了。我們於是用碱水洗頭、洗澡、洗衣服、洗廚房用具，結果，不但洗得很乾淨，而且也不傷皮膚。」

當時，東區服務隊的駐地正好有旱災，米糧缺少；正是「米貴豬肉便宜」的年份。

「那時，我們一天只吃二餐；」黃素貞笑著說：「可大家的飯量都很大。老蕭考慮到大家的體力經常透支，營養又不夠，就從專業的立場提出拿米跟當地農民換豬肉的建議；他說，多吃豬肉不但可以補充營養，而且可以減少大家的飯量……果然，吃了豬肉後，因為肚子裡有了油水，大家的米飯也就少吃多了。」

## 原鄉行

一九四二年，丘念台先生爲了實踐所謂第二期抗戰「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組織重於徵調」的要旨，打算說服民眾提供平時用以防盜的槍械，加以編組訓練，建立民間的武裝組織。

然而，正當工作順利開展的時候，惠州一帶一個由港九青年和惠州縣城青年組織的抗日政治團體——「東江服務團」卻因爲被指控思想行動有共黨嫌疑，而被軍政當局下令解散。東區服務隊因爲工作方針和名稱與它近似，連帶地也招致外間懷疑；所以，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下令：東區服務隊暫緩武裝民間隊伍之事。

東區服務隊於是調離羅浮山區福田鄉，轉赴距離前線較遠惠州以東的橫壠鎮。

由於當地文化落後，文盲眾多，東區服務隊的工作便以安政教民爲目標。他們計劃以橫壩爲中心，在惠陽、博羅、紫金、河源等四、五個縣區，每保辦一間戰時小學。由於師資缺乏，丘念台於是決定帶領東服隊員，徒步到嘉應州梅縣、蕉嶺等地，招募新隊員和新師資。⑬

「過完舊曆年，」黃素貞帶著憶苦思甜的心情追憶那趟難忘的原鄉行。「我們便由橫壩出發，經由藍塘、紫金、黃塘到河源，然後搭船到龍川。當時正是春雨綿綿的寒冷季節，我們穿的草鞋、布鞋都濕透了，腳底又疼又癢；有些女同志還難過得淚流滿臉。老蕭告訴我們，這是腳底神經受冷而發炎的關係，如果有阿士匹靈之類的止痛藥的話，會好過一些的。但是，因爲沒有，我們只得默默忍受。後來，老蕭就搬來一只尿缸，再把蘿蔔乾放進尿缸煮；然後要我們用含有亞摩尼亞的熱蒸氣熏腳；這樣也起到了一定消炎止痛的效果。……坐船以後，路就沒有這麼辛苦了；我們後來也都逐漸恢復。我們然後又再步行到興寧，經五華到梅縣；在梅縣松口停留了二、三星期。我們不但招考了一批新師資，而且見到了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後來，老蕭和我得到念台先生的批准，就在當地同志古培靈的陪同下，前往位於梅縣狀元橋旁下市的蕭家祖厝，一探究竟。這棟祖厝是三進的三合院，房子還很新，紅瓦屋頂，地舖四方紅磚，兩側廂房的房間還都掛著門簾。老蕭告訴我，這是他會祖父蕭光明蓋的。我們一進到廳堂就覺得跟回到佳冬蕭家一樣，熟悉、親切。」

「抗戰前，」老蕭一邊參觀一邊跟我介紹，「蕭家的老輩還常回來小住幾個月；抗戰後，就很少回來了。」……我們在這裡一邊吃著祖厝管理人招待的炒麵和陳年老

酒，一邊暢談老祖宗的往事和族人的近況，一直到薄暮時分才離開。」

### 羅浮中學總務主任

從梅縣回來以後，半年期間，「東區服務隊」按照計劃，先後在惠陽、博羅、紫金、河源等地，辦了四十五間小學。

一九四三年四月，東區服務隊再調回羅浮山區，在博羅的沖虛觀籌辦一所羅浮中學，收容附近的小學畢業生。同時因為政府無能給予經費補助，羅浮中學採取「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辦校原則，按部就班地工作著。在「教育上前線」的口號下，羅浮中學終於順利開辦了。

丘念台自然是羅浮中學的校長。

「因為老蕭在東區服務隊向來以大公無私及節流生息出名，大家於是指派他擔任總務主任。」黃素貞說：「為了解決經費的困難，老蕭於是把學生繳交的米穀先糶出去，然後把糶穀所得的利潤用來維持學校的各項開支。然而，正當大家都忙著辦學的時候，老蕭卻因為屁股生瘡，沒有及時治療而突然發高燒；他先是不以為意，向同事借了一把利刃，叫我幫他劃開膿包；他想，化膿的血水流出來後，幾天也就好了。可是，膿瘡消了，高燒卻還是沒退；後來，又忽而發冷忽而發燒，身體也一直消瘦下去。老蕭自己診斷是患了惡性瘧疾，於是就服用奎寧丸，病才漸漸好了。老蕭的身體漸漸康復後，懷有七個月大的身孕的我卻又患了瘧疾。這時，我恰

好奉令調回橫壠，在步行途中，我感到肚子不舒服，於是投宿一座德國教堂；當天晚上，因為瘧疾發作，我就吃了一顆奎寧；沒想到，肚子卻突然劇痛起來。後來，就早產了一個五官俱全、但只有四斤重的女嬰。」

二、三個月後，日軍第四次佔領惠陽、博羅兩縣。

## 對台工作

一九四三年四月，為適應抗戰新形勢的需要，一九四〇年在香港秘密成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改組為正式黨部，並改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在福建漳州正式成立，由台南人翁俊明出任主任委員，執行委員林忠兼書記長，其他執行委員包括丘念台、謝東閔及郭天乙等人擔任；委員會從此展開策進收復台灣失土的工作。⑯八月廿三日，丘念台於博羅福田東區服務隊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建請恢復台灣省制及設立台灣省黨部，以免令「國內志士台島遺民」失望。⑰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翁俊明被謀害，國民黨中央派書記長林忠兼代主委。十一月廿六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會議後，發表聯合宣言，說明盟國對抗日戰爭的政策，其中並確定「台灣在戰後回復祖國地位」。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七日，林忠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以「自念尸位素餐，恐於公私兩無益」之理由，請辭本兼代各職。⑱國民黨中央於是改派蕭

宜增代書記長兼主委，同時也把黨部遷往福建永安。<sup>②</sup>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爲了整飭台灣黨部工作，通知所有相關人員到永安參加工作會議。丘念台於是帶著蕭道應、鍾浩東及李南鋒三位台籍男隊員，由廣東惠州出發，步行前往福建永安述職；並且在三月九日前平安抵達。會議決定：往後要「加強內地與淪陷區台胞組織及廣羅人才爲台灣革命基幹」，爲此要成立「閩南工作團」和「粵東工作團」兩個機構，各自分頭運用華南各省淪陷區的台灣僑民，滲入台僑團體工作；其中，粵東工作團，由丘念台擔任團長。

丘念台帶著蕭道應、鍾浩東與李南鋒三人，在永安和漳州停留了兩個多月，才回惠陽駐地。與此同時，因爲作風樸實，一直被視爲「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東區服務隊被迫解散。丘念台認爲，抗戰已進入勝利的艱苦階段，必須把握時機，積極推展工作。所以，把原有在各學校的隊員，全部加入粵東工作團，並分派團員僞裝商旅，深入香港及廣州各地，聯絡台胞。丘念台認爲「要運用台僑滲入台灣，必須在接近淪陷區的地方去做，羅浮山區毗鄰日寇佔領根據地的廣州和香港，我們在那邊已有五、六年的工作歷史，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民眾基礎，豈不是發展台灣黨務的最好地區嗎？當然我們不能捨棄這個工作基地。」<sup>③</sup>此後，丘念台便以羅浮山區爲根據地，帶領蕭道應等台灣青年，爲策進收復台灣而奔走於粵閩之間。<sup>④</sup>

一九四五年二月，惠州再度失陷。丘念台率領粵東工作團團員，由惠陽移駐梅縣的南口圩。八月，粵東工作團在穗、港、汕都已和台胞聯絡上了；丘念台再度前往永安，向台灣黨部做工作報告。七月十九日，丘念台於漳州筆擬《復台大計管

見》，就如何收回、統治台灣之事，提供國民黨當局參考；《管見》強調台灣之收復、統治，「當以民族主義收復，以民權主義統治，即以建立三民主義新台灣省為最高原則」。七月廿八日，再擬《台灣黨務改進管見》，指出國民黨之「台島黨務，進行已數年；在國內已未能團結台胞，在陷區尙未能吸收台胞，在島內又未能交通台胞。故今宜急起直追，積極組織台胞，選拔其英俊，團結其才智，護擁其生計，涵育其意志。則在國內，可以利抗建，在陷區，可以助擾敵、籌通台；在島內，可以策自戰，圖恢復，便統治。豈特區區搜索敵情而已哉？……」八月一日，並將這兩篇建議書連同台灣區域略圖與台灣軍要略圖呈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認為，丘念台所擬《復台大計管見》及《台灣黨務改進管見》，「均極切實，且富建設性」，並「分別函轉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及中央組織部參考與採擇」。<sup>23</sup>

就《復台大計管見》及《台灣黨務改進管見》的內容看來，其中對台灣情事的報告可以說是做了既詳細而深入的調查；就此而言，雖說丘念台「生於台，長於粵，而學於日」的背景，對台灣的瞭解，比起其他國民黨要員來得相對「見聞較切」；但是，如果沒有蕭道應等台灣青年的參與、協助的話，光靠丘念台自己，卻也無法如此準確把握吧。



## 尋找東江縱隊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抗戰末期，蕭道應也跟「東江縱隊」有所聯繫。文件指稱：「蕭道應於抗戰時期在廣東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東區服務隊任隊員時，曾接受左傾思想之教育，三十四年夏，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聯繫，至抗戰勝利後失卻聯繫。」<sup>②4</sup>

對此，蕭道應坦言道：「抗戰勝利前一年多，東區服務隊已解散，東區服務隊已有好幾位隊員投奔到東江縱隊去了。我於是去找擔任東江縱隊大隊長的同鄉鍾國輝<sup>②5</sup>說：『我要參加（東江縱隊）！』他說：『好吧！你住什麼地方？』我說：『羅浮山的徐福田。』後來，就有一個姓薛和另一個姓王或黃（忘記了）的人來找我談話；但是，因為我們是日本籍，東江縱隊便把我門當作是國際友人，很客氣。……」

②6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一日，廣州淪陷，東江各縣區鄉長等政府官員逃之夭夭，當地青年紛紛起而組織武裝部隊，抗日自衛。其中站在人民立場，始終堅持抗日鬥爭的便是「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和「東莞縣壯丁模範隊」二個部隊。它們的成員包括：華僑子弟，海員，工人，知識份子，學生與農民等優秀青年。

以曾生為隊長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在第四戰區第三游擊隊司令部成立後便受編為其轄下之新編大隊，活動於惠陽之坪山，龍崗，淡水及惠寶沿海一帶，迭著功勳。一九三九年冬，擊退從葵涌、壩江、鹽田之來敵，曾獲四戰區司令長官張

發奎及惠州指揮所香翰屏主任令之傳令嘉獎。至於「東莞縣壯丁模範隊」，在國民黨第四戰區第四游擊縱隊司令部成立時，也受編爲其直轄第二大隊，以王作堯爲大隊長，活動於東寶前線及廣九路沿線；並且也因打擊敵僞，戰績輝煌，迭受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東江指揮所及該區司令傳令嘉獎。

由於這兩支抗日部隊在民眾中威信日漸提高，部隊日益擴大，因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之忌，於是在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間的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發動國民黨軍隊武裝進攻人民游擊隊中心駐地坪山；曾、王兩支隊伍爲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於是分別東移海（豐）、陸（豐）、惠（東）邊境山地會合。同年秋，日軍又發動攻勢，企圖封鎖港韶線，擴大東江佔領區，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逃，曾、王兩支隊伍於是又在八月間開回前線，發動民眾進行抗日武裝鬥爭，並易名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積極開展東江敵後游擊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港九全部淪陷後，該隊即動員與組織當地民眾，堅決展開港九敵後游擊戰，並成立「港九大隊」，不斷擴大。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軍打通廣九路，東寶兩縣全部淪成敵後。這時候，「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抗日民主力量也更擴大與鞏固，於是在十二月二日，正式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宣言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曾生爲司令員，王作堯爲副司令員，重新整編。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湘桂，粵北告緊，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退，東江縱隊乃派隊挺進新淪陷區，發動民眾抗日，並將活動地區擴展至東江北岸。一九四五年一月，廣東幾乎已成全面淪陷之局面，東江縱隊又派

隊挺進各新淪陷區，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推行減租減息運動，並先後建立江北解放區、粵北解放區及海陸惠邊解放區。

這樣，當「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夏，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道應）聯繫」時，東江縱隊已發展到包括四個指揮部，十一個支隊的規模（縱隊之下為支隊、大隊、中隊和小隊）。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軍隊立即加速調集，有計劃地向東江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企圖一舉殲滅東江縱隊；經過了差不多半年的激戰，中共按照《雙十協定》的談判原則，把東江縱隊主力撤到隴海路以北的山東煙台，其他大部分遣散。<sup>②7</sup>

因為這樣，蕭道應就與東江縱隊失去了聯繫。

### 台籍官兵集訓總隊中校主任

一九四五年九月，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粵東工作團負責人丘念台，穿著「一身草綠色的破軍服和草鞋」，進入廣州。當時，居留廣州及其近郊的台僑約有兩萬人，其中隸屬日本軍籍者一千六百人。國民政府除了在市內設立十六個收容所，安置一般的台籍僑民之外；並於花地一所舊工廠內，收容一千三百名台籍原日本兵（包括軍伏和通譯）和三百名女護士（後來海南島又來了兩千多人，總共五千人）；並由第二方面軍長官部特設「台灣籍官兵訓練所」，派軍官符某（駿）主持。丘念台獲聘為顧問，並決定一切訓練計劃；同時帶去三、四位粵東工作團的團員，擔任教

官。⑳

「東江縱隊的人希望我能夠爭取機會，進去工作。」蕭道應說：「我和黃素貞於是就到了廣州。我一到廣州，丘念台就找我，問我：『要不要去？』我就說：『好啊！』……丘念台於是任命我為集訓總隊的中校政訓主任，黃素貞則被派為少校教官兼女子大隊副大隊長。其他台籍的輔導教官還包括：張旺（少校）、鄧錫章、王詩琅等人。」

集訓總隊的全名應該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集訓總隊」，主旨著重於精神訓練。起初一段時期，這批隊員的絕大部份人，因為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宣傳的影響，對自己所處的地位與未來的前途，頗感迷惘與遺憾；尤其是那些女護士們，剛接收時，還有人因為惶恐想不開而自殺的。蕭道應和黃素貞，以及那些台籍教官立即親往慰問，用台語（包括客語）和日語向他們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並說明我國對日抗戰的目的，就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並收復台灣等失地；然後安慰他們說，現在台灣既然已經復歸祖國懷抱了，那麼，所有的台灣同胞理所當然都恢復為中國國民，以後更要負起重建台灣和復興中國的責任。這才逐漸把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㉑

「有一天，」蕭道應說：「張旺（他也是國際友人）奉組織之命，找我聯繫，要我發展集訓總隊裡頭的組織。我要他提名單，他就提出：張旺、鄧錫章、王詩琅、蕭太太和我。因此，可以說，那個總隊已經被我們佔領了。……」

正因為這樣，回到台灣以後，裡頭的隊員，包括：石聰金、黃培奕、賴阿煥、王石頭和女隊員高草，也都投入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 霍亂事件

在離鄉背井苦苦等待船隻回鄉的半年日子裡，集訓總隊也發生過一場可能引起暴動的霍亂事件，幸好學醫出身的政訓主任蕭道應挺身而出，處理得宜，事態才有擴大下去。

「由於隊員們經常利用空閒時到河裡游泳，抓蜆子吃；後來就有人拉肚子，傳染霍亂。」蕭道應說：「最初，兩個人感染，死了一個人；我就用灰錳氧（氧化劑），給第二個消毒，再開刀，把屁股的濃瘍取出。因為沒有手套可戴，只好以克難方法赤手執刀來急救病患；結果，那個人還是死了。有些隊員因為想回家啦等等情緒，心裡累積了很多不平，於是就以此為藉口，想鬧暴動。張旺得到消息就叫我不要去了！可我還是馬上趕過去。『你們不要認為我是大番薯吃小番薯！……』我去到那裡便跟那些不滿的隊員說，『你們想想看，究竟是我消毒過的手乾淨，還是他的屁股乾淨？我都不怕死，不怕被大便膿血裡的細菌傳染了，你們還嫌我的手不乾淨嗎？……』經我解釋清楚後，他們也都被我安撫了。我於是規定：從此以後，所有人都不能再去河裡摸蜆子來吃；另外，爲了杜絕蒼蠅的傳染，開水、飯菜煮好後馬上放在蚊帳裡頭，所有人都在蚊帳內吃飯。後來，第二批有兩個人感染，第三批

又再兩個人感染；我都給他們打鹽水針。結果，以後就沒再擴大了。五千人的集中營，沒有人能扼止的霍亂傳染病，可我卻做到了，一共只死掉二個人。這可以說是我最大的值得討功勞的地方吧。」

## 返台以後

一九四六年五月，黃素貞帶領大女兒惠區與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兩百名女護士，先行返台，並回到屏東佳冬蕭道應老家，待產；六月，再添一女。

後來，蕭道應到汕頭辦完事後，也回到台灣。他在台北見了杜聰明老師，杜聰明要他在法醫學系當講師（日本教授已回日本了），發揮他病理及解剖學上的才能。

八月，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黃素貞於是去那裡教國語文課程。與此同時，黃素貞的父母由上海返台。

「當時，」黃素貞說：「爸爸恰好有個來台灣接收的福州老友，因為在台灣住不慣，要回福州，就將一棟位於中山北路巷內二十幾坪的日式房子，贈與有恩於他的爸爸。這樣，我們一家老小，在台北的居住問題，就解決了。二二八事件後，老蕭分配到位於東門附近的台大宿舍，因有前後院，房間也比較大，我和老蕭一家人就搬過去住。」

## 組織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

「事件發生後，時間槍聲，」黃素貞回意說：「當時，老蕭還是時發瘧疾，可他还是跑出去，弄得衣服都是血回來，說是幫人家抬了屍體。後來又發了高燒……。」

對此，胡鑫麟醫師也說：「到了當天半夜，法醫學的一位先輩找上門來，說他的同志在長官公署前被打死，要收埋買棺材，要我幫忙。半夜來找我的那位醫生，後來也出事了。……當時是國民黨員，而且是省黨部的委員……。」<sup>30</sup>

胡鑫麟醫師是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四屆（一九四二年九月畢業）的畢業生，這裡，他所說的「法醫學的一位先輩」，指的應該就是當時任職法醫學系的蕭道應醫師。

問題是，蕭道應「當時是國民黨員，而且是省黨部的委員」嗎？

對此，蕭道應先生曾經從側面回答說：「光復前，陳儀的訓練班招募人；我推想那邊（共黨）的想法，所以發動朋友儘量去參加，以便打入各機關；連黨工訓練班都叫人進去。所以，我認為，不管是黨部也好，警局也好，有很多我們自己的人。……我曾經介紹王詩琅到台灣省黨部任職。當時，就是王致遠，也不知道我與王詩琅的關係。……」

王致遠是蕭道應在東區服務隊的老戰友，他不但是丘念台的女婿，也是丘念台

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時的秘書。據查，丘念台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初，由上海搭機抵台；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堅辭民政廳長。七月廿三日，李翼中辭任省黨部主任，任命丘念台繼任，但丘堅決不就任；到八月廿六日才就任，並任王致遠為秘書（後奉命撤退）；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國民黨中常會又任命蔣經國繼任丘念台任省黨部主任。

這樣看來，在丘念台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期間（一九四七年八月廿六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蕭道應的確有可能「是國民黨員，而且是省黨部的委員」；只是，在時間上，胡鑫麟醫師把它提前了半年。這樣的話，胡鑫麟醫師所說，蕭道應他那「在長官公署前被打死」的「同志」，就不會是在「國民黨」裡頭「同志」了！那麼，在國共鬥爭的歷史背景下，它所指的「同志」應該就是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吧！

## 台灣地下黨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派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於同年九月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首批幹部先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



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於同年七月，始潛台領導組織，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張志忠則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sup>③1</sup>

國民黨特務機構所掌握的情報揭露，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在香港秘密舉行「台灣工作幹部會議」期間，既便「二、二八」期間死亡或逃亡者不計在內，台灣全省的中共黨員人數已由初期的「七十餘人」激增為「四百人」左右。<sup>③2</sup>

一般認為，這個數字主要說明：那些曾經積極參加「二、二八」鬥爭而倖存的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也在鬥爭中，認識到日據以來台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無私的戰鬥和犧牲，因而很快就在失落一時的身分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與民族的認同。因此，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氣氛下，勇敢地加入了蔡孝乾領導的中共在台灣地下黨組織，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sup>③3</sup>

蕭道應應該就是這「四百名」台灣青年的其中之一吧。因為《安全局機密文件》指出，蕭道應於「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復與（廣東東江縱隊）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志忠；三十六年冬，由張志忠介紹參加，接受張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調查研究工作」。<sup>③4</sup>

對此，蕭道應所說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二二八期間，有一天，當時任高雄電台台長（電台負責人是陳目田）的莊孟倫碰到我，告訴我說他住在什麼地方，要我找個時間到他家走走。……二二八後，有一天，我去找莊孟倫，結果，莊孟倫和施碧辰及張志忠都在；我第一次見到張志忠。張志忠叫我寫自傳，我也寫了；因為一天只有兩個鐘頭，寫了一個月快好的時候，他來，說：『不要再寫了，就這樣拿給我吧！』過兩天，他告訴我說：『你通過了，但是你太太沒通過！』也沒叫我宣誓。他和我談很多，但是，當時並沒有提到『省工委』這個名稱。我的工作主要是：一、情報工作；政策反應；二、策反。過去，民主同盟有幾個人找過我，張志忠叫我不再跟民主同盟的人聯繫；同時儘量避免被照相。因此，有一次和鍾浩東他們在台北商校開六堆旅北同鄉會時，我就刻意避開照紀念照。……」

「我在抗戰時期就認識莊孟倫了，」蕭道應又說：「我和丘念台去調查翁俊明被殺的事件時，他向我解釋：什麼是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其實，當時我已經懂這些了，只是沒跟他表明身分而已。至於施碧辰，後來，我就沒有他的消息了；張志忠曾經當我的面罵他是逃兵！」

施碧辰，原名施英欽，是彰化籍文化協會鬥士施至善先生的老三，原是東江縱隊隊員。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東江縱隊所屬偽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組織份子陳森煌等案」第四六〇頁所載：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施碧辰與原台灣民眾黨黨員劉雪漁，以及張旺、周耀

旋、許省五等東江縱隊所屬「台灣解放同志會」會員和台籍俘虜陳森煌等十餘名，在廣州羅浮山正式成立「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一九五四年五月間，彰化縣警察局刑警隊接獲線民密報陳森煌歷史與行蹤，乃於同月廿九日派員會同台南市警察局刑警隊，按址緝捕，並循供破獲該盟其他組織份子。但是，據文件所載，施碧辰顯然沒有被捕，行方也不明……。

## 二、二八週年祭

儘管「二、二八」後，國民黨極力誇張宣傳中共的「陰謀」，一口咬定「二、二八民變」是共產黨煽動的，甚至主觀捏造了許多中共在台灣的機構，說有什麼什麼工作團，台中有A團、台北有B團、台南有C團等（據勁雨《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然而，由於地下黨從成立到「二、二八」期間，一直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現；對此宣傳，也沒有作出任何的公開反應。所以，一般人民都認為這只不過是國民黨的推測而已。究竟台灣有沒有共產黨？當時，人們還是抱持審慎的保留態度。因為這樣，美國帝國主義所屬的通訊社即利用這種模糊的情況，認真地宣傳「台灣沒有共產黨」，甚至強調台灣人民不歡迎共產黨，反對共產主義；藉此推動他們的「托管」、「獨立」陰謀。

事實上，除了中共自己以外，誰都不會知道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機構和活動情形。

一直要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五日，情況才有了比較明朗的變化。這天，台灣省第二屆運動會在台中舉行。台中市內及運動會場突然出現了大量沒有署名的宣傳品，內容除了介紹人民解放軍六十七條時局口號之外，並附有當時解放戰爭的形勢圖。因為這樣，一般民眾都相信這是共產黨散發的；他們也因此不會再懷疑究竟台灣有沒有共產黨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全島各地又出現了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署名的《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內容主要是：喚起台灣人民憶起去年「二、二八」蜂起時的英勇鬥爭與蔣軍的屠殺情形，而加緊團結，加強對反動派的鬥爭意志，並準備對反動派展開鬥爭；同時也廣泛介紹中共的政策……。

就在「二、二八」一週年前夕，張志忠也向蕭道應指派了第一個任務——在鶯歌、山仔腳間鐵路沿線寫標語，紀念二二八週年。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黃培奕的家，就在縱貫鐵路桃園到鶯歌下坡路段前二公里處的山邊垵下，非常隱密。在此之前的一九四七年年底，蕭道應才在黃培奕家，將黃培奕和另一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石聰金介紹給張志忠。因為地利之便，張志忠指派了蕭道應這個任務。蕭道應接到指令後，隨即組織石聰金和黃培奕進行。一九四八年，「二二八週年紀念日」前兩天，黃培奕和石聰金就趁著暗夜，在桃園、鶯歌間鐵路下坡路段沿途的駁岸上，用紅漆塗寫大字標語：

毋忘二二八！

血債血還！

記住二二八，台灣青年起來！

……

「石聰金和黃培奕寫的字很漂亮，好幾天都擦不掉；」蕭道應高度評價石聰金和黃培奕的行動。「再加上地點又好，南來北往的乘客都會被窗外那醒目的朱漆紅字所吸引。」

石聰金也說：「事後，蕭先生曾向我和黃培奕轉達說，張志忠看了這標語，非常滿意。蕭先生也稱讚我們說：『你們在這時候做出了偉大的工作。』……」<sup>③⑥</sup>

## 台大醫院支部

根據國民黨特務機構所掌握的情報透露，自「二、二八」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期間，「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北區建立的組織包括：「台北市工作委員會」，下轄九個支部；「台北市學生工作委員會」，下轄三個支部；「郵電職工總支部」，下轄兩個支部；一共有黨員一百六十三名，佔了全省黨員人數的五分之三。<sup>③⑦</sup>

另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蕭道應於「三十七（一九四八）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黨支部書記」<sup>③⑧</sup>。

如果此事屬實，那麼，所謂「台大醫學院支部」應該就是所謂「台北市工作委員會」下轄「三個支部」之一了。

「那時候，我在台大法醫研究室服務。」蕭道應針對上述官方檔案解釋說：「雖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黨員，可我沒有介紹過任何一個人入黨。有一天，張志忠叫我去主持一個小組會議；他說，有一個支部，你什麼時候去主持開會。我於是在他所說的時間，前往南昌街謝桂林醫師家，進去一看，在座的都是些醫生，包括：許強、郭琇琮、謝桂林、翁廷俊在內。……我們沒有講什麼名義，更不用說什麼『支部書記』或其他什麼，只是分工。現在看來，它可能是『台北市委』下面所屬的醫師組織，但不是台大醫學院方面的支部。那時候，調來調去的，有危險就馬上調離。開完會後，我又被調走；它就由張志忠直接領導。後來，張志忠就把我和他們隔開來了。……」

### 照顧張志忠的妻子

一九四七年九月，黃素貞離開教了大概有一年時間的基隆中學，轉到北一女任庶務主任。「當時，北一女校長王超筠也是因丘念台的關係任職的，很安全。」蕭道應說：「蔡孝乾原配的弟弟和張志忠的妻子季澐，也在這裡教書。」

「季澐是老蕭帶來給我認識的。」黃素貞說：「後來，她就在北一女教書，住在學校宿舍。校長還要我們本省籍同事多多幫忙她。……當時，在北一女有不少地下黨人，只是我們彼此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志忠前往香港參加中共華東局秘密舉行的「台灣工作幹部

會議」。張志忠擔心此行可能會出事，蕭道應說：「臨行前，他特別交代季澧同我聯繫，並叫我，她有需要錢的時候，儘量幫忙她。我於是跟季澧說：『我在台灣有社會人際關係，妳要是有任何困難，儘量跟我說，不用客氣。』……」

一九四八年年底，黃素貞又懷孕了，並且轉到大同中學任教。

「大同中學校長是我過去認識的朋友，」黃素貞說：「不久，季澧也通過我的介紹，轉到大同中學任教。當時，我和老蕭住在東門的大學宿舍。我們就把我父親位於中山北路國賓後面的房子，讓她和張志忠一起住；他們在那裡先後生了一男一女，我還叫住淡水的表姨來幫她煮飯。一開始，我就知道季澧是共產黨員。印象中，她是一個相當耿直的人，做事有條有理，毫不紊亂，還能寫一手好字，孩子也教育得很好。不過，就是太忙了。我因為也忙於小孩、家務，還有學校的工作，所以，每回規定要看書、討論時就累得打瞌睡；因此也沒機會和她深談。那時候，《光明報》已出現，後來，我才知它是在基隆中學與中山北路我父親的房子油印的。後來，他們夫婦搬到新公園前面的西藥房，我們就沒有再見面。據我所知，季澧很喜歡坐三輪車；她認為要搭乘很方便。後來聽說，特務就是偽裝成三輪車伕，載上她後，就把她逮捕了……。」

## 風暴將至

一九四九年，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走到鉅大轉變的一年。

年初，歷經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形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局面。一月廿一日，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蔣介石發表文告，表示爲「弭戰銷兵解民倒懸」，宣佈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戰場明顯的敗退，台灣的地位也更加重要；相對地，它的政治形勢也更加嚴峻了。

石聰金與黃培奕預估到即將來臨的時代變局，在一月份就同時辭掉《公論報》的工作。黃培奕回到故鄉鶯歌。石聰金先到桃園十三份山區，開闢了一個專爲日後收留政治流亡者的基地；然後返回故鄉苑裡，從事「減租減息」的農民運動。<sup>39</sup>

另一方面，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本省學潮也有不可阻擋的擴大趨勢。

四月一日，南京的和平代表團搭機北上，與共產黨議和，希望隔江而治。也就在這樣和戰不定的政治悶局下，南京各大專院校的近萬名學生齊集總統府門前，舉行一場堅決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然而，鮮血卻在「學生隊伍遊行經過的柏油路面上，……從上午十時緩緩地流向下午五時，然後從南京流向全國。」

四月六日凌晨，鮮血終於也流向海峽此岸的台北市。爲了鎮壓三月下旬以來風起雲湧的台北學運，國民黨台灣當局派出大批武裝軍警，強行闖入師範學院與台大男生宿舍，集體逮捕了兩三百名學生。一般稱作「四、六事件」。

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佈：台灣全省戒嚴。其後又禁止一切「非



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緊接著針對「匪諜」的《懲治叛亂條例》也頒布實施了。

五月廿日起，台灣地區開始實施軍事戒嚴令。

大約就在這時候，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女隊員高草也辭掉《公論報》的工作，然後通過蕭道應的安排，到台大醫院當護士。

八月十八日起，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陸續破獲所謂「成功中學支部」，逮捕「成功中學畢業」的青年與台大法學院學生，並「循供」深入偵查，……擴大破案，總計先後捕獲包括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在內的所謂「匪諜及涉嫌份子四十四人」。<sup>④</sup>

這就是一般稱之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序幕的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

從此以後，外頭一片風聲鶴唳，台灣各地的地下黨員都在擔心著，什麼時候這場政治大風暴會吹到自己的頭上來！

暑假期間，蕭道應和黃素貞也聽到老戰友鍾浩東被捕的風聲了。

「此時，」蕭道應說：「我的法醫研究室還有郭琇琮跟張志忠的弟弟掛名研究員，他們每天都從前門進，後門出，積極活動著。基隆中學那邊出事後，張志忠就交代我，要我叫我岳父：趕快賣掉中山北路的房子，就是便宜賣也好！……」

學校開學後，基隆中學有許多教職員工與學生陸續被捕。

九月廿二日，學校開學廿天的時候，黃素貞又產下一子——繼光。

「我們意識到情勢危險，」黃素貞說：「我就藉做月子的名義，辭去了教員的工作。儘管形勢突然變得非常緊張，老蕭仍然鎮靜地布置著逐步轉入地下的工作。就在兒子滿月的時候，他殺了十幾隻雞，邀請了許多親朋好友，給新生的嬰兒辦了一場二十桌的滿月酒席。然後在第二天，安排我和嬰兒，暫時住到我養父母在汐止山上的老家。」

十二月，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因為內戰的徹底失敗，先後遷移台北。與此同時，各系統的特務機構也集中台北。為了鞏固內外條件都處於不利狀態的岌岌可危的政權，台北國府於是針對各種潛在的反對力量，在全島各地展開全面而嚴厲的肅清作業。

十二月十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言人公開宣佈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任職基隆中學的「匪諜」張奕明等四名。<sup>④</sup>

台灣的歷史進程從此正式進入長達數年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一九五〇年，」黃素貞說：「過了年（二月十七日），因為外頭的風聲愈來愈緊，老蕭就搬出東門宿舍，離開台大醫學院……。」

在時間上，《安全局機密文件》的紀錄，與黃素貞所說略有出入；它說，蕭道應是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因潮州中學教員劉特慎被捕，……為恐牽連，乃開始逃亡，投奔黃培奕及老洪，請求收容」。<sup>④</sup>

「劉特慎老師是廣東人，當時的年紀大概還不到三十歲；」黃素貞說：「他是通過老蕭，介紹給蕭秀利叔叔，在南部家鄉推展農運工作的；隱藏在潮州中學有五、六年之久……。」機密文件另載，一九四九年間，劉特慎曾經指示佳冬地區黨人李丁福與鄭團麟及羅冬梨，成立「佳冬支部」，由李丁福任「支部書記」，鄭團麟「負責佳冬及林邊方面宣傳工作」。<sup>④③</sup>

至於劉特慎被捕的經過，大致如下：

保密局由於偵破「基隆中學《光明報》案」，而獲得了台灣存在「『台灣省工委會』秘密組織之線索，經綜合研判後，即展開嚴密偵查」。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首先在高雄市逮捕了福建籍的「台灣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然後「根據陳澤民之零碎供詞，及從其身上搜出之照片，獲得線索，經多方澈（徹）查，復於十一月八日將劉特慎密捕」。<sup>④④</sup>

綜合上述《安全局機密文件》有關劉特慎的紀錄來看，顯然，劉特慎被捕以後並沒有供出任何他與蕭道應的關係，蕭道應也沒有因為劉特慎被捕而暴露身分。

## 鶯歌黃厝

《安全局機密文件》揭露，一九四九年夏，張志忠面示北部黨組負責人陳福星：「將台北縣海山區（鶯歌、樹林、三峽三個鎮），桃園縣大溪、龍潭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區，苗栗縣大湖區，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整頓，進行深入隱蔽之

群眾運動，挑選積極份子，策動進入山區，設法購買槍枝彈藥，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壯大，擴展成爲游擊根據地，然後始能做到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之攻台……。」<sup>④⑤</sup>

《安全局機密文件》指出：

陳福星（化名老洪），台南人，畢業於日本大學，原是台南新豐農業學校校長，一九四六年秋由蔡孝乾吸收收入黨；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因學校老師林英傑的組織身分暴露，遭到警察圍捕，於是潛逃基隆中學鍾浩東處；其後，張志忠又把他帶到鶯歌黃培奕家，長期隱蔽。一九四八年春，奉命領導新竹以北所有「黨組織」，先後領導蕭道應、黃培奕、曾永賢……等，積極展開「活動」。

④⑥ 「黃家主要以做豆皮爲生，得半夜起來泡豆子，天未亮時磨豆子，榨掉豆渣，煮成醬，再挑豆皮，一張張的烘乾，一張張的剝下來（不能太乾，會破）；還要翻豆皮，讓它烘成不乾不濕，恰到好處，才能拿到市場去賣。小竹竿拿掉豆皮，幾次後還要泡水拿豆腸；一貫作業，技術爲主。」黃素貞說：「他們有一大片房間，雖然幾十家同住卻各立門戶，各忙各的。四位老人家又都深明大義，深體時艱，心懷大志。黃培奕的祖父和叔公是眾人的支柱，他們深惡地方的貪官污吏，常爲年輕人講解正義廉恥之事，是黃家的「黃青天」。二叔公爲人較沉默寡言，但爲正義事，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以後，黃屋事發，他默默地被關了九年，沒半句怨言。真是老

英雄！三叔公爲一勞動階級，終日苦幹硬幹，值得欽佩。另一叔公是茶農，住在茶工廠那邊，是明白是非的人，常囑附家中大小，不可多嘴，不可多與外人閒聊，確保黃屋安全。所以，那裡是個隱藏的好地方。假如不是有內線通外鬼，是不容易被破獲的。」

鶯歌黃厝於是以黃培奕爲負責人，發展爲張志忠最堅定的基地。

蕭道應離開台大後就到汐止山上，把黃素貞和剛滿三個月大的兒子，帶到鶯歌黃培奕家。從此以後，他們這對革命夫妻便開始過著居無定所的流亡生活。

「陳福星（老洪）因爲不知道我們夫婦同張志忠和季滢的關係，所以對此不滿。」蕭道應說：「他說：『蕭太太不是黨員，爲什麼叫她跟老蕭一起走呢？爲什麼我官比老蕭大，我太太卻不能一起走？不公平！』……」

「在黃屋，」黃素貞又說：「我和老蕭就像自家人般受歡迎，大家都叫我們夫婦『姑丈』和『阿姑』。每次碰到戶口臨檢，老蕭就上去三峽烏塗窟基地，我則帶著小孩躲到防空壕；黃厝的居民也都幫我們掩護。在隱藏的生活中，我除了幫些小忙外，就是學習了。最初是收聽海外廣播，學習記錄；但沒有隱蔽的房間，事機不密，被人聽見；後來，我就不敢再聽，以防因小失大。我自己看了書報，晚上再和婦女們聊天，教她們識字；可是大家太忙，不能經常連續。」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台灣省政府通過本省戶口總檢計劃，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行全省戶口總檢查。

「爲了因應即將到來的全省戶口總檢查，黃家在地下挖了坑洞，準備讓我們藏匿。」黃素貞說：「那時，鶯歌地區雖無警察明顯地巡視，卻多的是線民和便衣特務。老蕭考慮到小孩時有哭聲，很不妥當，經過大家商量後，決定把已六個月大的孩子送走。那時，蕭家傭人阿時姑，還在台北和我父母同住；因爲她也是佳冬人，我們夫婦決定讓她把小孩抱回佳冬蕭家。我們於是通過石聰金，聯絡老蕭的表弟賴端元，在約定的時間到山仔腳；我也扮成村姑，背著孩子，在牽著牛的大叔公護送下，前往山仔腳。我看到石聰金做了確定無人跟蹤的手勢後，才敢出來，把孩子交給賴端元；再由他交給阿時姑。……回黃屋的路上，我心如刀割地想起一九四〇年在廣東戰地送子的情景。但是，我知道，現實的鬥爭不允許我停留在傷感的情緒當中……當我回到黃厝的時候，老蕭和其他男同志們正準備進入三峽烏塗窟附近深山根據地，進行武裝訓練，準備裡應外合地實幹硬幹了。」

## 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四九年十月，張志忠、陳福星進入海山區鶯歌（大溪）鎮之烏塗窟山區，召集上述各地區幹部，開辦集體訓練班，並以五千元交與「海山桃園地區負責人」黃培奕，向地方駐軍不肖官兵購買槍彈，計購得步槍一枝，短槍十五支；另由林元枝將日軍投降時所遺下之擲彈筒一挺，復交黃培奕；全部武器除一部份短槍由陳福星先後分交新竹、苗栗兩縣山區各逃亡幹部佩用外，

所贖武器則交由黃培奕負責組成「武工隊」，建立「烏塗窟基地」，形成「游擊根據地」之雛形。同年冬，張志忠、陳福星二人在烏塗窟附近之十三份山區（林元枝領導之「十三份高山區簡國賢支部」）開辦第二次幹部集體學習會，參加者有黃培奕、林元枝、簡國賢等二十人，著重研究台灣山鄉地形及游擊戰術。<sup>④7</sup>

蕭道應也參加了這次的學習會，他說：「十三份集體學習，海山一帶十幾個人參加，很多人我不認識，但他們知道我，聽過我。」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九日，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號被捕。保密局後來又根據蔡孝乾的「供詞」，逮捕了「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等十三人。其後，蔡孝乾在陪伴保密局特務追捕其他黨員時「乘隙脫逃」，不久再度被捕。<sup>④8</sup>

與此同時（一九五〇年一月），「以陳福星為首之北部黨組織，開始重整省委組織；由陳福星、黃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組織臨時領導機構於烏塗窟。」<sup>④9</sup>黃培奕又奉命往中南部，整理雲林、屏東兩縣黨組，以為重建全省黨機構張本。<sup>⑤0</sup>同年三月，各地組織繼續被破，烏塗窟、十三份山區基地成為各地逃亡幹部之避難所，當時林元枝亦率領南崁一帶「犯罪流氓」組成之「武工隊」十五人，撤至「烏塗窟基地」，由黃培奕收容一短時期後，……紛紛外出自首。黃培奕即率所屬「武工隊」，由鶯歌鎮屬山區轉移三峽鎮屬山區。<sup>⑤1</sup>

五月，以老洪為首的北部組織已設法與中央取得聯繫，接到「一九五〇年四月

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sup>52</sup>

「其實，所謂『重整省委會』，究竟是誰在領導，我也不知道。那都是郭乾輝寫的。」蕭道應對國民黨官方檔案的說法質疑說：「實際上，共產黨是沒有名字的，那些支部和職稱，都是國民黨情治單位要拿獎金而安的。……」

國民黨情治單位認為，「省工委」以下的逃亡幹部，「鑒於城市與鄉村社會基礎薄弱，生存不易，使『黨』的組織陷入極度混亂的地步，客觀形勢對彼不利，估計必須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階段，才能把『黨』的組織保留下來。」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於是「採取獨立作戰，互覓聯絡，退守保幹，在鞏固中求發展，利用地方性、封建性的勢力深入隱蔽，與群眾打成一片，積極向鄉村謀取發展，準備等待時機重新活動。」

這樣，同年五月，所謂「重整省委書記」老洪在台北縣樹林山區召集黃培奕、林慶壽、王子英等幹部，組織了「海山區工作委員會」；同年八月，「區委會」成立「資料小組」，由「區委兼宣傳教育幹事」王子英（原台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擔任「組長」，專負搜集與編製各種參考資料。<sup>53</sup>

五月卅一日晚上，蔡孝乾在台北市正聲廣播電台對本省同胞發表「懺悔」演說，並由台灣、空軍、軍中、民本、民聲等電台同時聯播；六月一日，《中央日報》全文刊載了蔡孝乾的廣播內容。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就在這時（一九五〇年六月），蕭道應夫婦也因



爲北部風聲緊，幾個零星據點漸感不妥，通過石聰金的安排，從「烏塗窟基地」轉移到「苗栗縣苑裡、後龍各鄉鎮」。蕭道應「幫助林匪元枝開闢中部地區工作」。<sup>⑤</sup>黃素貞則住到農民阿梅孀家中，一邊跟當地婦女學編大甲草席，一邊利用晚上的時間教她們識字、讀書。

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干涉中國內政，第三天，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十一月八日，中共發佈：中國人民義勇軍已於十月廿五日越過鴨綠江，開赴韓國戰場。

國民黨情治當局認爲：「由於韓戰的爆發，使中共本身陷於『慘戰』的泥潭而無法自拔，『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的口號，成爲過時的泡影。」<sup>⑥</sup>

儘管那些黨人都知道，中共參戰以後，台灣解放的指望渺茫。可到了這年年底，全省各地重整的組織已再具規模，「重整後省委組織」於是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

首先，他們檢討過去失敗教訓，指出「省工委」時期基於「大膽放手」做法，在策略活動上犯了三大錯誤；他們決定依據客觀環境的變化，調整組織策略；在鬥爭方式上，也跟著起了轉變。

## 苑裡後龍山區

後來，蕭道應察覺有人在注意他們（蕭道應夫婦及林元枝）；於是立刻離開苑

裡，由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賴阿煥帶到苗栗十班坑山區。

「賴阿煥的哥哥是位老實苦幹的農民，」黃素貞說：「他嫂子雙眼失明，我常常她挑水做活。因為賴阿煥家目標太大，不久，我們就到隔山的阿金叔家，住了約半年。……山上農民的生活一般都是挑著沉重的蕃薯、砍好的柴及青菜等山產，到苗栗街上賣，再換些米、油、鹽、肉回來。平常，他們煮飯都是把米和十倍的蕃薯籤一起煮，煮好了就把米和蕃薯籤濾起來；再把青菜放進米湯燙過；然後把蠻有營養的米湯用來餵豬。如果在菜上有蘿蔔乾、一些肉或鹹魚下飯，那就算很好了。我看到農民們那滿臉的皺紋所透露的艱辛，除了感謝他們在克苦困難的經濟中敢於苦撐革命的精神之外，更加不忍心增加他們的負擔；可在逃難中，也只能以國家民族爲重，把群眾爲他們付出的金錢和勞力等，推崇爲爲革命而犧牲；他們看我們一樣地艱苦工作著，也非常尊重、敬仰我們。」

在那半年期間，他們曾經遇到二次警察臨檢的危險；結果，都因爲阿金叔應付得宜的急智，化險爲夷。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蕭道應夫婦苦難的第二個農曆年終於來了，阿金叔家的小孩們高興地吃著白米飯、白斬雞和有豬肉炒的菜。蕭道應和男同志們則按計劃，在年前到山上燒炭了；黃素貞只能整日躲在阿金嬸房間，替她抱孩子，補補縫縫的……。

## 南部地區工作

年雖然過了，解放的消息仍茫茫然！蕭道應夫婦又要換環境了。元宵過後，他們夫婦得到組織「化整爲零」的指示，決定不再打擾苗栗一帶的群眾，於是回到南部故鄉，另找出路。因爲這樣，《安全局機密文件》後來才會有蕭道應於「四十年（一九五一年），負責開闢南部地區工作。」的記載吧。<sup>56</sup>

蕭道應夫婦首先來到屏東，找舅舅吳金池。他們在屏東舅父家前後住了約半個月，就轉移到佳冬地區。<sup>57</sup>

這段期間，蕭道應經常和佳冬方面的同學或同志聯絡；他們告訴老蕭：佳冬地區的風聲很緊，特務和線民非常活躍，到處明查暗訪，好似預知有組織往南移的樣子……。他們和蕭道應商量後決定：老蕭夫婦還是不能回家、公開露面，只能到親戚家或相關群眾的鴨寮暫住。

這樣，蕭道應夫婦便在老蕭的老同學羅冬梨和李丁福，以及年輕一輩外圍骨幹——羅芳整、阿坤和李更德……等<sup>58</sup>，以養鰻、養鴨或養雞等工作掩護下，在鰻寮、鴨寮或雞寮等勉強可爲藏身之所，四處遊走。

三月掃墓後，蕭道應祖母的外家孫——林葵，請他們夫婦到他上埔頭村的家裡住。

「上埔頭，全村共二十幾戶人家，只有住在路邊的一戶是外姓人，其餘各家都是親戚；」黃素貞說：「夥房裡頭，各房間都有門簾，向外望，可以看見誰來了，

可從簾外向裡望，卻看不見人。村子的長輩——添來叔和阿秀叔，特別吩咐全村大小，絕對不可向外人透露，家裡有外人來住宿；他們也都守口如瓶。白天，我們就躲在夥房裡頭；村裏的女孩雖各有工作，總還是有人來和我作伴，她們或者跟我學習讀書、寫字，或者一起做針線。爲了避開臨檢，添來叔又在稻埕疊了一個中空的稻草堆，晚上，我和老蕭就爬到裡頭睡覺；他並且和我們夫婦約定，說：『如果，村子在半夜遇到突擊檢查，我就會叫人假裝肚子痛，出來上廁所；你們聽到了，就絕對不可以出來。』……」

在此期間，一九五一年二月間，「北部海山區組織全部被摧毀」。<sup>⑤⑥</sup>

蕭道應只好通過高草，安排王子英和郭維芳到雲林地區（廖學信地方負責人）。

五月十八日晨，前內政部調查局幹員會同雲林警方，據報逮捕了王子英等九人。五月廿八日又在鶯歌樹林一帶拘獲郭維芳。<sup>⑥⑦</sup>

「在台大醫院案發生時，我的身分還沒暴露；」蕭道應事後研判：「可王子英、郭維芳暴露後，我的身分也暴露了。」

蕭道應得到情報說，警方準備大包圍南部各地區，尤其屏東佳冬；晚上，還要帶警犬來上埔頭搜索。

六月一日，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和台灣省調查處組成「特種聯合小組」，正式辦公。同一天，此一小組便根據「獲犯」所供，在雲林逮捕高草等十人。然後偵悉蕭道應及黃素貞在南部潛匿住所多處，賡即指派幹員馳赴屏東緝

捕，由六月四日起先後捕獲楊源盛等二十人。<sup>⑥1</sup>

「高草事件」後，蕭道應夫婦仍藏匿在上埔頭，靜觀其變。晚上，他們還是睡進草堆之中。

後來，風聲越來越緊張，蕭道應夫婦不但不能再回村子裡頭，也不敢再待在上埔頭地區，於是就轉移到林邊溪河壩邊一個叫阿立哥的養鴨人家。

## 北上苗栗

有一天，大洪水過後，阿立哥到林邊溪溪邊圍佔種西瓜的地；但是，強壯的他卻不幸被大水沖走。阿立哥遇難後，蕭道應夫婦和其他同志們只好繼續向更遠的西瓜園走去。

到了八月，經過組織的研判，南部佳冬地方已待不下去了。蕭道應夫婦於是走出躲了兩星期的西瓜園，到東港站搭車，前往苗栗。<sup>⑥2</sup>

火車進入苗栗縣境，已過中午。蕭道應夫婦在通霄海邊的白沙屯站下了車，然後沿著山路，向三義方向的山區前進。

蕭道應夫婦在魚籐坪羅姓群眾家住了幾天，又轉移到苑裡石聰金家。

但是，石家畢竟是個大家族，雖然各立門戶，但人多口雜，不能久住。石聰金於是又安排黃素貞住到群眾阿柳嫂的家。後來，林元枝、缺一隻手的阿標和阿木等

人也來到這裡；賣魚的老莊、做工的老孫、討海的阿卻叔和阿卻嬪也常來串門子。

## 布置內線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起，前內政部調查局在竹東破獲「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竹東地區組織後，繼續不斷地、嚴重地破壞其他地區組織。為擴大大事功，將「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全部撲滅，該局乃於五月廿五日將全案偵查詳情函請台灣省情報委員會統籌辦理。台灣省情報委員會決定由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三單位組成「特種聯合小組」，專門偵辦本案；六月一日，「特種聯合小組」正式辦公。

經情報治安情報機關配合行動後，到八月為止，「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殘餘幹部以及省委機構已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到苗栗地區。

「特種聯合小組」根據各方面既有的線索加以分析後判斷：「老洪及其領導幹部曾永賢、蕭道應等，均潛竄於這一地區，企圖生存和發展。」

因此，苗栗地區便成爲「特種聯合小組」向「重整後省委領導組織」作深入滲透，以利偵破的重要據點。

## 魚籐坪基地

三義魚籐坪，其實就是「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領導中心所在的基地。據黨人張南輝說，魚籐坪是他開發的基地之一。

張南輝，一九二七年生，苗栗頭份流水潭的佃農；一九五〇年，奉老洪令，轉移到銅鑼芎蕉灣一帶，推動三七五運動，喚醒農民的階級意識；其後，他又按照老洪「利用地方性、封建性的關係發展組織」的指示，在群眾謝發樹的協助下開發了銅鑼九分寮基地；然後再沿著山脈向南打點，再以點打點，陸續開發了十分嶼、薑麻園、關刀山和大草排等幾個據點；最後終於通過群眾羅盛鼎，開闢了魚籐坪基地。

魚籐坪羅家一共五兄弟：盛鼎、盛昌、盛春、盛土和小弟盛水（還在上學），堂上還有老母親。羅盛鼎是羅家兄弟中的老大，當時已婚，育有三個女兒；他的岳父謝雲開，日據時代曾是農民組合的小鬼，對革命事業是支持的。張南輝即是通過謝雲開的引介，前往羅家幫農，並與羅盛鼎結拜同年。魚籐坪基地建立以後，羅盛鼎又跟張南輝與林慶壽（桃園人），南下霧峰一帶山區，為組織開闢一個安全的後方，最後在逃亡中被擊斃，其妻仍帶無怨尤地上山下田，撫育三個孤女。

由於羅家老母親也支持革命，一家人都很和氣、好客，後來，老洪、曾永賢、林元枝、賴阿煥和蕭道應夫婦……等都陸陸續續來到魚籐坪。當然，除了羅盛鼎以外，其他農民並不知道他們的身分。<sup>⑥</sup>

黃素貞說：「老蕭和我算是最後到達羅家的人。」

安全局機密檔案透露：四月二日，老洪決定將自南部撤退至苗栗地區的蕭道應夫婦交給老范；老范於是把蕭妻黃素貞安頓在「特種聯合小組」的偽裝據點內。⑥4

「老范是我在北一女的同事，他任會計，我任庶務組長；所以很熟。」黃素貞回憶說：「他在苗栗的據點很多，常帶同志到他親戚朋友處工作或休息。因為我胖，目標大，經常要在晚上換地方住，並要人帶路逃亡，來到魚籬坪的最初，我便被老范帶到一位自稱姓范的人家去。我只教他們以和為貴的道理。」

《安全局機密文件》又載，老洪於四月十日與老范會報時，將一個秘密山洞交給老范和蕭道應使用。同時決定二十六日在該山洞舉行會報，總結一年來的工作。

⑥5

《安全局機密文件》又說，老洪與曾永賢臨行時，囑咐蕭道應，廿五日晚至大安溪接曾永賢北上；老范則於廿六日，至鯉魚潭山上，接老洪北上。⑥6

### 蕭道應等人被捕

二十三日，「特種聯合小組」動員二十個精幹的行動人員，分配其中十一人去附近平地接應，另外九人分爲三個小組，並事先安排撲山洞的順序，誰放哨，誰打電筒，誰網人，誰搜查洞內等基本任務。

二十四日，當一切準備工作都好後，「特種聯合小組」便於晚上九時，把這二十個都「化裝成農民」的行動人員送到公路邊，分頭執行任務。此時，大雨傾



益；其中十一位工作人員在附近「關係同志」家中躲藏起來，候令上山接應；另外九個工作人員則越過大安溪，沿著羊腸小道，冒雨行進。終於在午夜二時，到達山洞附近二十公尺之處，並迅速完成埋伏。「內線」老范於是首先「摸洞爬入」，與蕭道應交談。

到了三時左右，老范托詞小便，外出與「特種聯合小組」負責人聯絡，並將槍交給「特種聯合小組」負責人，轉身返洞。

三時卅分，「特種聯合小組」第一、二、三號行動員根據預定的計畫，循序摸到洞口，魚貫入洞。蕭道應發現後，尋槍不著，就拚命向第一號行動員猛撲，開始肉搏。這時，第二號行動員也已進洞，將兩個群眾予以制服上銬。接著，第三、四號行動員陸續進洞，幫助第一號與蕭道應搏鬥，因洞小且狹，不能起立，跪著碰撞跌打，簡直無進退迴旋的空隙；足足肉搏咬打了四十分鐘，始將蕭道應制服，網於洞內。

### 黃素貞被捕的那個晚上

黃素貞在蕭道應被捕後，也接著被捕了。

「離開會的日子近了的的時候，我又頭戴斗笠，打扮成村婦，走出老蕭的山洞，回到村裡范姓『群眾』家。日子在等待解放的心情下，感到或快或慢地渡過。」黃素貞回憶自己被捕的經過說：「那晚，向來都睡不安眠的我，卻在酣睡中被叫醒；

我猛醒過來，看到那婦人正睜眼看我，門口站著幾個陌生人；他們說要檢查身分證，我就把身分證拿出來，給他們；可他們連看也不看就對我說：『趕快穿好衣服、鞋子，跟我們走吧！』我當下覺悟：「該來的終於來了！」因為抱著成仁的決心，對死也就沒什麼可怕的了。我心裡想著，待會要怎麼趁機脫逃，引起他們開槍；這樣就可讓槍聲警告老蕭他們了！他們並沒有綁我，就叫我走。一走出口口，看到剛剛割完稻的田，我拔腿就跑；但是，跑沒幾步，腳卻陷進爛泥沼中，拔不起來！他們也沒有對我開槍，只有兩人追過來並兇惡地罵我說：『本來不想綁妳，要讓你自己走的；既然這樣，那就綁起來！』因為沒能向老蕭他們示警，我心裡感到非常懊惱。……走了一段漆黑的山路後，我看到像是車燈的光穿越迷濛的樹林；我正感到納悶時，已經被推上停在林中山路的卡車了。我看到老蕭、老洪、老曾和羅家兩兄弟（盛昌、盛春）都被綁在車上；另外，還有郭維芳和王子英，他們沒有被綁。」

這樣，蕭道應和黃素貞歷經多年的逃亡生涯，終於告一段落。

## 大龍峒拘留所

卡車顯然連夜把蕭道應夫婦等幾名「要犯」直送台北市。

「一到台北大龍峒拘留所，黃素貞和蕭道應就被分別關押。」飯後，他們叫黃素貞為蕭道應打盤尼西林針；因為他的手已腫了一倍大，如吸收不好，手會自己中

毒，要廢掉鋸掉。當時，老蕭的吃飯穿衣和大小解，都有位「自新」的同志幫忙。後來，爲了治療兩手的麻痺，老蕭要求多作運動，如自己動手做乒乓球，自己打水洗澡；手一隻能用，再用一雙腳來幫助。他後來還自己一個人打水給大家洗澡。半年後，他的右手才能動，一年後，左手也能動了。

這段期間，負責這次逮捕行動的調查局第五處處長郭乾輝經常來看他們這些被捕者，除了給他們「訓話」，並要他們多看書，寫筆記。

「郭乾輝跟我說過一句話，」蕭道應說：「他說，政治是無情的！」

郭乾輝的意思當然是要勸蕭道應，既然事不可爲了，不如走「自新」的路吧！「郭乾輝，別字華倫，廣東梅縣客家人。」黃素貞說：「我聽說，他年輕的時候參加了共產黨，是中央幹部，參加了長征；郭太太也是共產黨員。在一次大圍剿中，他被國民黨捕獲，原來應格殺無赦的，卻遇到調查局一位昔日的共產黨員馮達（後被派在情報局工作），以『自新』的辦法處理他們。據說，因爲他們都是高幹，熟諳共黨的一切作爲，就留爲調查局工作了。這次，調查局以共產黨過去的幹部，周全地布置內線的方法，一步步地活捉共產黨人，算是非常成功的。後來（一九五七年），郭處長也因此升爲調查局副局長。」<sup>①7</sup>

到了十一月，黃素貞的預產期逐漸近了。

「我和父親聯絡，」黃素貞說：「他幫我做了保，然後把我送往後車站高婦產科醫院（他老朋友的女兒開的）待產。當時，母親還把她唯一的包金玉環賣了，給

我做生產費用。父親、母親和三女兒北區都住進醫院來照顧我。北區已經很久沒看到我，以爲我是她母親的朋友，叫我阿姨……。廿八日，我生了一個紅通通的男嬰。一星期後，我便抱著嬰孩，回到牢裡。」

## 記者會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調查局安排蔡孝乾、洪幼樵、陳福星（老洪）、曾永賢、林元枝和蕭道應夫婦等十五人，召開自新記者會。調查局給他們每人一份寫好的文稿，要他們在會上面對四十個中外記者，按稿照念。

記者會後，這十五人又分別發表「書面談話」，答覆因時間關係未能回答的記者提問，並從十二月十六日起陸續刊載於《中央日報》。

## 落幕

記者會後，調查局爲了搜捕那些還在流亡的人，於是陸續派出那些被捕「自新」的人，幾個人一組，出外尋找他們，勸導他們出來「自新」。蕭道應麻痺的手復健較好後，也被派出去工作。

調查局要蕭道應去找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前花地集訓總隊隊員石聰金了。與此同時，保安司令部也派出自新的吳敦仁、呂僑木和彭坤德三人搜捕石聰金。

「當時，大甲有人檢舉：消防隊長父親的農場，有十幾個人在工作，很可疑；裡頭有人認識石聰金……。」蕭道應說：「所以，抓石聰金的頭一天，我和張南輝也派去了……。」

「我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被捕的。」石聰金說：「來抓我的主要是吳敦仁、呂僑木和彭坤德；吳敦仁在二、二八前就加入組織，他會唱解放軍的軍歌：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一九四七年以前，他和張志忠、簡吉就開始在一起，到了二、二八時才開始跑路的。桃園十三份發生問題以後，他們跟林元枝（國民黨說他是武裝部隊的司令、匪首）來到苑裡。這個林元枝，在苑裡期間，因為他身體差，要吃魚肝油，要藥啊！我就把我父親辛辛苦苦養豬賣的錢，拿來給他買藥吃。可他那時候就和蔡達三（桃園水利會會長）開始秘密連絡，準備投降了。這是我事後才感覺到的。蔡達三這人是特務嘛！聽說林元枝、蔡達三和徐崇德（後來當過桃園縣長）是保密局的三人組；他們過去同樣是流氓伴啦！林元枝準備投降的時間大約有兩年。所以說，他在苑裡的期間全部都是陰謀。這些人出去集體投降時，將苑裡所有擁護過他們的群眾都交出去了；但是，爲了要抓石聰金、簡國賢、廖成福、林慶壽這些人，他們還得要保留這些關係，暫時不准抓這些群眾。吳敦仁三人出來抓我們的時候，也就利用過去的這些關係，住在苑裡一個叫宋朝清的群眾家中。我們當時在大安鄉那裡開田。宋朝清的妹妹，叫宋英，恰好嫁到那裡；我們在那裡做工，曾經被她見過。有一天，宋英回苑裡娘家，她不知吳敦仁這三人已經叛變了，就把我們的行蹤告訴他們。這樣，一句話，吳敦仁這些人就到當地找了。」

當時，蕭道應、黃培奕和張南輝（跟我沒有關係）也有來；可我主要是栽在吳敦仁那三人，消息的來源是他們三人。」

「當時，我們在那裡開田；」石聰金繼續敘述被捕的經過，說：「他們就先去抓那地主，那地主是大甲消防隊司機的父親，叫吳榮。他們拿我的相片給吳榮看，吳榮說：『是有這個人，但不知道是做什麼的？』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五點，他們就叫吳榮先來我們住的草寮探察情況。我看到吳榮還向他表示：『沒米了，要走了！』他馬上說：『不要走啦！我去借米。』結果，他一方面去借米，一方面向已經在外頭包圍、等消息的警察報告。我和廖成福（十三份人）、莊金明（苑裡人）就這樣被捕了。」

那麼，石聰金自己又是怎麼看待蕭道應在這次逮捕行動中所扮演的腳色呢？

「我後來聽黃培奕說，」石聰金說：「蕭先生曾向吳敦仁這三個人要求：『暫時保密發現石聰金下落的消息，不要報出去；然後，我們再私下帶他出來自首。』當時，蕭道應和黃培奕代表調查局。可是，那三個叛徒卻不同意蕭道應他們的建議啊！他們不同意的理由是：石聰金的意志很堅決，萬一他不聽話，不肯出來自首，他們負責不起。他們一定要把我的行蹤報告給刑警隊和保安司令部。因此，我後來才會以『被捕』的罪名判刑。……當時，蕭道應也無可奈何啊！」

石聰金被捕後，跟蕭道應有關的同志，就只剩下賴阿煥一人還在逃了。石聰金後來也被派出來，尋找賴阿煥。

「我們被捕以後，十二月十日被押至苗栗，二十日解往台中，廿四日送台北，廿八日移押去軍法處。」石聰金接著解釋他決定答應出來找賴阿煥的心理轉變。「因為陳福星的供狀（自白書）裡頭說：『石聰金不是黨員！』，我免去了被槍斃。後來，我被送走去和張志忠同房。當天，大概是黃昏五點多，我一進入牢房，赫見張志忠；張志忠走過來，把我緊緊抱住，在我的耳邊輕輕又很誠懇且隆重地說：『對不起你們！』……我告訴他，敵人要我出去，抓賴阿煥，我拒絕；可敵人一定要我去。張志忠隨即勸我說：『如果敵人要你出去，你就答應吧！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只要堅持立場，還可以保護賴阿煥逃亡，出去吧！……』他看我還在考慮，於是又勸我說：『二萬五千里長征，失掉連絡的黨員，二十年、三十年以後再連絡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我於是答應出來找賴阿煥。」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張志忠被槍決，享年四十五歲。<sup>68</sup>

那麼，張志忠又是怎麼看待他過去領導過的蕭道應呢？

「我決定要出來找賴阿煥時，」曾經跟張志忠同房交談過的石聰金說：「張志忠又跟我交代說：『你出去後，要多和蕭道應聯絡。』張志忠說：『蕭道應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所有被捕者當中，唯一和敵人抵抗，劇烈格鬥並受傷流血的人。相信他，聽他的，並且將牢裡鬥爭的情形告訴他。』……一九五四年農曆元月九日，我在被捕五十多天後出獄。元宵節，也就是農曆十五日，初見蕭道應，我於是坦白地告訴他：『我是爲了保護賴阿煥而出來的，期間三個月。因爲敵人認爲

賴阿煥是省委，一定要抓到。」後來，在緝捕賴阿煥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張志忠信任蕭道應是有他的道理的。以我的推測，除了蕭道應被捕時的『流血』之外，張志忠信任蕭道應的最大原因是：蕭道應是張志忠單線領導的；而蕭道應被捕後，他與張志忠有關的事情卻全部保留，毫無暴露；跟他們有工作關係的朋友，也沒有人被捕。我想，這就是張志忠對蕭道應信任有加的主要原因。我認為，蕭道應的偉大之處，就是至死都不說出他和張志忠之間的工作關係吧。」

歷史終於要落幕了。

黃素貞後來就帶著小孩，先被釋放。蕭道應則在求死不得的情況下，先是被分發到礁溪工作，後來又被安排到調查局六處四科，做與政治無關的法醫工作。一直到五十五歲，才能以患內耳水腫症，時感頭暈的理由退休……。

二〇〇二年九月廿五日，「畢生濟世救人，熱愛祖國，貢獻心力，追求中國富強統一，堅貞不移」的蕭道應先生，終於走完他悲苦而傳奇的人生道路，享年八十七歲。<sup>⑨</sup>

安息吧！蕭前輩。



註：

- ① 蘇全福〈佳冬「步月樓之役」的總指揮蕭光明傳略〉，《六堆雜誌》第57期，頁40-41，1996年10月1日。
- ② 修業年限三年，後來改為四年；但是，還是比日本人進的五年制尋常中學校，少了一年。
- ③ 針對台灣人的中學教育作了三種改變。首先，為了與日本人的中學校有所區別，台灣人的男子中學校改稱「高等普通學校」；其次，入學資格從「限十三歲以上，修滿公學校第四年或同等學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學校卒業或同等學力者」；最後，允許台灣人的男子中學校「得設一年制的師範科，以培養公學校的師資」。然而，不變的是修業年限（四年）及教學課程上對日語和實業科目的著重。
- ④ 吳建堂《台高會名錄》，頁13-14，台高會發行，1982年10月15日。
- ⑤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89。
- ⑥ 李辰口述，1993年10月10日，廈門。
- ⑦ 一九九二年，李登輝參加台北高校成立七十週年紀念會時的回憶。
- ⑧ 蕭道應先生致筆者書信，題為〈我所了解的許強教授〉，1991年10月。
- ⑨ 轉引自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162。
- ⑩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160。
- ⑪ 李鎮源口述，侯文詠整理〈我與許強醫師〉，《自立晚報》副刊，1991年12月15日。
- ⑫ 本文所有黃怡珍女士的談話皆根據：黃怡珍女士口述證言，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和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採訪，台北市蕭宅；以及黃怡珍女士回憶錄（未刊稿）。以下不另作註。
- ⑬ 一九三九年一月，「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以香港惠陽青年會和海陸豐同鄉會所組織的兩個回鄉救亡服務團為基礎，在惠陽縣的淡水成立。

- ⑭ 蕭秀利(1905-1990)，醫師光復後，曾任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二屆省議員。
- ⑮ 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11-215。中華日報叢書，1976年12月30日再版。
- ⑯ 前引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18-220。
- ⑰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頁302、1980年6月30日，初版。
- ⑱ 前引《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頁324-325。
- ⑲ 前引《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頁336。
- ⑳ 前引《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頁303。
- ㉑ 前引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31。
- ㉒ 前引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23。
- ㉓ 前引《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頁364-398。
- ㉔ 國家安全局印《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31日初版。
- ㉕ 鍾國輝，屏東內埔人，梅州軍事學校畢業，光復後返台，擔任基隆中學總務主任，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被槍決。
- ㉖ 蕭道應先生口述證言，1993年11月7日及1994年3月17日採訪，台北市蕭宅。以下蕭先生的證言不另做註。
- ㉗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作者未署名，收錄於廣東省檔案館編《東江縱隊史料》，頁7-28，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一版一刷。
- ㉘ 前引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41。
- ㉙ 前引丘念台《嶺海微飆》，頁241。
- ㉚ 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整理〈醫者之路〉，1994年11月20日起，《自立晚報》副刊連載。
- ㉛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12頁。
- ㉜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18頁。

- ③ 吳克泰語，詳見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第62頁，時報出版公司，1991年6月30日，初版一刷。
- ③④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
- ③⑤ 蘇新《憤怒的台灣》，頁221-222，台北時報版，1993年2月15日，初版一刷。
- ③⑥ 石聰金先生第一次證言，1988年10月26日，苑裡石家。
- ③⑦ 《中共的特務活動》，頁331，香港阿爾泰出版社，1984年1月。
- ③⑧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
- ③⑨ 前引石聰金先生證言。
- ④⑩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
- ④⑪ 1949年12月11日《中央日報》。
- ④⑫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
- ④⑬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88頁。
- ④⑭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10頁。
- ④⑮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3-394。
- ④⑯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04。
- ④⑰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3-394。
- ④⑱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7-18。
- ④⑲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4。
- ⑤⑰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2。
- ⑤⑱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4。

- ⑤2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04-205。
- ⑤3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31。
- ⑤4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08。
- ⑤5 裴可權《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頁96，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二版。按：此書實為郭乾輝（華倫）所著，原名《台共叛亂史》，調查局印。
- ⑤6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08。
- ⑤7 另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0）安潔字第四六六四號判決書」所載，這段期間有關蕭道應夫婦的行蹤大致如下：「一月間，黃怡珍匿居吳金池家二日；轉楊源盛處（潮州崙東里）。二月初，蕭彩祥攜黃怡珍至蕭福丁家（美濃龍肚）藏匿，共十五日。農曆正月十五日（二月廿日），蕭彩祥知政府緝捕黃怡珍等甚緊，復將黃怡珍帶至劉妹德家（美濃清水里），藏匿十五日。二月間，黃怡珍介紹蕭彩祥入黨；三月間，曾在蕭彩祥家開會二次，蕭彩祥旋奉黃怡珍命，擔任通訊員，經常與羅冬梨、楊源盛、劉妹德等聯絡；並藏匿黃怡珍、蕭道應于自己家中（麟洛麟趾村）。三月下旬，蕭彩祥又將黃怡珍引至蕭福丁處，匿居十五日。農曆二月間（三月八日至四月五日），黃怡珍介紹楊源盛入黨，任屏東至台南方面聯絡員。二、三月間，曾思鄰窩藏黃怡珍居住數日。四月間，楊源盛將黃怡珍、高草藏匿于曾思鄰處（內埔美和村）。四月間，蕭道應、黃怡珍等在蕭東應家（麟洛麟趾村）匿居，曾勸其入黨，雖被拒絕，但已允為工作。五月間，楊源盛又將黃怡珍藏匿于戴寬鄰家（佳冬昌隆村）。」一般認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判決書大都為造罪而寫，與事實出入極大。
- ⑤8 據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88，李丁福為「佳冬支部書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身分暴露，轉入地下；該支部改由羅冬梨領導聯絡。李更德係李丁福族親，在李丁福逃亡後，替他擔任情報及聯絡工作。一九五一年三、四月間，李丁福曾與蕭道應、羅冬梨、鄭團麟等，在佳冬上埔頭會商。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該支部被破後，李丁福與羅冬梨辦理「自首」，李更德「交付感化」。
- ⑤9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392。
- ⑥0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10。

- ⑥1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10-211。
- ⑥2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208頁記載，蕭道應於「四十一（一九五二）年元月，由南部『撤回』中部，參加匪黨省籍『幹部會議』，協助老洪策劃全地區活動。」
- ⑥3 張南輝口述證言，1993年10月27日採訪，頭份張宅。
- ⑥4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16。
- ⑥5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16。
- ⑥6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17。
- ⑥7 據杭立武〈懷念郭華倫先生〉一文透露，一九四二年起，他先後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央調查統計局、中央黨員通訊局等機構從事對共產黨鬥爭的工作；另據王維理〈不凡的鬥士〉一文所載，一九四九年，他從上海被派到台灣。杭、王兩文皆載於《郭教授乾輝先生追思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⑥8 前台北市衛生院「市衛火字第0321號」火葬許可證，1954年3月18日。
- ⑥9 蕭道應先生訃文。

# 花地的史懷哲——

敬悼蕭道應先生

石聰金

## 前言

我是石聰金，一九二五年出生於苗栗苑裡佃農家庭。

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帝國規定：殖民地台灣凡年滿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人，都要志願從軍，以示效忠日本天皇。我就這樣被征調到海南島，然後徵兵到陸軍部隊，一路跟隨部隊經海口、雷州、湛江，最後行軍到廣州。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

## 回到祖國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爲了照顧台籍士兵免於和日本戰俘爲伍，丘念台組織「台籍官兵集訓總隊」，把我們帶到花地（廣州珠江南岸）。當時，蕭道應先生擔任總隊的教務主任，而蕭夫人也在此教導國語和歌唱。蕭先生是一位民族意識堅強的鬥士，他一直積極參與抗日戰爭。從集訓總隊開始，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就給我們很壞

的印象。那時，貪污、舞弊等現象簡直司空見慣。通過蕭道應夫婦，還有張旺、鄧錫章、王詩琅等教官的開導，我在海南島四、五年期間，許多搞不清楚的思想問題，都搞清楚了。當時，我經常買一些雜誌，像是《觀察》、《NEWS》等等來看。關於國共談判的情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 專業救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地期間，蕭先生曾經拯救了好幾千名的總隊官兵。

那年十月中，霍亂仍然肆虐，卻有隊員趁珠江退潮之際，撿拾蛤蜊帶回軍隊烹煮。當日早餐過後，約上午八點左右，開始有人上吐、下痢，並逐漸擴散至整個中隊，到了十點已經相當嚴重。次日清晨五點，三名隊員因為嚴重脫水而死亡，當晚七點隨即在操場火化。

蕭道應先生憑著醫學知識的判斷，認定「病從口入」，於是當機立斷，即刻封鎖廚房和廁所，進行場地周圍消毒、餐具川燙、和在廁所灑石灰等防治措施，並且規定全體必須在蚊帳內用餐吃飯。蕭先生領導三、四百名護士，持續不斷照料病患，就在這樣的危機處理下，終於幫助全隊好幾千名官兵一同渡過危險。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平安回到台灣，而所有的隊員都因此懷念和永遠感激他。所以我要說，他是花地的史懷哲。

## 逃亡

回到台灣，當時失業問題相當嚴重，看到《新生報》發表有關台灣失業問題的文章後，我和邵水木、黃培奕等三人，就主動去找《新生報》社長李萬居談失業問題，希望跟他一起為失業救濟的事做點工作。

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五日，李萬居辦的《公論報》創刊；十一月，我受邀進入報社工作。這年年底，蕭道應先生才將我和黃培奕介紹給張志忠（在黃培奕家）。後來，國民黨政府開始整肅異己，白色恐怖正式啓動，我們也開始逃亡的生活。那時，黃培奕將呂僑木、蕭道應、林元枝等四人，交給我，要我協助安排逃亡。賴阿煥自願要跟我們走，於是我對他說：「既然這樣，那我帶呂僑木回苑裡；你帶蕭道應夫婦及林元枝到十班坑。」這以後，其它人也陸續來到苑裡地區。經過一年多，陳福星才將蕭道應、林慶壽、林元枝等人，叫去山線那邊。

## 被捕

一九五二年，蕭道應先生被捕（四月廿五日）前二十天，賴阿煥碰巧在苑裡荳蔻坑路上遇見我和廖成福。他很著急地跟我們說：「蕭道應因為雲林地區出事了，所以從南部上來苗栗，卻一直連絡不到你們。……」我於是和賴阿煥約定，四月廿六日，與蕭道應在火炎山伯公坑會報。當天一大早，我和簡國賢、廖承福就到那裡。但是，從九點等到十二點，都等不到人；之後，我們到離那地點約八百公尺的



地方等，一直到傍晚，還是等不到人。第二天，同樣再去等，也等不到人。簡國賢說：「違反原則了，蕭先生一定出事了。」果不其然，後來證實，他們已在廿五日凌晨被捕了。但是，賴阿煥並沒被抓去，成了漏網之魚。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五點多鐘，我在大安溪南岸向西約五百多公尺的地點被圍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廖成福（十三份人）和莊金明（苑裡人）。十二月十五日被押至苗栗，二十日解往台中，廿四日送台北，廿八日移押軍法處。

## 領導

當天，大概是黃昏五點多，我一進入牢房，赫見張志忠；張志忠走過來，把我緊緊抱住，並在我的耳邊很誠懇且隆重地輕輕說：「對不起你們！」又說：「你來這裡，一定是要你跟陳其昌（《公論報》總經理）、曾得志（台北市議員）和黃添梁（台北市商會理事長）三人作證。如果是的話，你一定要堅決否認他們要你承認的事情；他們三人被控的罪名是『資匪』和『經濟小組』。一旦組織罪名成立，必死無疑。」

談到蕭道應，張志忠跟我說：「蕭道應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唯一和敵人抵抗，劇烈格鬥並受傷流血才被捕的人；相信他，聽他的，並且將牢裡鬥爭的情形告訴他。如果敵人要你出去，你就答應吧！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只要堅持立場，還可以保護賴阿煥逃亡，出去吧！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

農曆元月九日，我被捕五十多天後出獄。元宵節，就是農曆十五日，初見蕭道應時，我很坦白地告訴蕭道應：「我是爲了保護賴阿煥而出來的，期間三個月；因爲有人供認：他是透過賴阿煥作交通，去領導林元枝一群。敵人因此認爲賴阿煥是『省委』，一定要抓到。他們一起建議敵人，運用我，一定可以抓到賴阿煥。」

在緝捕賴阿煥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張志忠信任蕭道應是有他的道理的。以我的推測，張志忠信任蕭道應的最大原因是：蕭道應是張志忠單線領導的，而蕭道應被捕後，與張志忠有關的，全部保留，毫無暴露。因爲張志忠與蕭道應工作關係的朋友全都平安，這是張志忠對蕭信任有加的重大原因。

### 感言

蕭先生出身屏東佳冬第一戶大地主，但他不但放棄私利，參加抗日戰爭，後來又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蕭先生的思想堅決，沒有變，但他冒「變節」的罪名，與敵人鬥爭，暗中營救獄內的朋友，忍辱負重，作「雙面人」，「苟且偷生」。他的一生是苦命的人生！他說，他是悲劇時代出生的悲劇演員。他的偉大就是至死都不說出他和張志忠之間的工作關係。

他不但是我共患難的同志，也是我至死不渝的戰友。我將永遠懷念他。



##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

敬悼台灣愛國主義前輩蕭道應先生

王曉波

### 心情鬱卒 不願與人來往

我知道「蕭道應」的名字，當是一九八〇年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期間，我第一次有機會到美國，盡量蒐集台灣戒嚴時期在島內禁絕的台胞抗日史、光復前後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資料。在哈佛期間認識了波士頓學院的潘毓剛教授，他和丘念台之間有親戚的關係，他告訴我回台灣後，可以去調查局當法醫的蕭道應。他只告訴我，蕭道應以前是政治犯，現在不太願意與人接觸，找他也要小心引起特務的注意，別的，毓剛兄就沒多說。

當時研究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還是禁忌，我自己又是禁忌中人，總不能到調查局去找蕭道應，說是要找他請教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到處打聽，也不得要領。

後來，綠島的老政治犯在八〇年代陸續回到社會，我認識了蔣碧玉，她是蔣渭水的義女，參加過丘念台抗戰時期領導的廣東東區服務隊，光復後，丈夫在白色恐怖被槍斃，自己也坐了十幾年牢出來，我們還請她到「台灣史研究會」作過報告。

認識蔣碧玉之後，聽她說才知道，抗戰時期，她們基於抗日愛國的青年熱忱，曾夥同她丈夫鍾浩東、蕭道應、黃素真夫婦，還有李南峰共五人，從台灣到祖國大陸，再從日軍佔領的淪陷區，經過交戰區奔赴祖國參加抗戰；並且，在交戰區的前線遭國軍逮捕，誤認他們是日軍派遣的間諜而扣押，差一點被槍斃。還好丘念台來到他們關押的地方，聽說他們是台灣人，丘念台和他們交談後，確認他們是投奔祖國參加抗戰的愛國台灣青年，丘念台作保，才把她們釋放出來。光復後，回到台灣，鍾浩東任基隆中學校長，因《光明日報》案被捕犧牲，蕭道應夫婦和李南峰也分別因案在「白色恐怖」時被捕。

我終於找到了蕭道應的線索，立刻請蔣碧玉引見蕭老。當時我正在從事一些抗日台籍前輩的口述歷史，我希望能作蕭老的口述紀錄；但蔣碧玉說，蕭道應一向不願意見陌生人，經蔣碧玉聯絡之後，蕭老還是拒絕見我，更拒絕作口述歷史。

後來又從一些老政治犯口裡聽說，蕭老參加東區服務隊，時值國共合作抗戰，即與中共人員有過接觸，光復後回台，擔任過台大醫學院講師，目睹國民黨的腐敗及二二八事件，而反對國民黨，終於被捕，被捕後辦了「自新」，沒坐牢，被派到調查局當法醫，心情鬱卒，不願與人來往，經常酗酒藉以發洩苦悶。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許多白色恐怖的老政治犯紛紛前往大陸訪問，一睹自己夢中的祖國，尤其是一些日據時期就到過大陸的老政治犯。

記得，應該是九〇年代初期，蔣碧玉打電話邀我，說蕭老請朋友吃飯，邀我一

起去。記得那天在蕭老嘉興街的家裡，在座有王津平、蔣碧玉外，還有一些老政治犯，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蕭老。

## 祖國革命 台灣人都沒有缺席

席間，蕭老暢談他遊大陸的觀感，非常興奮，時「六四事件」發生不久，我也提出大陸還存在著一些困難，蕭老還頗不以為意，認為我只是「書生之見」。另外，還談到兩岸統一的問題，也談到「中國統一聯盟」的問題，蕭老則至為急切。

研究光復前後的台灣史，台胞對祖國愛國主義的觀念有幾重轉折。在異族統治下，台胞愛國主義對祖國的認同是無條件的；經過二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各種意識型態紛陳，但《台灣警察沿革志》卻一語指出：「在觀察台灣社會運動時，民族意識問題實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林獻堂也說：「應知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從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來考察近現代台灣愛國主義歷史，就可以理解，二〇年代，中國還在貧窮、落後、軍閥割據、分崩離析之際，竟然有大批的台灣青年排除萬難前往祖國大陸留學，甚至參加祖國革命。

從一八九七年陳少白來台，楊心如等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起；一九一〇年翁俊明等又在台秘密成立同盟會分會；一九一一年台胞羅福星、許贊元參加「三二九之役」；孫中山北伐時任命霧峰林祖密任閩南軍司令；一九二八年苗栗人蔡智堪智盜

《田中奏摺》。抗戰期間，亦有台灣義勇隊的李友邦，國際研究所的李萬居、謝南光，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還有各種台灣人團體投入祖國戰場，參加祖國抗戰，連最艱苦的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和抗戰時期的新四軍，台灣人都沒有缺席。

在島內的台胞，據《台灣警察沿革志》的調查有兩派，而這兩派乃是「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爲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侍此一時期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時常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爲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爲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爲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爲主。林獻堂、林幼春以下其他幹部的旗幟雖然不很鮮明，但是大勢似有逐漸傾向後者的趨勢。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爲紛紜不一致，有夢想著本島獨立復歸支那的，也有抱持主義的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組織，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的羈絆，這一點都是相同的。」

## 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

當時的中國可不是擁有東風三十一號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南水北調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高速公路二萬公里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西部大開發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八年將辦奧運會，一○年將辦世博會的中國。當時的中國是任人侮辱、任人蹂躪、滿身梅毒大瘡的祖國母親，但台灣同胞並沒有嫌棄這梅毒大瘡的母親，而決然的奔赴母親的懷抱，那是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啊！

基於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蕭老等五位青年，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最高漲的一九四○年，離開台灣奔赴祖國參加抗戰，這是何等的情懷，又是何等的勇氣。

經過八年抗戰，終於台灣光復，蕭老等當是衣錦榮歸，但不幸的是，同胞歡欣鼓舞所歡迎的祖國，竟是祖國人民要推翻的政權。一九四七年，光復不到二年，台灣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這些奔赴祖國戰場，為光復台灣出生入死而「衣錦榮歸」（？）的台灣志士，面對台灣父老又情何以堪？

擺在這些台灣志士的面前只有三條路，一是繼續與國民黨同流合汙，以「半山」的特殊身分攫取榮華富貴；二是明哲保身，自我邊緣化，也不扶同為惡；三是參加一場新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革命鬥爭。從歷史來看，我們看到有自我邊緣化的丘念台；有辭去《台灣新生報》社長而創辦《公論報》批評時政的李萬居、陳其昌；也有選擇第三條路繼續革命鬥爭的李友邦、林正亨、吳思漢等。



「二二八事件」後，台胞對「白色祖國」從興奮的沸點跌向失望的冰點，不再願意當日本殖民統治「清國奴」的台灣同胞，只好轉而寄希望於正在革命鬥爭中誕生的「紅色祖國」。國民黨對台胞愛國主義的答覆則是「寧可錯殺千人，決不放过一人」的「白色恐怖」，所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才有那麼多的台胞被殺害被關押。

因此，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監獄裡，為死刑犯同志送別的輓歌會是〈歌頌祖國〉和〈安息歌〉。〈安息歌〉的歌詞一開始則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不要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前進，……」那是一個鐵與血煎熬的時代，那是一個光明與黑暗是非分明的時代。

## 一個摔破了再燒過的花瓶

根據李敖「盜版」的《安全局機密文件》，關於蕭老的記述如下：

「蕭道應於抗戰時期在廣東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東區服務隊任隊員時，曾接受左傾思想之教育。三十四年夏，匪黨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聯繫。至抗戰勝利後失卻聯繫，三十五年冬復與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紹張匪志忠。三十六年冬由張匪志忠介紹參加匪黨，接受張匪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研究工作。至三十七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三十八年冬，因潮州中學教員劉匪特偵被捕，蕭道應為恐牽連，乃開始逃亡，投奔黃匪培奕及匪首老洪請求收容。三十九年

六月至苗栗縣苑里、後龍各鄉鎮，幫助林匪元技開闢中部地區工作。四十年，負責開闢南部地區工作。四十一年元月，由南部「撤回」中部參加匪黨省級「幹部會議」，協助老洪策劃全地區活動。」

裴可權在《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記實》一書中，記述了調查局幹員逮捕逃亡在山裡的蕭老，記述如下：

「三時三十分，第一、二、三號行動員循序根據預定的計畫到洞口，魚貫入洞，蕭某發現後，尋槍不著，就拚命向第一號行動員猛撲，開始肉搏。這時第二號行動員也已進洞，將兩個共黨群眾予以制伏上銬。接著第三、四號行動員陸續進洞，幫助第一號與蕭某搏鬥。因洞小且狹，不能起立，跪著碰撞跌打，簡直無進退迴旋的空隙，足足肉搏咬打了四十分鐘，始將蕭某制服捆於洞內。這時天已微明，仍按照預定計畫，分派三位工作同志輪流放哨及看人犯，其餘在洞內休息，內線則趁破曉附近農民尚未起身以前出發至大安溪，候接其黨要會的到來。」

以上記述與蕭夫人黃素貞女士最近寫的《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未刊本）大致相符。

我在蕭老家裡餐會後不幾天，一個清晨，蕭老竟親自到我新店家來看我，一九九七年我出版的《台灣抗日五十年》一書的自序，以《一個破花瓶的故事》為題記述了蕭老來訪的這段經過——「被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譽為比他更優秀的台大醫學院同學蕭道應，抗戰期間夥同同志五人，千辛萬苦潛返祖國參加丘念台領導的廣東

游擊隊。光復後返台，五個人全被『白色恐怖』，蕭老因坦白而任調查局法醫，公餘以酗酒燒陶度日。有次，蕭老請朋友到家吃飯，我也去了，因而認識蕭老。不久後一個清晨，蕭老提了幾斤牛肉來送我，並抱來兩個花瓶，是他自己做的，一個完好，一個是摔破了再燒過的。蕭老特別拿著那個破花瓶給我，跟我說『這個花瓶就好比我們的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合在一起，我老了，沒有用了，把這個花瓶交給你。』我含著淚莊嚴的接下了蕭老的花瓶，也接下了台胞抗日一代對祖國的期望和責任。」

### 一個台灣愛國主義的靈魂

當時，我曾再度要求他能作口述歷史，也再度遭他拒絕，後來，有一些紀念抗日的活動和座談會，我多次透過人邀請他，也都遭到他拒絕。他只跟我說，他被捕時已是最後一個，沒有人因他被捕而被捕。從安全局的檔案也可知，他們全案，因郭乾輝主持而「法外開恩」，全部准予「自新」，無一人處刑。

自從接下了蕭老的破花瓶之後，我的工作更加忙碌，一直在和李登輝的「皇民化」鬥爭，又是司馬遼太郎，又是《認識台灣》歷史國中教科書，又是「台灣光復節」變成「終戰紀念日」，又是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也一直抽不出時間特別去向蕭老問候。

今年九月下旬，聞蕭老病危，我還跟王津平兄說，我們得去看蕭老了。沒幾

天，九月二十九日一早，內人元元把《聯合報》遞給我，說蕭老過世了，報頭下一則訃聞云：

「蕭公諱道應，慟於公元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辭世，享年八十七歲。遺囑火化。緬懷先公畢生濟世救人，熱愛祖國貢獻心力，追求國家富強統一堅貞不移。謹瞻於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日下午二時在台大醫院景福會館舉行追思會，謹此奉達諸親友。」

讀完訃聞，我久久不能言語，在淚眼中，我看到了一個台灣愛國主義的靈魂，被扭曲的歷史所煎熬，他為愛國而奮鬥，他為愛國而躓仆，他為愛國而屈辱。

安息吧，蕭老，不要再為祖國擔憂，我會永遠保存您的那個破花瓶，永遠記得您說的「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合在一起」。您不是也看到了嗎？一個富強統一的中國即將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矗立，以後的祖國，將永遠不會再讓我們這些亞細亞的孤兒再受煎熬，再受屈辱了。您是台灣人民的兒子，您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您一生的奮鬥、煎熬和屈辱，也是近代台灣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奮鬥、煎熬和屈辱。

安息吧，蕭老，祖國統一實現的那一天，我一定會到您的靈前祭告，好好的和您痛飲乾杯，但不要再酗酒了。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台大哲學系



## 蕭阿伯，您慢走

石正人

蕭阿伯：

九月二十二日，和爸爸及二哥到三總去看您。您躺在病床上，雖然已經意識不清了，但是手依然那麼堅強有力的握著我。從中，我感受到您從那邊傳出的關懷與期盼。後來，我用力把您的手扳開，希望您不要太使力，好好休息，把病養好，下次再來一起喝酒。

沒想到，就這樣永別了！早知道，我不會那樣讓您輕易的離開。阿伯，我知道，您還有很多未完成的心願要做，我們還相約每年到長城走一遭，怎麼您就這樣先走了。

還記得去年四月十日，您邀我一起到大陸走一走，前後共聚了九天。記憶中，那是和您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我們走遍了大江南北，每到一個地方，您總不斷的告訴我，以前這裡有多破亂，現在已經進步很多了。我們見過很多的人，您總在回到住處後，不厭其煩的分析每個人的個性和背景給我聽。我驚訝的發現，平常嚴肅的您，原來是那樣的健談。

我們一起去爬中山陵，到了最上層，你臉色不好，難過得手俯著胸口告訴我：「我的心臟不好，如果有什麼不測，就地把我的火化，把骨灰灑在祖國的土地上。」

當時，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從此寸步不離的跟著您，也讓我更貼近您的世界。從此以後，我視您如父。不管從那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您就像是我的父親。

您和家父簡直就像是同一個人，活在不同的身軀中。您們有共同的想法和遭遇；您們做人和作事的態度，也都一模一樣。常常您們會疾言厲色的對待家人，雖然我不曉得您們爲什麼要用那樣的方法，來表達愛和關懷，但是，仍能從中感受到那份濃稠得攪不動的親情。這一點，我想我們兩家的人，都有很深刻的體認。

您曾說：「我出生在一個悲劇的時代，更悲哀的是，我是悲劇中主要的演員。」我曾經在想，如果沒有日本據台，如果沒有國共內戰，如果沒有：，您的人生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

退休後，您有較多的空閒，常來實驗室看我。每次來，您都會帶著大大小小的三角錐瓶，來做蘭花的組織培養。看著您在無菌房，坐在無菌操作檯前，用熟練的手法，進行蘭花的組織培養。常常一作就是一個上午，過了午餐時間也不休息。

我站在玻璃門外，望著您佝僂的身影，也不敢打斷您的工作。剎時，我看到一個傑出科學家的身影。造化弄人，硬把一個傑出科學家，逼上政治那條不歸路。我相信，如果不是出生在那個時代，您一定是個傑出的科學家。

聽著您訴說從前，我才知道您的一生過的相當坎坷。小時候在日本統治下求學，被迫唱日本歌，但是您卻在心中咒罵；日本人箝制您的外表，卻侵犯不了您的精神。您出生在望族家庭，卻有眾生平等的平民思想；富裕的環境，腐朽不了您悲

天憫人的胸懷。長大後，滿懷熱血到祖國參加抗戰，卻被當作日本間諜逮捕，準備處死；兇險的環境，撼動不了您堅定的民族意識。白色恐怖時期，爲了掩護同志，苟且偷生，卻換來滿懷愧疚；身爲醫生的您，告訴我，從此以後您就沒刷過牙了。此後，您自我封鎖在嘉興街家中，借酒燒愁。

阿伯，您的一生，是苦難的縮影。您以個人之軀，扛起國家民族的災難。我知道，您的心願未了，但是，終有一天，您的心願終將得償。安息吧！阿伯！您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晚 正人 叩泣 二〇〇二、十二、二十六





# 紀念道應伯父——冬天的追懷

羅允宏

寒風起兮 落葉繽紛 冬天已降臨

浮雲飛兮 故人離去 思懷常記憶

雁兒呀 牠也南飛 請你寄上我心意

告訴他 舊懷依昔 就像翠竹長青

常回憶 道不盡 但願流芳千古長安息

謹以一首〈冬戀〉曲的聯想，來追懷我對道應伯父的思念。在這冥辰一百日追思紀念的今天，藉此表達我對他一生的尊敬和追悼之意。願他安息長眠在他從小生長可愛和懷念的故鄉——佳冬。並默祝他在天之靈，保佑他的子子孫孫，平平安安，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道應伯父受人尊敬的風範，和早年在日本統治時代，以自己生為中國人，熱愛祖國的赤忱熱血，參加抗戰犧牲奉獻的氣節，總是令我欽佩不已。

記得年小時候，民國四十年初，一個嚴寒的深夜，家父在一次憲警人員緝捕中，從鄰舍豬欄高牆倉皇的逃脫，同鄉阿順伯、團麟伯則遭到逮捕，不幸被槍決了。民國四十至四十一年初，在南部附近山區、蔗園、草寮逃亡藏匿期間，家父與

道應伯父及道應伯母有一段共同極度危險逃難的日子。後來，道應伯父母二人一同北上苗栗、桃園及北縣山區繼續逃難，道應伯的養父信棟伯公爲此則被逮捕拘押在新店軍方監獄四年餘的時間（民國四十二至四十六年），罪名是藏匿逃犯。這是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的時代，社會上同時有著許多類似的不幸和更悲慘遭遇的人。

在年少的日子裏，家母偶而提起道應伯與家父的深厚交情。當時家父在四十年初至四十三年九月逃亡以至遭到軍法監獄拘押的苦難期間，在我幼小的心裏便對道應伯產生一種崇敬的心理。長大以後也有更多的了解，真的，道應伯實在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一位真正的勇敢者和愛國者，他有不平凡的一生。

道應伯係民國五年一月一日出生在屏東縣佳冬鄉客家庄溝堵路一號蕭厝大宅院，占地一、二〇〇坪，中國古代古色古香的古式五合院建築，甚爲美觀，爲台灣光復前南部顯赫家族之一。道應伯從小獨立特強，具有不屈不撓之性格。自幼天資聰穎，初中考入高雄中學，高中則考取台北高等學校（當時台灣最有名的高中），大學更考取台灣日本帝國大學（現台大）醫學部，並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從青少年以至青年時期，於他潛意識裏就充滿抵抗日本統治的思想，喜歡穿唐裝，不喜歡說日本話，認爲自己身爲中國人卻被日本統治感到屈辱。

在強烈的愛國心驅使下，當時正值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全國一致對日抗戰，風起雲湧，民國二十七年他便秘密參加了北京語訓練，這時教他國語文的老師正是道應伯母（黃素貞女士）。民國二十八年即以實際行動籌組了志同道合的五位

同志（包含民國三十八年底遭槍決的鍾皓東先生及其夫人蔣碧玉女士——抗日名人蔣渭水的女兒），先搭船進入上海，再到香港，潛入廣東淡水附近。可惜人生地不熟，反而途中被當成了日本從台灣派去的間諜，遭到了俘擄，情況甚為淒慘。後來幸得丘念台先生之相救，否則就被槍殺了。

到了民國二十九年，經過半年以上苦難的俘虜日子，總算被釋放，到達曲江（廣東臨時省會）實地參加了抗戰醫療工作。民國三十年八月份更被派往惠陽等地前線參加民運及醫療工作，並創辦中小學，每天救助許多病患及教育貧窮民眾。如此艱辛的抗戰生活一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更在廣州附近叫花地的地方，接管了日本投降後的台灣軍伕（台灣人被征召侵略中國者）三、四千人，為他們施予國語教育再遣送回台灣。道應伯至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以後，才順利回到台灣自己的故鄉。這是道應伯父和伯母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其間還有許多悲慘的事蹟，道應伯都親口片斷地告訴過我，我亦為之動容。

道應伯是一生生活簡樸的人，他每天總是嚴肅認真不停地工作。早期開設診所為民眾醫療，長期以來同時在法醫鑑定方面，更提供權威性的判斷，有崇高聲譽。其次子開平博士，承繼衣鉢，更為當前國內著名法醫專家。道應伯優良的家風遺傳，有如家中磐石，穩固可靠。同樣影響造就了其他子女及孫輩在社會上的成就和發展。道應伯今天雖然離開了我們，亦無所遺憾了。

世侄羅允宏 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追思



# 蕭道應先生大事年表

藍博洲 撰

- 一七八六 清乾隆五十一年，蕭家來台祖蕭達梅（一七六八—一八三六），從祖地廣東梅縣來台經商。
- 一八〇一 來台二世祖蕭清華出生。曾經襄助當時駐紮大響營的李洸將軍撫蕃及開拓恆春、車城和枋山等地，聞名於世；並於台南再娶閩南（福佬）人楊氏。
- 一八三六 蕭達梅逝。
- 一八四一 三世祖蕭光明生於台南府，早在青少年時期便隨母舅從商，經常往返佳冬、台南之間；其後在台南開設店號「蕭協興」，經營米穀生意，獲利甚豐；因而有「府城外甥」之美譽。此外，他又結交總兵劉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光緒皇帝曾賜軍功五品。
- 一八七二 蕭清華逝。
- 一八八七 蕭道應的父親蕭然照出生，為祖父蕭升祥的次男。
- 一八九五 十月十一日，日軍第二師團一萬八千人於枋寮登陸，隨即以其精銳之第四聯隊第三中隊進逼六根庄（今佳冬、六根兩村）。左堆（今佳冬、新埤）總理蕭光明坐鎮「步月樓」，堅決抵抗。結果，蕭光明次子蕭升祥（即蕭

道應之祖父）和三子蕭月祥，不幸壯烈犧牲。蕭光明先是與左堆副理張阿庚隱匿新埤張家水涵內一個月之久，然後再由孫兒蕭信棟等人陪同，潛往廣東原鄉梅縣避難。

一八九九

蕭光明返回佳冬，經營釀酒和染布事業。

一九〇一

二月十二日，蕭道應的母親吳氏悅生於台南市。

一九〇九

地方制度改設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阿猴、台東、花蓮港、澎湖十二廳。

一九一一

蕭光明逝。

一九一二

六月廿七日，蕭道應的父親結婚。

一九一五

「西來庵事件」大屠殺，台灣人民武裝抗日的運動從此告一段落。

一九一六

蕭道應，字濟寰，生於日據下阿猴廳港東中里茄苳腳蕭家。

一九一七

十一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十一月十日，黃素貞生。

一九一八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九一九

五四運動。

一九二〇

地方制度改設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二廳（台東、花蓮港），下設三市、四十七郡、一五五街庄。阿猴廳港東中里茄苳腳改稱

高雄州東港郡佳冬庄。

一九二二 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十月十七日，台灣進步的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文化啓蒙運動。

一九二二 台灣總督府公佈《台灣新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台共學」制。四月，「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創設，為大學預備教育機關，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七月，日本共產黨成立。

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成立。

一九二三 二月十日，蕭道應的父親蕭然照逝世。

「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設高等科，分文、理兩類，修業年限三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

一九二六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

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正式於古亭町校舍（今和平東路師大）上課。

一九二七 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左派取得領導權。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

七月，舊文協幹部蔣渭水等另外成立民眾黨。



- 一九二八 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 四月三十日，台北帝國大學創立，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
- 一九二九 二月，農民組合被檢舉。
- 十月，紐約股票市場混亂，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結束，世界經濟恐慌開始。
- 十月十七日，民眾黨第三次大會，開始向左轉。
- 一九三〇 八月，台北高等學校讀書會事件。
- 十月，台灣赤色總工會成立。霧社事件。
- 一九三一 八月五日，蔣渭水逝世。
- 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柳條溝事變，侵占東三省。
- 十一月廿七日，中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
- 一九三二 一月廿八日，上海事變。
- 三月一日，日本扶持滿洲國成立。
- 農組大湖、永和山支部客家農民武裝抗日事件。
- 蕭道應畢業於高雄中學校，考入台北高等學校第九屆高等科理類。
- 一九三六 一月一日，台北帝國大學增設醫學部。

一九三七

三月十日，蕭道應畢業於台北高校理乙科。四月，又與高校同學許強、邱林淵（李辰）等，一起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

四月一日，台灣總督府禁止漢文報紙、雜誌。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開始。

八月十五日，台灣進入戰時體制。

八月十九日，黃素貞一家搭乘盛京丸，由福州滬尾回到台灣；擔任蕭道應和鍾和鳴（浩東）等客籍高校學生的北京語老師；蕭道應和鍾和鳴等人籌組「醫療服務團」，回國抗戰。

十一月十二日，日軍佔領上海。

一九三八

五月一日，台灣當局對外公開發生於兩年前的台北二中學生的「思漢反日事件」。五月，蕭道應的母親吳氏悅逝世。

九月十六日，台灣當局簡化台民赴大陸旅行護照手續。

十月十一日，日軍在廣東惠陽縣淡水鎮澳頭登陸；廿一日，佔領廣州。廿七日，佔領武漢。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十月二十日夜間，廣州棄守前夕，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命丘念台籌組「東區服務隊」，擔任惠、潮、梅屬廿五縣的民眾組訓工作。

一九三九

一月，國民黨第五屆五中全會制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撤

起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四月，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在韶關成立，以張發奎爲司令長官；丘念台取得張發奎同意，將「東區服務隊」歸屬第四戰區，前往潮汕前線，協助駐紮當地的獨立第九旅旅長華振中做青年組訓和民衆工作。

春天，台灣廣播電台招考對華廣播的北京語廣播員，管區警察強迫黃素貞報考；蕭道應建議黃素貞以「結婚」之由推辭。

五月二日，蕭道應搬去與黃素貞一家同住。其後，兩人便正式結婚。

元月，蕭道應與黃素貞正式結婚。鍾和鳴與新婚妻子蔣碧玉及表弟李南鋒，三人先行奔赴上海探路。

春節前後，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逮捕「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淡水成立）博羅隊全體隊員。

二月，「東區服務隊」轉移惠陽；後駐博羅縣福田鄉荔枝墩一帶，展開群眾工作。

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台。

四月，蕭道應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台北帝大醫學部。

五月廿一日，「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惠州團部被封閉，十多名隊員被捕。

七月，蕭道應與妻子黃素貞前往上海，輾轉與鍾和鳴等人在九龍會合，然

後搭乘廣九鐵路線火車，進入廣東；一路北上，向東江流域的惠陽前進。然後以「日諜嫌疑」被第四戰區十二集團軍所屬「惠淡指揮所」營部扣押一個多月，再押解桂林軍事委員會。

十二月初，蕭道應等五人在韶關搭乘粵桂鐵路線火車，經由長沙，抵達桂林。

### 一九四二

一月六日，皖南事變爆發。  
農曆年前，蕭道應等五人從桂林回到韶關，等待分發工作。結果，鍾和鳴與李南鋒被派到韶關民運工作隊受訓，從事民運。蕭道應、黃素貞夫婦和蔣碧玉則一同分發到南雄陸軍總醫院服務。

農曆年（一月廿七日）後，蔣碧玉與黃素貞先後產下一子。

六月廿二日，德軍侵略蘇聯。

九月，黃素貞與蔣碧玉送子後，五人前往位於羅浮山山腳的「東區服務隊」駐紮地——博羅縣徐福田。丘念台先生改黃素貞為「黃怡珍」。

十二月七日，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對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 一九四二

五月，王素貞產下一女——惠區。

### 一九四三

四月，為適應抗戰新形勢的需要，「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改組為正式黨部，並改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

在福建漳州正式成立，由台南人翁俊明出任主任委員，丘念台、謝東閔等人擔任執行委員；從此展開策進收復台灣失土的工作。

八月廿三日，丘念台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建請恢復台灣省制及設立台灣省黨部。

十一月十八日，翁俊明被謀害，國民黨中央派書記長林忠兼代主委。

十一月廿六日，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確定「台灣在戰後回復祖國地位」。

十二月二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正式成立，接受中共領導。

#### 一九四四

一月廿七日，林忠請辭「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本兼代各職；國民黨中央改派蕭道應、鍾浩東及李南鋒三位台籍男隊員，由廣東惠州步行前往

福建永安述職，並在三月九日前平安抵達。

#### 一九四五

一月十五日，日軍發動攻勢，打通粵漢路南段，廣東幾乎已成全面淪陷之局面。中共「東江縱隊」派隊挺進各新淪陷區，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因此，部隊迅速擴大，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推行減租減息運動，並先後建立江北解放區、粵北解放區及海陸惠邊解放區。

六月十七日，原台灣民眾黨黨員劉雪漁，以及施碧辰、張旺、周耀旋、許

省五等東江縱隊所屬「台灣解放同志會」會員和台籍俘虜陳森煌等十餘名，在廣州羅浮山正式成立「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

夏，中共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道應聯繫。

八月十五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宣佈日本天皇的「終戰的詔敕」。

八月，中共中央派台籍幹部蔡孝乾（彰化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八月十六日，在台「主戰派」日軍煽動台灣士紳林熊祥、辜振甫、許丙等卅餘人，參加「台灣獨立」計劃；安藤總督警告毋輕舉妄動。

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目前的時局宣言》，主張迴避內戰，建立聯合政府。

八月三十日，蔣、毛重慶會談（十、十）。

八月卅一日，林獻堂、許丙、辜振甫抵上海歡迎陳儀。

九月一日，國府公布《台灣省行政長官組織大綱》，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

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

九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在花地成立，丘念台任命蕭道應為集訓總隊的中校政訓主任，黃素貞為少校教官兼女子

大隊副大隊長。

十月一日，蔣、毛會談決定召集政協會議。

十月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在台北成立。

十月十日，蔣、毛會談紀要（雙十紀要）發表，內戰暫時迴避。

十月十七日，第七〇軍及部份公署官員，分乘四十餘艘美艦從基隆上陸，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十月廿四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抵台。第二梯次國軍分乘廿七艘艦艇抵達基隆。

十月廿五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進指揮所廢除。台灣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台灣民眾盛大慶祝台灣復歸祖國。

十一月十一日，國民黨台灣省黨部開始辦公。

十一月十三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禁止各地的團隊組織

十一月廿日，警備總司令部通告暫時禁止法幣流通。

十二月，蔡孝乾間道潛行三個月，始抵江蘇淮安，向中共「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

十二月三日，台北市食糧不足，開始米的配給。

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受理中國大陸的郵便。

十二月廿五日，台灣省行政區域改爲：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澎湖八縣，舊制的郡爲區，街爲鎮，庄爲鄉，州廳爲縣政府，郡役所爲區署，街庄役場爲鎮鄉公所，下設村、里、鄰各辦公處。

### 一九四六

一月十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三十一日閉幕）。

一月十五日，救濟分署署長錢宗起南部視察談話指出，恆春一帶米不足，貧民以檳榔葉充飢。台灣省漢奸總檢舉章程公布。

一月廿二日，台北市民千餘人抗議物價暴漲。

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嘉義新港人）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

三月初，丘念台由上海搭機抵台。

三月廿二日，台大醫學院職員要求正式發給證書而發動罷診。

三月廿五日，台大第一和第二附屬醫院呼應罷診。

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

五月，黃素貞帶領大女兒惠區與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兩百名女護士，先行返台，並回到屏東佳冬蕭道應老家，待產。

五月廿三日，台銀發行壹元、伍元和拾元新券。各學校教職員的月薪遲發。



六月十二日，澎湖飢饉，貧民食草。

六月十七日，鼠疫流行。

六月十九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布《戶口移動規則》。

六月廿六日，蔣介石發動對中共解放區的全面進攻，中國全面內戰爆發。

六月，黃素貞再得一女——佳區。蕭道應到汕頭辦完事後，也回到台灣，並經杜聰明老師推薦，任教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系。

七月十二日，南部霍亂流行，三百多人死亡。

七月，蔡孝乾潛台，領導組織，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任書記，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

八月二日，長官公署許可台灣劃為八個食糧區，區內准食糧移動販賣。

八月十七日，台北地區霍亂流行。

八月二十日，台灣開始與內地通匯，台幣對國幣（即法幣）為一：四〇。

八月廿七日，「台灣省光復致敬團」林獻堂、丘念台等十二人，飛滬轉京，晉謁蔣介石。八月，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黃素貞前往任教國語文。

十一月四日，中共聲明不參加國民大會。

十一月七日，台省國大代表飛滬晉京，參加國民大會。

十一月十三日，台北市霍亂流行。

十二月二十日，台北學生冒雨集會，抗議日本東京澀谷事件裁判不當，要求陳儀代表國府，促進對日交涉。

十二月廿四日，北京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

冬，蕭道應復與廣東東江縱隊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志忠。

### 一九四七

一月一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

一月二日，針對美軍強姦北大女生事件，大陸各大學展開反美運動。行政院禁止反美。

一月九日，台北學生團體反美示威遊行，抗議北京女學生強姦事件。

一月十四日，金價和物價暴漲。

一月十六日，屏東、嘉義各地天花蔓延。

一月廿九日，米價暴漲，一日數回。

二月四日，米價下跌，然而金、布類、美金卻大幅上升。

二月七日，省當局通令全省：嚴厲管制糧食售價，糧戶糧商存糧定期限價出售，如有違反，依治罪條例處罰。

二月八日，電費上漲一倍。

二月十一日，台北市金價、米價持續上漲，其它物價也受影響而上漲。

二月十三日，台北市民示威，要求解決米荒。

二月十七日，台北市開始實施食米配給。

二月廿六日，台大法學院學生連吃十多天蕃薯，體力不支，紛紛返家。

二月廿七日，晚上七點左右，台北市專賣分局緝私隊查緝員六人，在延平北路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煙時，與女煙販林江邁發生爭執，並以槍筒毆擊林江邁頭部，流血倒地，引起圍觀民眾公憤而反擊；民眾陳文溪遭查緝員誤射死亡。

二月廿八日，台北市民不滿香煙緝私案，集結行動；民眾聚集長官公署廣場時遭機關槍掃射，當場六人死亡，多人受傷。警備司令部發布台北市區臨時戒嚴令。事件發生後，蕭道應雖然時發瘧疾，還是跑出去幫忙救人、抬屍。

三月一日，行政長官陳儀宣布解除台北市區戒嚴令。

三月二日，台中民眾召開「市民大會」，推舉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後，民眾包圍警察局，收繳警察武裝，謝雪紅以警察武裝，編成一支「學生起義軍」，宣布「人民政府」成立。嘉義民眾全數繳下警察武裝，佔領市政府。

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

三月四日，台北市的暴動發展為全省性的抗爭。

三月五日，張志忠將嘉義地區起義民眾組成「台灣民主聯軍」，進攻嘉義飛機場，佔領水源地與發電廠。張志忠左右手之一的斗六眼科醫師陳纂地，糾集舊軍人、學生和青年等組織「斗六警備隊」，攻擊虎尾機場。

三月六日，謝雪紅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成立「二七部隊」。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行政長官陳儀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三月八日，行政長官陳儀拒絕接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要求。

三月九日，國民政府軍第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開始鎮壓。警備總司令部再度宣布台北市戒嚴。

三月十四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

三月十七日，台北市的戒嚴令擴大在全省各地實施。

四月廿二日，行政院決議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訂《省政府組織法》；決定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

五月五日，丘念台堅辭民政廳長。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爲警備司令部，彭孟緝爲司令。

五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成立，宣告清鄉工作已經完成。

五月十八日，警備司令部公布：全省解除戒嚴，暫停郵電檢查。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七七宣言》，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施土地改革。

七月九日，國民政府決定解散政治協商會議。

七月廿三日，李翼中辭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命丘念台繼任，但丘念台堅決不就任。

七月廿五日，警備司令部公布《社會秩序安寧維持辦法》。

八月廿六日，丘念台就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並任前東服隊隊員王致遠爲秘書。蕭道應介紹王詩琅到台灣省黨部任職。

九月，黃素貞離開基隆中學，轉到北一女任庶務主任。

十月七日，省政府依據中央所頒《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令本省境內共產黨員於本月底前登記，逾期依法究辦。

十月廿五日，《公論報》創刊，李萬居任社長；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黃培奕、石聰金、賴阿煥等在報社任職。台灣省第二屆運動會在台中舉行。

，台中市內及運動會場突然出現大量未署名的宣傳品，內容除了介紹人民解放軍六十七條時局口號之外，並附解放戰爭形勢圖，一般認為這是共產黨散發的。

十一月十二日，謝雪紅等二二八流亡者於香港組成「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冬，蕭道應由張志忠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接受張志忠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調查研究工作。

十二月底，黃素貞生下三女北區。

年底，蕭道應在鶯歌黃培奕家，將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隊員黃培奕和石聰金介紹給張志忠。一九四八二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發行《光明報》。

二月十八日，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被刺殺死亡。

「二二八」一週年前夕，張志忠指派蕭道應第一個任務——組織石聰金和黃培奕，在鶯歌、山仔腳間鐵路沿線，書寫紀念二二八標語。

三月五日，全島各地出現《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正式署名。

春，蕭道應擔任「台大醫學院支部書記」。

四月廿三日，身分證總檢查實施辦法公布。

五月，中共華東局在香港秘密舉行「台灣工作幹部會議」。

## 一九四九

五月三十日，戶口（身分證）總檢查開始。

八月十九日，廢止台幣兌換法幣，改以金元券兌換。

十二月三十日，國民黨中常會任命蔣經國繼丘念台任省黨部主任委員。

年底，黃素貞轉到大同中學任教。她和蕭道應住在東門的大學宿舍，並把她父親位於中山北路國賓飯店後面的房子，讓張志忠夫婦住。

年初，歷經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

一月廿一日，蔣介石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宣佈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一月，石聰金和黃培奕同辭《公論報》的工作。黃培奕回故鄉鶯歌，石聰金到桃園十三份山區，分別開闢專為日後收留政治流亡者的基地。

二月四日，省主席陳誠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

二月十二日，警備司令部公布《軍公人員及旅客台灣省入境暫行辦法》（三月一日實施）。

四月一日，南京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與共產黨議和，希望隔江而治。南京各大專院校近萬名學生齊集總統府門前，舉行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結果，學生隊伍被鎮壓，造成「四一血案」。

四月六日凌晨，台灣當局為鎮壓三月下旬以來風起雲湧的台北學運，派出大批武裝軍警，強行闖入師範學院與台大的男生宿舍，集體逮捕兩三百名學生。一般稱作「四六事件」。

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佈：台灣全省戒嚴。

五月廿日起，台灣地區開始實施軍事戒嚴令。

五月廿四日，立法院頒布實施針對「匪諜」的《懲治叛亂條例》。

五月廿七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

前台籍官兵集訓總隊女隊員高草辭掉《公論報》的工作，然後通過蕭道應的安排，到台大醫院當護士。

六月十五日，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舊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壹元，新台幣伍元折合美金壹元，發行總定額為兩億。結果，通貨膨脹，舊幣如同廢紙。

六月二十日，蔣介石接駐日代表團來電：「盟軍總部（CHQ）對於台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台灣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建議。」

六月廿一日，《懲治叛亂條例》公布。

六月廿四日，近萬名台灣軍人派赴大陸，參加內戰。



七月二日，「三七五減租」在全省各縣市實施。

七月九日，省級公務員推行聯保制。

八月五日，美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聲明不再介入中國內戰，停止援蔣。

八月十八日起，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陸續破獲所謂「匪成功中學支部」，逮捕「成功中學畢業」的青年與台大法學院學生，並「循供」深入偵查，……擴大破案，總計先後捕獲包括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在內的所謂「匪諜及涉嫌份子四十四人」。

夏，張志忠面示北部黨組負責人陳福星：積極整頓台北縣海山區（鶯歌、樹林、三峽三個鎮），桃園縣大溪、龍潭區，新竹縣關西、新埔、竹東區，苗栗縣大湖區等地黨組，進行深入隱蔽之群眾運動，挑選積極份子，進入山區，編組小型武工隊，開展地下武裝活動，逐步擴展游擊根據地，配合解放軍攻台。

九月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彭孟緝）成立。

九月廿二日，黃素貞產下一子——繼光。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

十月二日，台北縣實施五人連保制。

十月，張志忠、陳福星進入海山區鶯歌（大溪）鎮之烏塗窟山區，建立烏

塗窟基地。

十月廿二日，蕭道應刻意邀請親朋好友吃兒子的滿月酒，然後在第二天，安排黃素貞和嬰兒，暫住汐止山上她養父母的老家。

十月三十一日，福建籍的「台灣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首先在高雄市被捕。

十一月四日，防衛司令部公布，通匪或隱匿匪諜不報、造謠惑眾、煽動軍心、破壞交通與電訊者皆處死刑。

十一月八日，潮州中學教員劉特慎被捕。（蕭道應為恐牽連，乃開始逃亡，投奔黃培奕及老洪，請求收容。）

十二月七日，因為內戰的徹底失敗，國民政府由廣州遷移台北。

十二月十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言人公開宣佈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匪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任職基隆中學的「匪諜」四名。

十二月廿三日，全省各地開始配給食米。

冬，張志忠、陳福星二人在烏塗窟附近之十三份山區，開辦第二次幹部集體學習會，蕭道應與黃培奕、林元枝、簡國賢等二十人參加，著重研究台灣山鄉地形及游擊戰術。

## 一九五〇

一月廿九日，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被捕；保密局後來又根據蔡孝乾的「

供詞」，逮捕了「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等十三人。其後，蔡孝乾在陪伴保密局特務追捕其他黨員時「乘隙脫逃」，不久再度被捕。一月，以陳福星爲首之北部黨組織，開始重整省委組織；由陳福星、黃培奕、林元枝、周慎源組織臨時領導機構於烏塗窟。

農曆年（二、一七）後，因爲外頭的風聲愈來愈緊，蕭道應搬出東門宿舍，離開台大醫學院，到汐止山上，把黃素貞和剛滿三個月大的兒子，帶到鶯歌黃培奕家。

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

三月八日，爲防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潛伏山區，實施爲期一週的山地統一檢查。

三月十日，台灣省政府通過本省戶口總檢計劃。蕭道應夫婦將六個月大的孩子送回佳冬蕭家。

三月，各地黨組繼續被破，烏塗窟、十三份山區基地成爲各地逃亡幹部之避難所；其後因林元枝所率南崁武工隊十五人，紛紛外出自首，黃培奕即率所屬武工隊由鶯歌鎮屬山區轉移三峽鎮屬山區。

四月廿六日，《懲治叛亂條例》修正案公布。

四月三十日，全省戶口總檢查。

五月十三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宣布：偵破中共台灣工委會（蔡孝乾）案，並公布《在台中共黨員自首辦法》。台大醫院醫師許強、胡鑫麟、蘇友鵬、胡寶珍被捕。

五月十六日，國府撤退舟山群島，蔣介石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五月，以老洪爲首的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到「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同月，又在台北縣樹林山區，召集黃培奕、林慶壽、王子英等幹部，組織「海山區工作委員會」。

五月卅一日晚上，正聲、台灣、空軍、軍中、民本、民聲等廣播電台，同時聯播蔡孝乾對本省同胞發表的「懺悔」演說。

六月一日，《中央日報》全文刊載蔡孝乾的廣播內容。

六月四日，《戡亂時期教育實施綱要》公布，規定中小學起實施三民主義及反共抗俄教育。

六月九日，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吳石及陸軍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全被槍決。

六月十三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公布。

六月十八日，原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依「謀叛罪」被槍決。

六月，蕭道應至苗栗縣苑裡、後龍各鄉鎮，幫助林元枝開闢中部地區工作。  
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

六月廿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台灣中立化」方針，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

六月廿八日，台北國府外交部發表聲明，原則接受美國對台防衛。蔣介石聲明要派兵參加韓戰。

八月，「海山區工作委員會」成立「資料小組」，由「區委兼宣傳教育幹事」王子英擔任「組長」，專負搜集與編製各種參考資料。

九月二日，保安司令部宣布破獲所謂「共產國際間諜」組織。

九月六日，「共產國際間諜」組織案，李朋、汪聲和等四人被槍決。

九月廿七日，有關當局發表中共地下組織成員自首及幹部洪國式、任正凱脫黨聲明。

九月廿九日，台北國府行政院制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舉報聯保連坐辦法》。

十月十四日，鍾浩東槍決。

十一月八日，中共發佈：中國人民義勇軍已於十月廿五日越過鴨綠江，開赴韓國戰場。

十一月廿二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公布省保安司令部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台地下工作組織」案。

十一月廿八日，許強和郭琇琮等醫師十四名被槍決。

年底，全省各地重整的黨組織已再具規模，「重整後台共省委組織」於是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並決定依據客觀環境的變化，調整組織策略和鬥爭方式。

## 一九五二

一月間，黃素貞匿居舅舅吳金池家二日；轉楊源盛處（潮州崙東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ㄅ）安潔字第四六六四號判決書）

二月初，蕭彩祥攜黃素貞至蕭福丁家（美濃龍肚）藏匿，共十五日。（同上判決書）

農曆正月十五日（二月廿日），蕭彩祥知政府緝捕黃（素貞）等甚緊，復將黃（素貞）帶至劉妹德家（美濃清水里），藏匿十五日。（同上判決書）

二月間，黃素貞介紹蕭彩祥入黨；三月間，曾在蕭彩祥家開會二次，蕭彩祥旋奉黃（素貞）命，擔任通訊員，經常與羅冬梨、楊源盛、劉妹德等聯絡；並藏匿黃素貞、蕭道應于自己家中（麟洛麟趾村）。（同上判決書）

二月間，北部海山區黨組織全部被摧毀，黃培奕與陳福星、曾永賢、林元枝等四人，召集全省地區幹部會議，商討重整「省委組織」。

三月下旬，蕭彩祥又將黃（素貞）引至蕭福丁處（美濃龍肚），匿居十五日。（同上判決書）

農曆二月間（三月八日至四月五日），黃（素貞）介紹楊源盛入黨，任屏東至台南方面聯絡員。（同上判決書）

二、三月間，曾恩鄰（業司機）窩藏黃素貞居住數日。（同上判決書）

三、四月間，羅冬梨通知鄭團麟，潛往佳冬上埔頭，與李丁福、蕭道應等會商。（機密文件，第二輯，二八八頁）

四月間，楊源盛將黃素貞、高草藏匿于曾恩鄰處（內埔美和村）。（同上判決書）

四月間，蕭道應、黃素貞等在蕭東應家（麟洛麟趾村）匿居，曾勸其入黨，雖被拒絕，但已允為工作。（同上判決書）

四月二十二日，前內政部調查局在竹東破獲「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竹東地區組織。

五月間，楊源盛又將黃素貞藏匿于戴寬鄰家（佳冬昌隆村）。（同上判決書）

五月十八日，王子英在雲林被捕。

六月一日，高草等十人在雲林被捕。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

部和台灣省調查處組成「特種聯合小組」，專門偵辦「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並偵悉蕭道應及黃素貞在南部潛匿住所多處，隨即指派幹員馳赴屏東緝捕。

六月四日起，楊源盛等二十人先後被捕。

六月廿八日，有關當局發表偵破「中共社會部在台地下組織」經過。

七月二十三日，「特種聯合小組」在新竹山區秘密逮捕「新竹地委」所屬幹部范新戊，並說服其作爲破壞「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內線」。

八月，蕭道應夫婦離開佳冬地區，前往苗栗地區。

八月底前，「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的殘餘幹部以及省委機構，已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到苗栗地區。

九月初，范新戊前往苗栗山區，通過勞動方式，接近「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

九月十七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張彝鼎發布《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和《檢舉匪諜獎勵辦法》。

九月廿一日，《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開始實施三個月，限十月底前辦理自首。

十一月十日，「省委」劉興炎號召「過去同路人」自首，發表告同胞書。



十一月十五日，郭維芳發表《光明在等待著你們》，呼籲「匪共份子」自首。

十一月十七日，保安司令部公布首批匿名不自首「潛台匪諜」名單；黃素貞名列其中。

十一月十九日，保安司令部公布第二批匿名不自首「潛台匪諜」名單。

十一月二十日，保安司令部公布第三批匿名不自首「潛台匪諜」名單。

十一月二十四日，《全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新生或毀滅——給潛匪最後的忠告〉。

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華、劉興炎、郭維芳、王子英、廖學信等九名等「自新」者，聯名發表致老洪的公開信，「敦促其立即省悟速率從匪來歸」。

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子英以「自首青年」名義，在各大報發表〈我們的出路並沒有被杜塞〉的「告潛匪」書。

十一月三十日，保安司令部宣布，《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截止，一共五七六人自首。

十二月七日，高草、楊源盛、蕭彩祥判處死刑；曾恩鄰、蕭東應、戴寬鄰、吳金池等各處有期徒刑十年。劉妹德、蕭福丁各交付感化。（同上判決書）

一九五二

冬，「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正式派曾永賢與范新戊恢復聯繫，一面繼續考察，一面採取慎重的單線領導方式。范新戊在「特種聯合小組」秘密協助下，在山線鐵路三義東南方面山區，開闢一個偽裝的群眾據點。

一月一日，蔣介石號召推行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四大改造。

一月七日，總政治部報告，去年底自首「匪諜」共六二九人。黎明華、劉興炎、郭維芳、王子英、廖學信等九名「自新」者，聯名宣佈「解散各級組織」，號召其他黨人「停止一切活動」。

一月底，老洪接見范新戊，並暗示將在適當時機直接領導老范，切斷一切橫的聯繫。

三月中旬，范新戊提出一年工作總結的書面報告，並替「組織」抄繕大量文件；一面把偽裝勞動中得來的工資交給老洪，補助「組織」經濟上的困難，大大提高老洪對他的信任。「特種聯合小組」隨即在「內線」活動的地區，迅速布置一個「請君入甕」的口袋。

四月二日，老洪決定將自南部撤退至苗栗地區的蕭道應夫婦交給范新戊；老范於是把黃素貞安頓在「特種聯合小組」的偽裝據點。

四月五日，石聰金和賴阿煥約定，四月廿六日，與蕭道應在火炎山伯公坑會報。

四月十日，老洪等與范新戊在三義魚籐坪會報時，將一個秘密山洞交給老

范與蕭道應使用，並決定二十六日在該山洞舉行會報，總結一年來的工作。老洪與曾永賢臨行時，囑咐蕭道應，廿五日晚至大安溪接曾永賢北上。四月十二日，「內線」老范將上述情報向「特種聯合小組」匯報。「特種聯合小組」建議「內線」老范，發動蕭道應開掘一個對緝捕行動較有利的新山洞。

四月二十二日晚，「內線」老范再向「特種聯合小組」報告，蕭道應已在離老山洞約半小時山路的另一個山頭，挖建了一個新山洞，並帶兩個群眾移住新洞。

四月二十三日，「特種聯合小組」動員二十個幹員，布置逮捕行動。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時，「特種聯合小組」冒雨展開緝捕行動。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時卅分，蕭道應與摸入洞內的「特種聯合小組」三名行動員，足足肉搏打了四十分鐘後始被制服，捆於洞內。晚上九時，曾永賢被捕，手足同時被捆，與蕭道應一同押在洞內。當晚十二時，老洪被捕。

四月二十六日凌晨，黃素貞在「偽裝據點」被捕。隨即與老洪、曾永賢和蕭道應等人，一同被押赴台北大龍峒關押。

十一月，黃素貞保外生產，廿八日，生下么兒開平。一星期後，抱著嬰孩，回到牢裡。

一九五三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調查局安排蕭道應夫婦和蔡孝乾、洪幼樵、陳福星（老洪）、曾永賢、林元枝等十五名「自首自新前共產黨員」，召開自新記者會。

十二月十六日起，《中央日報》陸續刊載十五名「自首自新份子」的「書面談話」，答覆因時間關係未能回答的記者提問。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日報》刊載黃素貞題為〈匪黨加於灣婦女的侮辱台與損害〉的「書面談話」。

十二月廿三日，《中央日報》刊載蕭道應題為〈痛苦的經驗、明白的教訓〉的「書面談話」。

一月十日，調查局「竹山偵查小組」在竹山圍捕黃培奕等三人；黃培奕等人經搏鬥後，趁隙脫逃。「竹山事件」後，調查局專案小組便將陳福星、蕭道應等「新生」組織「策反小組」，對黃培奕家屬反覆進行勸告。

二月十日，調查局派高級幹部率領陳福星及黃培奕的妹妹等人，前往彰化二水，並由陳福星為主之「策反小組」說服黃培奕自首。調查局接著要蕭道應去找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前花地集訓總隊隊員石聰金。

四月十日，鄭團麟、賴傳盛因「佳冬支部案」被槍決。

八月十三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公布。

十月一日，省教育廳通令全省國民學校審查學校全部圖書，若有違反國策、詆毀政府、鼓動階級鬥爭、影響兒童心理言論者，一律封存列刪，報廳銷毀。

十二月十四日，石聰金在大安鄉被捕。

十二月，蕭道應進入調查局六處服務，建立法醫鑑識。

一九五四 三月十六日，張志忠被槍決，享年四十五歲。

十二月三日，《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一九五五 二月，黃素貞產下四女揚區。

一九五六 七月，黃素貞產下五女萌區。

一九七八 十一月，蕭道應自調查局退休，但仍任法醫顧問。

一九九〇 十月二十一日，法醫中心成立後，則轉為駐法醫中心顧問，直至逝世。

二〇〇二 九月廿五日，蕭道應辭世，享年八十七歲。

#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

——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

編者 蕭開平·藍博洲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二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w@ans47.hinet.net](mailto:streview@an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 傳真：(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三一二〇八四八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元(平裝)  
出版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01-1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  
／蕭開平，藍博洲 編 臺北市：海峽學術  
2004[民93]  
面：公分

ISBN 986-7350-01-1 (平裝)

1. 蕭道應 傳紀

782.886

93018494